

中国安全战略报告 2025

崛起的全球南方与中国

防卫研究所

本报告是防卫研究所研究人员根据国内外公开发行的资料，以独特视角分析撰写的，
并非日本政府或防卫省的见解。

中国安全战略报告 2025

目录

摘要	3
缩略语对照表	6
序章	10
第 1 章 中国力图联合全球南方	
前言	16
1 中国的全球南方外交的源流与背景	16
(1) 建国后中国形成发展中国家的自我认知	16
(2) 中国与全球南方共有的命题	18
2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全球南方的影响力	19
(1)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影响力	19
(2) 中国对全球南方展开的多边外交和多层次外交	21
(3) 军事介入全球南方	24
3 处于国际秩序变化时期的全球南方与中国	26
(1) 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认知	26
(2) 利用全球南方掌握话语权	28
(3) 全球南方在大国竞争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29
(4) 变化的全球南方与中国	32
结语	33
第 2 章 中东国家与中国 中国作为与美国有别的大国在中东扩大影响力	
前言	36
1 中国在介入中东事务上的变迁	37
(1) 毛泽东时期：支援民族解放运动以及与中东国家之间的倾轧	37
(2) 邓小平时期：中苏继续对立与积极出口武器	41
(3) 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扩大经济关系	43
2 习近平政权下的中国不断扩大对中东事务的介入	44
(1) 深化经济和外交纽带	44
(2) 介入军事和安全领域	47
(3) 胡塞武装的对华认知和对中东局势的影响	50

结语	52
第3章 不断扩大的中非关系及其问题	
前言	56
1 扩大经济关系	57
(1) 非洲面临的经济问题	57
(2) 扩大中非经济关系	58
(3) 中非经济关系的问题	60
2 政治和安全领域的中非关系	62
(1) 非洲在政治和安全上的问题	62
(2) 政治和安全领域的中非关系	63
(3) 政治和安全领域的中非关系存在的问题	65
3 中非关系的问题与展望	66
(1) 中国在非洲问题中的作用与限度	66
(2) 美中竞争时代的非洲	66
结语	67
末章	70
注释	74

摘要

第1章

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于发展中国家和大国这两种自我认知，在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根据情况有时也会在处理大国关系时利用这一立场。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对以下3点形成松散共识：①历史原因导致的对欧美国家的不满；②期望经济发展；③改革全球治理的必要性。中国以这一共识为背景，提出多项倡议，力求联合全球南方。

中国作为经济大国，通过对外援助和融资等手段，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外交行为行使其影响力。此外，中国提供的数字技术支援和公安合作，虽然通过提高全球南方国家的治理能力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但是也会导致威权主义的僵化和存续。习近平政权通过在全球南方建立海外军事基地、积极开展军事交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官兵提供军事教育等，不断扩大军事介入，一方面与中国历来坚持的不干涉内政原则产生矛盾，另一方面，中国为了维护本国海外利益，可能会在政治和军事上不断加强“建设性介入”。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唯一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试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理人获得这些国家的支持票，并利用联合国机构和多边平台掌握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中国通过增强这种话语权，不断加强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姿态。在美中对立日益激化的过程中，中国为了维护其“核心利益”，对全球南方展开了积极的宣传战和外交攻势。

第2章

中国在毛泽东时期，积极支援了阿拉伯半岛的反政府武装组织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等民族解放运动，因此与部分中东国家产生倾轧。结果直到1990年代中国才与有实力的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建交。中国对中东的武器出口额在1980年代的两伊战争时期达到顶峰，时至今日仍未恢复到当时的水平。而秘密进行的武器交易，在中国与部分中东国家建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方面，中国的中东政策在每个政权时期各具特色，中东的反应也随之而不断变化。另一方面，也能从中看到一些历史性共同点：①以经济为起点扩大关系，②中东地区的安全环境日益动荡、以及对中东地区安全影响深远的美国所采取的方针，成为中国入局中东的可乘之机。

对中国而言，在中东地区，不仅要重视建立邦交关系，也要重视与非政府组织建立关系。中国在毛泽东时期，从意识形态的观点角度支援反政府武装组织和民族解放运动，因此与部分中东国家产生倾轧。现在的习近平政权，在也门既支持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也与胡塞武装建立关系，推行重视平衡的政策。胡塞武装可能承诺了不以中俄船舶为攻击目标，这是中国长期坚持重视平衡政策的结果，相对而言中国可能有利可图。

在军事和安全领域，中国也在无人机和导弹等特定领域入局中东国家。习近平上台之后，有人指出中国可能正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阿曼建设军事设施。假如中国在中东国家成功建成首个军事基地，不仅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会迈上一个新台阶，美中之间在该地区展开的大国竞争可能也会愈演愈烈。

第3章

中国通过直接投资和融资等手段，不断扩大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关系，2009年之后，对于非洲来说，中国成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向非洲的经济扩张，一方面为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例如改善电力等基础设施的使用、创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非洲国家已经背负高额债务，进一步扩大债务也可能导致中国的经济介入规模萎缩。非洲国家需要通过培育本国产业实现贸易品目和投资对象的多样化，使本国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对称且可持续。

在军事和安全领域，中国不仅向非洲的联合国维和特派团派遣部队、在吉布提建立海外基地，武器出口也在2000年代之后不断增加，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中国超过俄罗斯，成为非洲地区的全球最大武器供应国。此外，中国还向非洲国家提供军队和警官干部的教育培训服务、提供监控技术、派遣私营安保公司，中国的介入呈现多元化趋势。中国也积极介入非洲的政治领域，例如由中国共产党援建的政治培训学校于2022年在坦桑尼亚建成启用。但是，非洲国家的民主化、地区内的冲突和对立是否受到这些介入的影响尚不得而知。

在美中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非洲国家可借机提高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感，但同时也存在该地区因被卷入这场竞争而导致分裂的风险。

末章

综上所述，中国根据全球南方的地区和国家的情况，与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广泛行为体接触，通过发展经贸关系、扩大军事安全领域合作，不断加大对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对于未来的国际秩序将从美国（或西方国家）主导的单极霸权向全球南方崛起所推动的多极化演变，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大多数国家基本上达成松散共识。如果有利于本国的发展、更加公平的全球治理，全球南方趋向于承认中国的主导权。但是，拥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全球南方国家正在群体性崛起，中国并不能保证自己将来继续掌握主导权。

在这种环境下，美中战略竞争在裹挟全球南方的同时，涉及广泛领域，今后仍会继续下去。全球南方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力求在美中之间保持独立自主，同时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或强化自我主张。

中国试图在东亚地区靠力量单方面改变现状，并视其为维护核心利益的正当行为，不断升级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活动。支持中国此类言行的全球南方国家增多，可能会助长中国改

变现状的尝试，加剧该地区紧张局势。由此可见，旨在维护和加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国家，需要在与全球南方加强合作之际，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并通过深入理解全球南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独特观点、政策问题，探索如何根据各地需求开展经济合作、提供能力建设支援，发展以长期信赖为基础的合作伙伴关系。

缩略语对照表

APSCO	亚太空间合作组织
ASEAN	东盟
AU	非盟
CASCF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DLF	佐法尔解放阵线
EIU	经济学人智库
FAO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LN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
G77	77 国集团
GCC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GCI	全球文明倡议
GDI	全球发展倡议
GDP	国内総生産
GSI	全球安全倡议
PFLOAG	被占领的阿拉伯湾人民解放阵线
PKO	维和行动
PLO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QUAD	四方安全对话
SCO	上海合作组织
UAE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UAV	无人机
UNIDO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WTO	世界贸易组织

序言

防卫研究所发行的《中国安全战略报告》，旨在向国内外广泛介绍本所研究人员对中国安全问题的考察结果。本报告从有助于中长期思考中国安全问题的角度选定题材，其内容不仅涉及军事，也涉及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广泛领域。

《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25》的主题是“崛起的全球南方与中国”。“全球南方”是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新兴国家群体的统称，特别是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全球南方既不赞同日美欧，也与中俄保持独特的关系，这种姿态受到关注。本报告撰稿之际，我们论述了依靠经济增长提高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感的全球南方国家与中国关系的现状、中国与全球南方走近，以及相关国家的对华认知。其中重点论述了中东和非洲，因为这些地区与中国的关系显著加深，并且国际社会重新认识到这些地区本身的重要性。从能源安全和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必须考察这些地区的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因此我们自认为本报告对此进行了全面论述，包括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加沙问题，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观点和战略意义。

综上所述，《中国安全战略报告》的选题和考察均由防卫研究所研究人员根据个人学识进行。因此本报告的内容为撰稿人的个人见解，并非日本政府、防卫省及防卫研究所的官方见解。文责由研究人员自负。

《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25》的撰稿负责人为八塚正晃，由西野正巳、吉田智聪、神宫司觉负责撰写。卷尾列出各位撰稿人负责的章节、专业领域，以供参考。由林浩一、切通亮、田中亮佑、五十岚隆幸、清冈克吉、后藤洋平、竹内俊雅、相田守辉负责编辑和公关。

我们希望本报告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国内外舆论关注中国的安全问题，并且不局限于中国，也对安全相关的广泛领域的对话和交流做出贡献。

2024年12月

《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25》主编
地域研究部部长 庄司智孝



中国安全战略报告 2025
崛起的全球南方与中国

序章

本报告的问题意识

八塚 正晃

—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我们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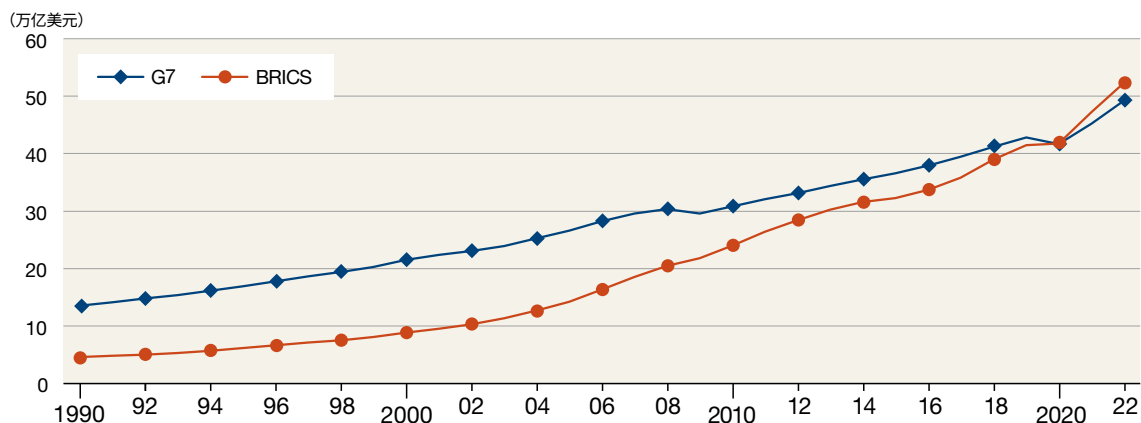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在2023年8月举行的金砖国家（BRICS）相关会议上发表演讲，将中国定位为全球南方的一员，说明他已经认识到，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的确在从根本上改写世界版图。近年来，习近平政权加强批评在欧美主导下形成的国际秩序不公平，以“国际关系民主化”为目标，提出了各种独立自主的外交倡议。在挑战现行国际秩序时，中国为了壮大势力，积极拉拢在国际关系中显著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也就是所谓的全球南方。

全球南方虽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通常作为一个涵义广泛的概念，用于统称亚洲、中东、非洲和中南美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在冷战时期，摆脱了殖民统治的新兴独立国家，推进既不倒向西方也不倒向东方的“不结盟运动”，此类国家被统称为“第三世界”。此外，人们还以经济发展程度为标准，用“南方”来指代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与指代发达国家的“北方”相对的概念。冷战结束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贫富差距的扩大超越了国界，结果一部分人开始将全球南方一词作为一个术语来使用²，也包括发达国家的贫困。目前对全球南方概念的含意有多种解释，也有人对其用法持谨慎态度³。

作为本报告主要研究对象的全球南方，是对近年来在国际政治环境下受到关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统称。全球南方一词在国际政治环境下重新引起关注，可能有以下三个深层次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全球南方的经济崛起。进入21世纪，一些国家顺应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实现了经济发展，作为新兴经济体不断增强国力。中国通常被列举为此类国家的代表，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和墨西哥等拥有人口红利的发展中国家，今后的发展潜力也受到关注⁴。对比之下，预计发达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会相对衰退。如图0-1所示，若按购买力平价GDP来比较被视为全球南方代表的金砖国家与七国集团（G7）的经济实力，1990年金砖国家仅为七国集团的三分之一，但在2020年已超过七国集团。如果新兴国家继续保持相对高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今后这一差距可能会不断拉大。据高盛（Goldman Sachs）预测，现在的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前十大经济体中所占的比例，到2050年将持平，到2075年将变成3:7⁵。南方与北方在经济层面的力量平衡的确在大幅变化。

第二个原因是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后，全球南方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日益凸显。由于2022年2月俄罗斯单方面军事侵略乌克兰，日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制裁俄罗斯，同时向国际社会寻求广泛支持。对此，全球南方国家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俄罗斯，但却并未赞同西方国家对俄制裁。像印度一样与俄罗斯加深经济关系的国家反而不少，暴露出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的国际秩序观与欧美国家迥异，这种差异会妨碍国际社会对国际危机采取广泛的联合

图0-1 七国集团与金砖国家的经济实力对比（购买力平价GDP）



（出处）由撰稿人根据联合国数据绘制。

行动。为了反抗由殖民统治历史造成的欧美双重标准，这种政治立场常常表面化，目前美国应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的方式，也受到全球南方的严重质疑。

第三个原因是全球南方试图依靠上述经济和政治崛起来加强内外部合作。2023年1月，印度召集多达125个全球南方国家举行了“全球南方之声峰会（Voice of Global South Summit）”⁶。另外，自2024年1月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以下简称“阿联酋”）这4个国家成为了金砖国家新成员国⁷，而且同年10月在俄罗斯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宣布设置立场仅次于成员国的“伙伴国”，此举旨在针对全球南方扩大框架。一方面，全球南方是由不同背景的国家组成的一个集合体，目前尚未出现在政治上协调一致联合行动的迹象。另一方面，如果全球南方加强政治合作，提出共同的政治主张、采取共同的政治行动时，预计会对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影响。鉴于这种迹象，发达国家也在加强与全球南方的关系。

中国政府过去也一直表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近年来重新力求加强与全球南方的合作关系。在2023年7月举行的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上，王毅外长作为中国政府高官首次明确表示中国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提出要推动落实中国倡导的全球发展倡议（GDI）、全球安全倡议（GSI）、全球文明倡议（GCI），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⁸。是否将中国算作全球南方的一员也是论点之一，但是显然中国力求联合全球南方国家，以实现自己认为最理想的国际秩序⁹。本报告虽然不对全球南方进行严格定义，但是也采纳中国政府



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2022年6月）（新华社/Kyodo News Images）

的这种自我指涉，将在国际政治环境下被称为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各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视为全球南方，在此基础上展开论述¹⁰。中国究竟具有怎样的国际秩序观？又是在其中定位全球南方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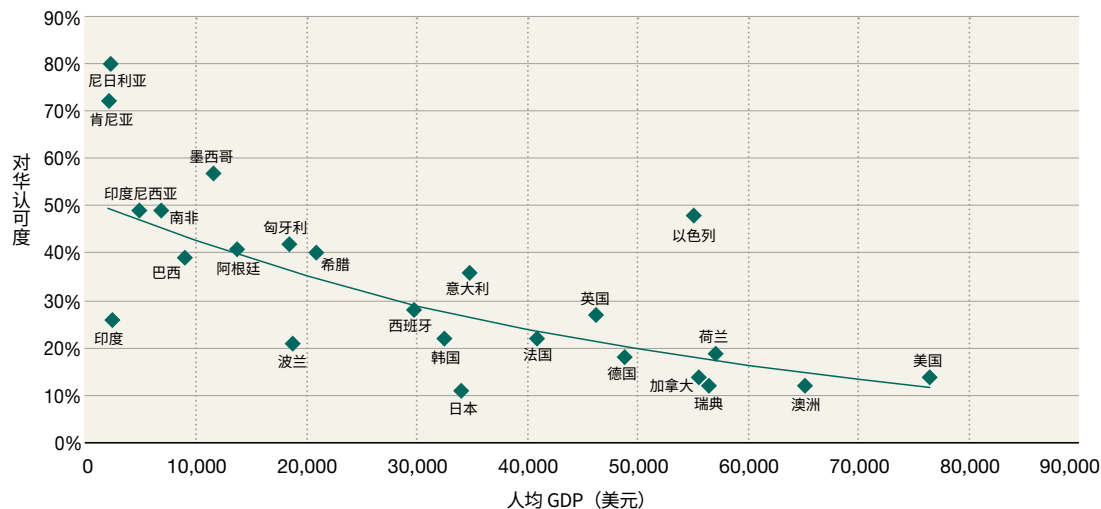
同时，本报告也必须提出全球南方是如何接受中国的影响力的这一论点。中国在20世纪作为经济大国崛起后，可能在以经贸关系为核心增强对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其影响力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全球南方国家的政策选择呢？关于这一点，耐人寻味的是发达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在对中国的认知上产生了巨大分歧。2023年11月皮尤研究中心对包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24个国家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总的来说，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认可度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¹¹。计算一下对中国的认可度与经济发展（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¹²）和政治体制（经济学人智库（EIU）发布的民主指数¹³）这两个指数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均为强相关（经济指数：-0.7093，政体指数：-0.88959）（图0—2和图0—3）¹⁴。这些数据暗示，经济上越贫穷的国家，而且越是威权主义的国家，相对来说对中国就越有好感。如果考虑到近年来民主主义在国际上呈现衰退趋势，则威权政体国家的对华认可度趋高，从中长期角度来看，在国际关系中的意义不容小觑¹⁵。

在美展开全球性战略竞争的过程中，假如全球南方国家选择对华友好政策的趋势增强，会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也与另一个论点有关，即全球南方对中国的这种认可度，是否会为全球南方接受中国以取代曾在安全领域称霸世界的美国奠定基础。全球南方是如何认识和接受中国影响力的？这些论点与日本不无关系，因为日本的国际秩序观、关于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主张与中国迥异。

本报告的目的是以上述问题意识为导向，多角度理解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关系。关于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关系，已有高水平研究成果公诸于世，而本报告旨在从以下三个角度映射二者的关系，向读者提供新观点新思路¹⁶。第一，专门研究中国和全球南方的各地区研究人员，力求通过双向讨论二者的关系，获得更为立体的认识。本报告则选择近年来中国加强介入的中东和非洲两个地区进行全球南方的案例研究。中东和非洲地区拥有多数发展中国家，虽然恐怖袭击事件、内战和地区冲突等问题接连发生，局势动荡不安，但因国家数量众多、人口规模巨大、资源丰富和地缘政治重要性，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而且，中东和非洲也是曾经强势的欧美国家影响力衰退，而中国却快速加强介入的地区。从中长期角度探讨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关系时，地区秩序如此动荡的中东和非洲地区或许是一个重要案例。《中国安全战略报告》系列，就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已对东南亚、南亚、太平洋岛国地区（2019年版）以及中亚地区（2020年版）做了分析¹⁷。本报告将根据这些成果，验证中国在更远的地区对全球南方展开的外交活动。

本报告的第二个特点是着眼于中国在安全领域与全球南方的关联性。关于这一点，中国在2000年代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之后，也在中东和非洲地区不断强化军事承诺，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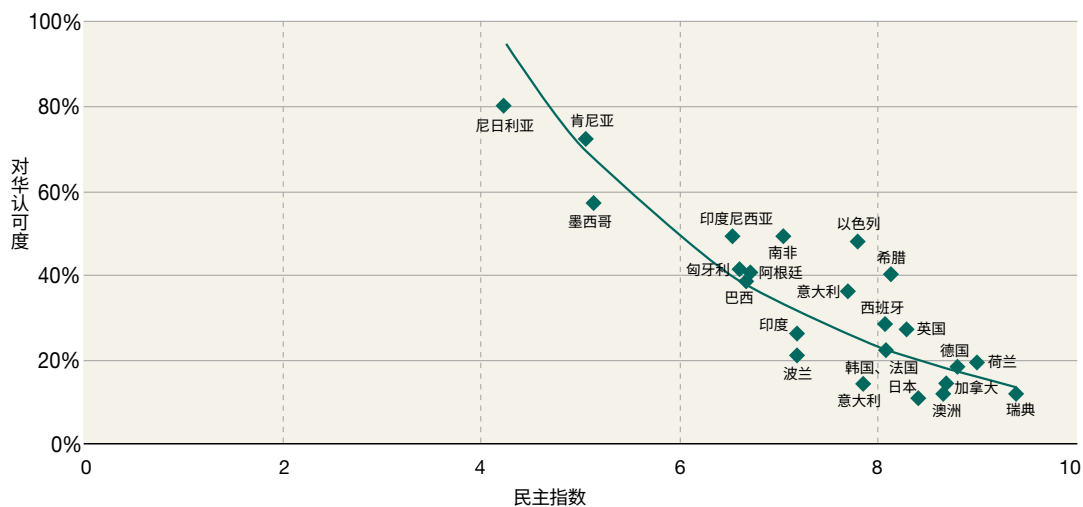
图0-2 人均GDP与对华认可度相关图



(注) 对华认可度(纵轴)表示回答对中国有好感的受访者比例(%), 这是2023年1月至5月以电话调查或面对面调查方式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 受访者为24个国家的30,681名成年人。

(出处) 由撰稿人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的数据绘制。

图0-3 民主程度与对华认可度相关图



(注) 对华认可度(纵轴)表示回答对中国有好感的受访者比例(%), 这是2023年1月至5月以电话调查或面对面调查方式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 受访者为24个国家的30,681名成年人。

(出处) 由撰稿人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和经济学家智库的数据绘制。

2008年年底开始实施中国海军索马里护航行动, 2017年开始在吉布提建设中国首个海外保障基地。本论也将分析中国在全球加强军事介入会对各地区秩序产生的影响。

本报告的第三个特点是采用美中战略竞争如何在全球南方展开的视角。由于美中对立日益尖锐, 中国不断加强介入全球南方事务。全球南方的国家和地区, 因为美中战略竞争而受

到了哪些制约、获得了哪些恩惠呢？去年的《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24》，以“中俄美战略竞争与未来国际秩序”为题做了分析¹⁸。本报告增加了全球南方的观点，重新审视了先前系列报告的分析视角，因此也可以算作其续篇。

根据上述问题意识和分析视角，本报告采用了以下结构。第1章“中国力图联合全球南方”，试图阐明中国对全球南方的认知和政策。确认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历史性变迁，同时从经济、外交和军事等方面验证中国对全球南方的影响力。此外，阐明习近平政权在美中战略竞争日益尖锐的背景下，以获得全球南方支持为目标展开外交攻势的实际情况和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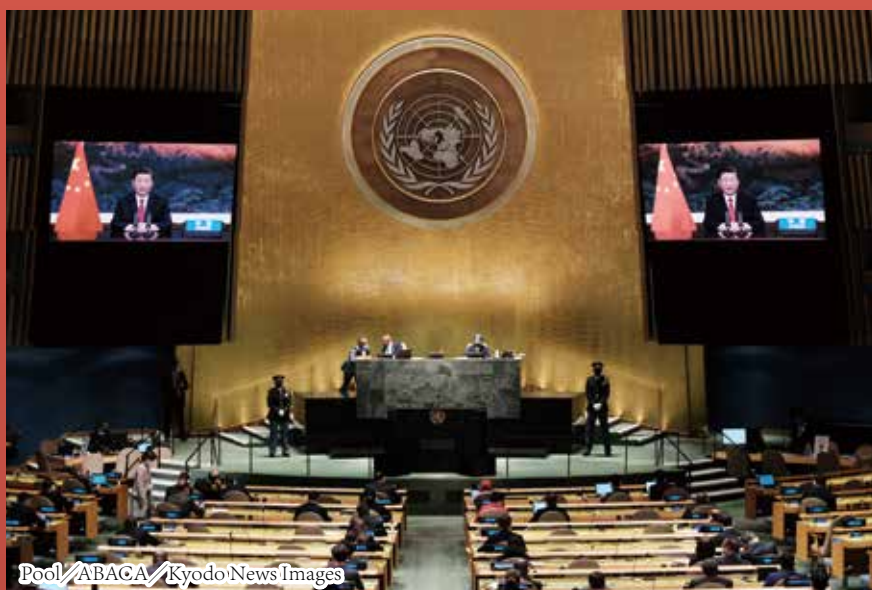
第2章和第3章是从全球南方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案例研究。第2章“中东国家与中国——中国作为与美国有别的大国在中东扩大影响力”，论述中国介入中东事务的历史与现状。第2章也通过梳理历史性变迁，呈现目前中国与中东关系的格局，同时就习近平政权的中东政策，从经济和外交、军事和安全等方面展开论述。此外还验证过去从未明确的“抵抗轴心”各组织与中国的关系。

第3章“不断扩大的中非关系及其问题”，探讨中国是如何对付非洲地区面临的问题的。本章论述的是，由于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而且是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因此有能力提供解决非洲经济问题的方案，但却引起债务积压、资源掠夺等问题。同时还探讨中国在非洲面临的武装冲突、民主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大国间竞争对非洲造成的影响。

末章根据本论梳理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关系，考察其对国际秩序造成的影响。衷心希望本报告有助于读者更客观地了解中国，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政策性讨论。



中国安全战略报告 2025
崛起的全球南方与中国



Pool/ABACA/Kyodo News Images

第 1 章

中国力图联合全球南方

八塚 正晃

前言

本章的目的是主要根据中方的认知和外交政策来映射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关系，并深入理解之。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中国依然属于人均国民总收入1万2,850美元的（中高收入）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自认为具有联合发展中国家的职责¹。实际上，国家主席习近平经常提到中国的领导地位，以提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和发言权²。中国政府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同时，根据情况有时也会利用发展中国家对抗大国。目前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关系也继承了这条历史脉络。第1节将回顾中国形成发展中国家这一自我认知的过程，同时将论述全球南方与中国共有的命题。

冷战结束后，中国在实现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崛起成为一个大国，不断提高对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中国会如何对全球南方施加其影响力呢？第2节将从经济、外交和军事三个方面探讨中国对全球南方的影响力的源泉及其意义。

近年来，中国以其对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杠杆，在迫使国际秩序变革上展现出日益强硬的姿态。习近平政权多次指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国际关系民主化不可阻挡”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政权表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并以改革者自居⁴。第3节将论述在国际政治环境下，在全球南方受到关注的过程中，中国如何在美中战略竞争加剧等动荡的国际关系中定位自己与全球南方的合作。

1 中国的全球南方外交的源流与背景

(1) 建国后中国形成发展中国家的自我认知

1954年中国与印度、缅甸之间达成一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①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②互不侵犯、③互不干涉内政、④平等互利、⑤和平共处），成为一项重要准则，构成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交往的基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起初是在中国与印缅两国之间确认国家关系和进行国界谈判中确立的，现已成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发展外交关系的基本原则。而且，该原则强调互不干涉内政，与不干涉威权政体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侵犯人权、宗教、民族和内战等国内问题，以及中国对西欧各国批评中国政治体制和人权等问题所持的怀疑态度密切相关。在2014年举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仅强调该原则精辟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而且主张各国应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反对颠覆政权⁵。

此外，中国从建国后就开始关注大国在经济上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南北问题，在援助发展

中国家的同时，为了对抗超级大国，力图与发展中国家建立统一战线。1946年年中，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毛泽东开始提出“中间地带理论”，该观点与中国立足南北问题认识发展中国家有关。该观点基于南北问题的设想，即“美帝国主义”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展开攻势，力图侵略剥削地处美苏两国中间地带的国家和人民。但是，在美苏东西方冷战格局日益凸显的形势下，为了对抗美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中国采取了“（倒向苏联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寻求与苏联和共产主义阵营坚如磐石的团结。换言之，中国兼具东西对立和南北对立的见解，根据所面临的情况来调整对发展中国家外交⁶。无论哪种观点，中国都提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在物质和道义上援助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亚非拉（亚洲、非洲和中南美洲）民族解放运动为己任，这也是大国意识的体现。中国在自己也是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下，还对外提供远超当时国力的援助。但是，大部分对外援助都用于向北朝鲜和越南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提供无偿援助，包括军事援助，对其他亚洲和非洲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提供的援助，大部分是有偿资金援助，基本上只是“声援”⁷。

建国后不久，中国针对“第三世界”从欧美帝国主义统治下独立后出现的在大国政治中保持独立性的动向，也深化与其合作。摆脱了欧美国家殖民统治的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等新兴独立国家，在大国规定的冷战格局下寻求独立自主，形成了“不结盟运动”。对此，中国多次表示支持该组织，也参加了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亚非会议）。与不结盟运动走近，也与当时的中国外交战略有关系。特别是在1960年代初期之后，中国政府与苏联的对立日益凸显，在台湾拥有联合国代表权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力求与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保持中立的发展中国家拓展外交关系，以便扩大国际关系的领域。这种尝试逐渐奏效，1970年召开的第三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支持中国获得联合国代表权⁸。再则1960年代中国与许多非洲国家建交，1971年中国成功获得了联合国代表权。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对现在的中国外交举足轻重，与这段历史事实息息相关。

获得联合国代表权之后，中国继续拓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1964年召开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期间，发展中国家结成了77国集团（G77），中国在与该组织深化合作的同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开始自认为起到代表发展中国家意见的作用。如后所述，“77国集团和中国”框架，在中国开展的联合国外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74年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了由77国集团发挥主导作用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邓小平代表中国在联大会议上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该理论部分继承了基于南北问题的“中间地带理论”。这种对世界的划分，



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发言（1955年4月）（共同通信社）

将美苏两个霸权主义国家划分为第一世界，将经济发达的欧洲和日本划分为第二世界，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划分为第三世界⁹。其中第三世界的人民被认为会与第二世界合作，同时会对抗第一世界的霸权主义。在该理论中，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也属于中国应该合作的对象。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将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中国在推动所谓的改革开放时代中，随着外交的去意识形态化，不断淡化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合作。此外，1982年中国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之后，一方面注重本国的经济建设，另一方面急剧减少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援助金额，转向以贸易和投资为主的经济合作。

综上所述，中国自身也有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在理念上一直本着国际主义精神援助民族解放运动和发展中国家。但是，无论是中间地带理论还是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中国政府之所以提出此类理念，是因为要对抗美国和苏联之类对本国构成威胁的超级大国，有联合发展中国家建立统一战线、扩大外交领域的外交战略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而言，对第三世界外交从属于对美苏关系等事关国家安全的大国关系¹⁰。

（2）中国与全球南方共有的命题

可以看出，以下三个共同点是中国与全球南方步调一致的前提。第一，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都有被西方列强（现在的西方国家）侵略、被殖民统治的历史教训，都对欧美的欺骗性感到不相容。对此，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向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发表致辞时也指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多是从殖民主义的历史泥淖中走出来的，批评“有的国家不甘心失去其霸权地位，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肆意围堵打压”¹¹。而且发达国家被指奉行双重标准，一方面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角度出发，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立即发动对俄制裁，另一方面却对以色列网开一面，对其在加沙地带展开扫荡哈马斯的军事作战所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并未采取积极行动。例如，对于以色列发动军事作战导致大量巴勒斯坦平民伤亡，南非向联合国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可能就代表了这种意见¹²。另外，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发达国家即使有多余的疫苗也不积极转让给发展中国家，亦引起不满¹³。

第二，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为了解决国内的贫困问题，都以发展为导向，将经济发展列为优先事项。中国政府在与全球南方国家交往中，也将“发展”列为优先事项。2016年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拉伯国家联盟表示，“破解难题，关键要加快发展。中东动荡，根源出在发展，出路最终也要靠发展”¹⁴。这番话说明习近平政权认识到，要通过支持发展中地区的经济发展来稳定地区局势。

第三，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南北经济差距源于战后一直由大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缺乏公平性，始终从属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体系。因此，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的方向

向改革，是中国与全球南方追求的共同目标。在1974年由77国集团主导发表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中，对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国际治理及其跨国公司的掠夺行为表示不满，就代表了这种对全球治理体系的不满。历代中共领导人都对国际经济秩序表示不满，习近平政权同时也表明了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热情。例如，在2015年中央政治局进行集体学习时，国家主席习近平认为，“要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特别是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¹⁵。在同年由中国和联合国共同举办的“南南合作圆桌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必要性¹⁶。这种共同点也是中国自认为是全球南方一员而联合相关国家的理由。

2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全球南方的影响力

(1)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影响力

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并在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在过去的20年里使对外贸易总额增加到10倍，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占世界比重大幅上升。对外贸易总额显示，中国现在（2022年）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¹⁷。对于全球南方国家而言，中国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以稍早前的数据为例，根据2018年经济产业省发布的《通商白皮书》，2000年至2017年，世界各国的第一大进口国大幅改变。在2000年时以中国为第一大贸易国的国家极少，但是后来到2017年时，以中国为第一大进口国的国家和地区数量约占全球30%（189个国家和地区中，57个国家和地区），位居世界榜首，大幅超过位居第二、约占全球15%（同上，28个国家和地区）的美国¹⁸。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特别是对于东南亚、南亚、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大多数国家而言，中国都是第一大贸易国。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向世界各国供应机械类、电气设备、塑料和杂货等生活商品。同时中国还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进口国，作为“世界市场”也在提高其存在感。

中国还对全球南方国家积极开展投资活动。202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居全球第二¹⁹。自2013年起，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指引下，促进官方发展援助、官方资金提供、中国企业的投资活动。据中国研究人员分析发现，截至2023年1月，中国已与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合作文件²⁰。中国的经济合作大都以融资形式进行，并要求中国企业参与相关项目²¹。根据AidData发布的报告，中国政府以国际发展为目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和官方资金，在2000年至2021年的22年里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1.34万亿美元，目前中国仍是超越美国的世界第一大债权国²²。

尽管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和融资依然保持较高水平，但在2016年左右达到顶峰

之后逐渐减少(参见图1-1)。其中可能也反映了中国国内对于对外援助的意见。根据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发布的民意调查报告,52.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外援助偏多甚至过多,反之认为“过少”和“有点偏少”的受访者仅占2.3%²³。近年来由中国主导的经济合作,债务违约、拖延还贷的发展中国家层出不穷,国际社会也批评中国制造“债务陷阱”。对于中国而言,这些问题也意味着面临不良债权、构成国际性声誉风险。有人指出,因此中国政府自2018年左右起,一面巧妙化解人们对有问题的债权国和项目的反感,一面设定拖延还贷时的罚息等,不断改变经济合作的形式²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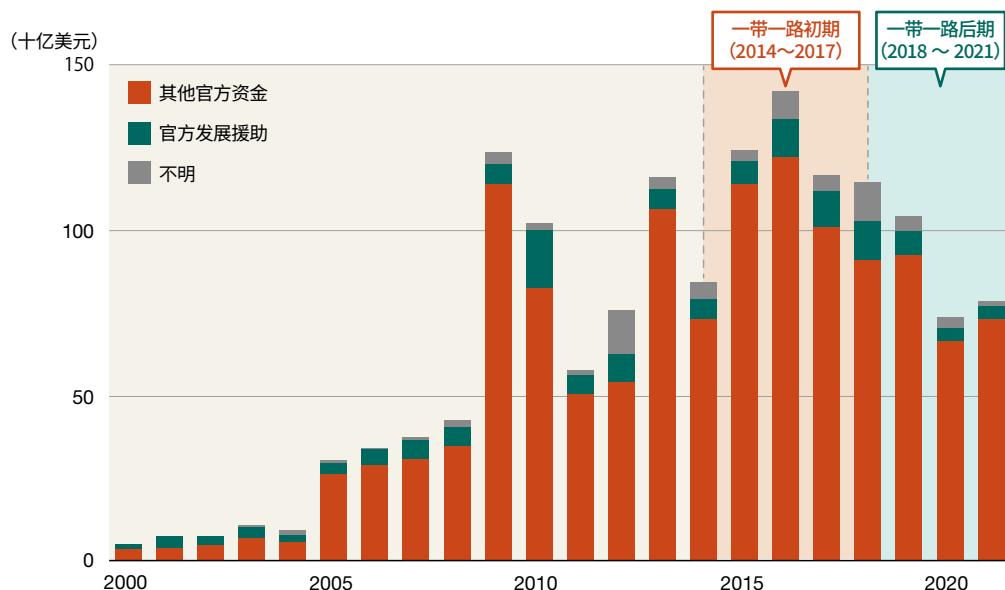
此外,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开发道路和港口等硬件基础设施,而且完善国际通信技术软件基础设施,力求通过推动所谓的软联通,向国际社会推广中国的规则标准。中国政府自2017年起发布《“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北京倡议》,纳入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促进信息基础设施、数字化和电子商务相关的国际合作²⁵。这也是中长期标准化措施《中国标准2035》的一环²⁶。相关政府文件也增添了利用一带一路推广中国标准的举措,包括在金砖国家设置标准化合作机构、提高国际标准转化率²⁷。

在中国开展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也能看到中国以经济实力为杠杆行使影响力的案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可以将经济依存关系“武器化”,影响他国的外交行为。国家主席习近平自己也表示要“拉紧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存关系,形成对外方人为断供的强有力反制和威慑能力”²⁸。2020年中国政府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等相关法规,这些法规不仅是对美国出台对华贸易和投资禁令的对抗措施,也把服从美国对华禁令的第三国企业纳入管制范围²⁹。迄今为止,对于双边矛盾日趋尖锐的国家(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挪威等),中国肆意采取出口管制等措施,反复进行经济胁迫。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露骨经济胁迫的案例比较少见,但是亦会通过相关暗示来影响后者的外交行为。也有人指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施加经济压力比对发达国家施加经济压力更有效,可能是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已经接受了来自中国的高额投资,惧怕经济压力,所以会主动迎合中国的政策取向³⁰。有人指出,2019年基里巴斯政府之所以与台湾断交,转向与中国建交,可能是因为与中共关系密切的中国企业向基里巴斯的主要产业——渔业提供的高额贷款起作用了³¹。

另外,关于中国对外援助对其国际影响力的正向作用,车翼等人分析因果关系后指出,21世纪之后中国对外援助有助于提升111个受助国对中国的认可度及其在联合国与中国投票的一致性³²。Dreher等人同样也分析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受助国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投票行为,并发布了推算结果,认为在2000年至2021年的联合国大会上,75%的中低收入国家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立场与中国保持一致,如果他们在联合国大会决议中与中国投票一致的比例增加10%,那么来自中国的援助金额可望增加276%³³。

图1-1 2000年~2021年中国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官方资金的变迁



(出处) AidData, *Belt and Road Reboot: Beijing's Bid to De-Risk Its Global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 November 2023, p. 8.

在精英阶层集中掌握政策决定权的威权政体下，与欧美对外援助相比，中国对外援助可能会作为有效选项发挥机能，起到延续政权、增强其政治体制强韧性的作用。稻田十一在柬埔寨、缅甸、斯里兰卡、安哥拉等地进行了实地调查，他指出中国在不干涉内政原则下扩大援助，可能会降低欧美以援助为杠杆施加“民主化压力”的效果³⁴。中国在提供援助时主张互不干涉内政，而欧美在援助时则寻求民主程序，例如受助国在决策过程中保持透明度、避免腐败等，二者的姿态截然不同。因此，援助是由中国与受援国的政府和统治阶层以暗箱操作方式决定的，这种援助会助长非法行为，变成孳生腐败的温床，这一点不可否认³⁵。后述的公安警务合作关系也会在同样的方向起作用。

(2) 中国对全球南方展开的多边外交和多层次外交

以中国为核心形成的多边平台，也可能是中国对全球南方影响力的源泉之一。目前存在联合国的多边框架、各地区的让中国加入多边主义平台的对话框架和合作框架，以及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SCO)之类的功能主义多边框架等。中国通过各种多边框架与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合作关系。

77国集团成为联合国的全球南方合作中枢³⁶。77国集团由134个发展中国家组成，其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的85%以上，属于联合国内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中国而言，77国集团是其在联合国与全球南方步调一致的重要框架。据中国外交部披露，中国虽然不是77国集团成员，但在“77国集团和中国”框架下与其保持良好合作关系³⁷。近年来，随着全球南方

受到关注，中国也在该框架下积极开展外交活动。2023年9月在古巴举行“77国集团和中国”哈瓦那峰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希作为中国代表出席，表示“中国愿同古巴和其他77国集团成员一道，共筑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同创共同发展的新时代”³⁸。此外，2024年1月77国集团时隔约20年举行第三届南方首脑会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提到全球安全倡议（GSI）、全球发展倡议（GDI）、全球文明倡议（GCI）等，并表示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³⁹。77国集团主要讨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南南合作和气候变化等共同课题，并调整利害关系，以便向联合国提交决议草案。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唯一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能作为代理人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表达发展中国家的意见，也可望获得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票。例如，2019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举行总干事选举，“77国集团和中国”事先商定支持来自中国的屈冬玉，使其当选，体现了二者的互惠关系⁴⁰。

自1990年代后半期起，中国政府还展开多边主义区域外交，使中国加入各地区的多边框架中，不断建立对话机制网络。如表1-1所示，中国政府与非洲、中南美洲、中东、东南亚、太平洋岛国等各地区之间，建立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性框架并拥有区域内成员国。中国政府在这种框架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南南合作为准则，加强“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调整合作事项等，灵活地发展外交关系⁴¹。

表1-1 中国加入的多边框架扩展到全球南方各地区⁴²

名称	开始时期	成员国数量
中国—东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996	10
中非合作论坛	2000	53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2004	22
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	2006	10

（出所）由撰稿人根据中国外交部官网编写。

通过各地区的多边框架，中国在各地区深化多层次多领域的交流。例如，2004年启动之后蓬勃发展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会议机制包括①每2年举办1次部长级会议；②每年召开高官委员会会议；③经济合作、企业投资、能源、艺术、传媒、北斗卫星、医疗卫生、通信、技术、青年交流等领域的各种论坛；④联络组⁴³。中阿以该论坛为基础，2022年12月举行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显著增强⁴⁴。如后所述，中国在因核心利益而与他国严重对立时、国际组织进行人事选举时，也试图利用这种区域性框架获得全球南方的广泛支持。

在国际政治环境下，全球南方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同时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也令人瞩目。就金砖国家而言，各成员国重视自己作为区域性领袖的作用，在扩大金砖国家的政治影响力这一点上，各成员国的政治目的是一致的⁴⁵。2024年1月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阿联酋这4个国家成为了金砖国家新成员国，以及同年10月在俄罗斯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宣布的设置立场仅次于成员国的“伙伴国”等，使得金砖国家成为一个代表更广泛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的多边平台。一位中国学者认为，现在就有40多个国家希望加入金砖国家，金砖国家将成为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平台⁴⁶。

上海合作组织本来是为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就国界管理建立互信关系而成立的合作框架，但却不断扩大其作用和成员国。特别是2000年代之后，上海合作组织在反恐和军事合作之外，也不断扩大其活动领域。自2000年代后半期起，联合国关于网络空间行为国际准则的讨论日益活跃，由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共同提交的相关草案，明显地反映了威权政体对网络安全的认知，与拥有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提交的国际准则草案针锋相对⁴⁷。后来上海合作组织还接纳了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继续扩大为9个正式成员国、3个观察员国、14个对话伙伴⁴⁸。另外，在2022年9月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签署了粮食、能源、气候变化、供应链等领域的44份合作文件，该框架给人的印象是更加宽泛⁴⁹。

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都包含印度和俄罗斯等独自采取行动的大国，成员国之间也因各地区的问题而对立，在很多问题上的认知和利害关系未必一致。而且，纳入的行为主体越多元，就越难形成共识和调整利害关系。目前，这些多边框架虽然起到确认尊重彼此利益、以经济发展为目标推动合作、提交国际组织的局部性改革草案的作用，但并不是一个联合所有的全球南方国家、取代联合国主导的国际组织的强大框架。

此外还有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在特定领域开展合作的政府间组织，比如2008年在中国主导下成立的亚太空间合作组织（APSCO）⁵⁰。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开展的空间合作项目中，包括2011年启动的亚太地基光学空间物体观测系统项目，其目的在于开展空间状况识别合作，建立一个利用成员国的光学望远镜观测在轨物体的网络，向成员国提供避碰预警服务⁵¹。中国凭借本国的空间技术能力，以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为主，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卫星需求，承接相关的制造和发射业务。但是也有人指出，这种空间合作是不对称的，会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长期的支配从属关系⁵²。

关于中国对全球南方的外交，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不仅开展国家间合作，而且通过外交部门和中共相关组织等，广泛接触海外的非国家行为体。例如，中国政府早在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前就与塔利班当局接触，因此即使在权力交接时期，也成功地与阿富汗统治势力保持持久关系⁵³。此外，正如第2章也论述的那样，中国历来在中东地区援助反政府势力，现在依然接触胡塞武装等组织，开展不限于国家间外交的外交活动。

(3) 军事介入全球南方

直到胡锦涛政权时期为止，中国除了派遣人员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PKO）之外，并未积极向海外派遣军队，这种姿态在习近平政权时期出现了很大变化⁵⁴。其原因之一是中国的海外利益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扩大。中国在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的过程中，在各地设置网点的中国企业和华侨的数量也大幅增加。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政府推行“走出去”政策等促进海外投资的措施，大量中国企业向海外扩张。华侨华人数量也随之增长，据说从1980年代初到2017年左右，从2,200~2,400万人增长到5,800万人，增至2倍以上⁵⁵。从其地区分布来看，东南亚4,100万人，非洲150万人，中南美洲150万人，大洋州115万人，大部分华侨华人都居住在全球南方地区。

习近平政权将中国在海外的人力和物力资本称为“海外利益”，力图提高其安全保障能力。中国海军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之后的利比亚内战和2015年的也门内战进行的撤侨行动，让中国领导层深刻认识到增强海外利益安全保障能力的必要性⁵⁶。因此，有人认为中国应当增强海军远程投送能力建设，加强一带一路沿线的补给基地建设，增强维护海外利益和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建设⁵⁷。实际上，根据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发布的民意调查报告，约90%的中国民众认为“在中国公民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可以在海外用兵”，约75%的中国民众赞同“中国为确保自身安全建立海外军事基地”⁵⁸。

关于中国在海外的军事存在，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中国独自展开的海军舰艇靠港补给休整。中国政府自2008年12月启动中国海军索马里护航行动以来，截至2024年4月，舰艇已派遣到第46批。每批护航编队由2艘战列舰和1艘补给舰组成，共600~800名官兵执行为期4个月的长期任务。正如2019年中国国防白皮书所指出的，中国海军的此类活动，不只是为了保护海运航线安全，还有以“加快推进近海防御型向远海防卫型转变”为目标，为提高中国海军自身的远海作战能力而演练的一面。参加中国海军护航行动的中国海军舰艇，不仅到周边友好国家进行靠港补给休整，而且积极地与周边国家的海军实施联合军演，有助于与各国广泛开展军事交流。



为中国海军第40批护航舰队的“岳阳”号导弹护卫舰（左）和“呼和浩特”号导弹驱逐舰（右）进行补给的“骆马湖”号综合补给舰（2022年2月）（新华社/Kyodo News Images）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自2017年8月起投入使用之后，中国海军在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军事存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有人指出，虽然目前中国海军的海外基地仅限于吉布提保障基地，但是中国企业等参与的多个港口开发项目，其目的不只是民用，更是将来军用。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军民融合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罗永光，在中国国防大学主办的一带一路相关的研讨会上提出，为确保我力量投送至印

度洋海域,需要12个中途补给基地⁵⁹。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在柬埔寨、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阿联酋、肯尼亚、赤道几内亚、塞舌尔、坦桑尼亚、安哥拉、尼日利亚、纳美比亚、莫桑比克、孟加拉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塔吉克斯坦建立同样的后勤基地⁶⁰。

从扩大对全球南方影响力的角度来看,中国军事院校接收发展中国家的官兵很重要。根据上述美国国防部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接收了来自100多个伙伴国的留学生,旨在与中南美洲和非洲建立关系⁶¹。与对外援助一样,中国在国防留学方面也不问对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向很难去西方国家留学的威权主义发展中国家的军队提供军事专业教育机会,可以长期影响外国的军队建设。有人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已为非洲各国培养了大批留学生,其中包括10名现役和退役司令官、8名国防部长、6名总统,对于中国而言,这种联系有助于推广自己的统治模式、与外国的军队和政府建立紧密关系⁶²。

中国政府还从保障海外利益的角度出发,努力开展国际公安警务合作。2001年中国政府在上海合作组织启动国际警务合作之后,自2011年起扩大到与老挝、缅甸、泰国等周边国家进行联合巡逻执法,并且逐渐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扩大和加强警务合作⁶³。这种警务合作不仅限于经济犯罪、运输、国际组织犯罪,还包括反恐、反贪等⁶⁴。而且,据说近年来中国政府还在海外设立公安部门站点,用于打压反共反华活动和人权活动家⁶⁵。这种警务合作对全球南方国家造成影响的可能是公安能力建设支援、技术支援等。中国政府在2023年2月发布的《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中表示,“鼓励各国高等军事院校、高等警察院校之间加强交流合作。未来5年中方愿向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研修培训名额用于培养专业人才,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问题”,表现出加强合作的姿态⁶⁶。最近中国政府与爆发反政府游行示威和暴乱的所罗门群岛于2021年签署了警务合作协议,可能是能力建设支援,包括中方向所方警察提供装备、技术和训练⁶⁷。

扩大这种附带教育培训和技术提供的公安合作,在全球南方,有望帮助改善脆弱的公安能力、维护社会稳定,但在威权政体国家,有可能压制民主社会,导致政治体制僵化。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全球推广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防止西方通过网络空间“和平演变”政权这一点上,适合威权政体较多的中东地区等⁶⁸。之所以开发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就是因为中国政府深刻认识到依赖全球定位系统(GPS)等美国空间装备带来的风险⁶⁹。因此,提供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成为威权政体国家减轻对美国依赖的一个有效选项。中国的信息技术企业也将其他数字技术作为有力选项提供给新兴国家,中国的影响力有可能表现得比制造业和一般基础设施建设更强⁷⁰。另一方面,为了实现像中国一样稳固的社会统治,不仅需要引进技术,还必须建立与中国类似的法律体系,而受助国在当地应用的过程中可能变化多端,因此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进行的技术提供和能力建设支援,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统治模式会马上扩散开来⁷¹。

综上所述，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军事存在，在习近平政权下逐渐得到增强。其根本动机仅限于保护在全球不断扩大的中国自身海外利益。此外，中国目前虽然与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建立了各种合作伙伴关系，但是并未签署自己承担防卫义务之类的安全协议。假如中国只以维护本国利益这一最低限度的目的军事介入海外，则其对政治和安全的介入只会深入到从属于保护经济利益的程度，不可能积极深入到包括其他地区安全保障在内的秩序建设的程度。换言之，中国目前不大会保障全球南方国家的体制，或者直接军事介入其他地区的争端。

但是，中国避免军事介入海外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军品出口三项原则⁷²等，只是一种自我限制的宣言性政策而已。实际上，正如第2章所论述的，中国政府一边高喊互不干涉内政一边援助他国的反政府武装组织，目前仍在实施足以改变地区军事平衡的武器出口。而且，由于派遣人员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海军护航、建设驻吉布提保障基地等事实日积月累，上述原则日趋形式化⁷³。在中国国内也存在要求重新审视、重新探讨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呼声，例如有人提出应当“继续遵循不干涉内政原则，处理好不干涉内政与建设性介入的关系”，灵活运用不干涉内政原则等⁷⁴。另外，正如下文所述，如果剖析习近平上台之后提出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就会发现中国有可能会摸索进一步升级军事介入⁷⁵。

3 处于国际秩序变化时期的全球南方与中国

(1) 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认知

要想了解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认知，可能需要思考的是：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欧美主导下形成的国际秩序，也就是“现行国际秩序”，中国有着怎样的认知。2016年7月，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发表演讲时指出，由美国建立和主导的当今世界秩序有三个支柱：①美国或西方的价值观；②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③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组织，同时强调中国从未完全被这个世界秩序接纳⁷⁶。傅莹一方面批判地阐述其中的①美国或西方的价值观和②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一方面表示中国对这个由联合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有很强的归属感。正如川岛真所指出的，中国并不是全盘接受现行秩序的理念和价值观，而是采取以中国式外交工作理念参与世界秩序的姿态⁷⁷。

对于傅莹抨击现行国际秩序的对象——美国或西方的价值观，中共防范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普世价值”渗透到威权政体的社会后，可能会发生“和平演变”⁷⁸。1989年发生的天安门事件、2000年代在东欧掀起的“颜色革命”以及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等事件，被中国政府理解为和平演变及其企图的案例。因此，中国政府主张应当承认符合国情的多种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关于这一点，中国政府在否定向他国输出中国模式的同时，也否定崇尚自由民主的西方模式的普适性⁷⁹。另一方面，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认为中国经验可以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关于这一点，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也主张，中国可以和发展中国家共享发展和执政党建设的“经验”⁸⁰。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后，中共趋向于对比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积极宣传中共治理能力的优越性。



中国举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2017年5月）（共同通讯社）

对于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中国政府批评其制造军事敌对关系，是陈旧过时的“冷战思维”，强调要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体现取而代之的“新型国际关系”。按中国的理解，合作伙伴关系一方面互不产生义务，可以灵活运用，另一方面不敌对，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促进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新型国际关系则是以经济为基础，建立合作共赢的关系，使其发展为合作伙伴关系，进而升华为命运共同体⁸¹。

中国之所以支持联合国主导的国际组织，不仅是因为除了联合国安理会之外，允许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参政，更重要的是因为大多数国际组织都将台湾排除在外。另一方面，中国批评欧美主导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仍然偏向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投票权不够充分⁸²。

由于上述不满和批评，习近平政权力求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治理公平合理化、世界多极化。中国认为与全球南方合作，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东”指中国、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西”指以欧美为首的发达国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凸显出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国际体系的严重弊端，国际力量此消彼长⁸³。根据这一观点，以全球南方的相对力量增长为基调的“东升西降”趋势，将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治理公平合理化、世界多极化⁸⁴。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根据政治体制，将国家分为“威权主义”与“民主主义”两大对立阵营，而中国描绘的国际秩序格局，则将更广泛的国家与中国都包含在“东方”内。也就是说，无论是威权主义还是民主主义，只要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就属于中国应当纳入到自己阵营的层次。换言之，习近平政权设想的“中国主导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对抗“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图式，裹挟发展中国家形成多数派，试图推动理想的国际秩序潮流。

在这种国际秩序的变化时期，习近平政权要摸索实践“中国特色大国外交”⁸⁵。其特点之一在于习近平政权提出中国要加强参与全球安全问题。习近平表示，中国要“为世界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推动建设持久和平”⁸⁶，因此提出要“主动参与国际热点

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⁸⁷。国际热点问题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国家、地区及全球安全（和平）和经济繁荣（发展）构成直接或潜在威胁，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诱发国际组织、大国（大国集团）进行协调、调解、斡旋或干预的冲突（或潜在冲突）或危机性问题”⁸⁸，能够处理此类问题的国家才会被视为大国。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在中国斡旋下恢复邦交等，就是中国针对国际热点问题实践大国外交的典型案例⁸⁹。近年来，中国以这种大国外交为名，建立关于其他地区国际争端的安全对话框架，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在内，建立广泛的外交关系⁹⁰。

（2）利用全球南方掌握话语权

为了实现上述理念，中国政府重视掌握“话语权”⁹¹。话语权就是Discourse Power，是指通过一国的话语所包含的概念、逻辑、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力⁹²。中国理解的话语权，不只是提高传播力，也包含将话语纳入到国际制度中，不断制定规则和规范的“制度性话语权”⁹³。中国认为在与欧美斗争中，增强国内和国际话语权不可或缺，因此吸纳在人口规模和国家数量上占大多数的全球南方很重要。

中国认为，进入21世纪，尽管围绕国际话语权的战略竞争日益激烈，但是西方国家保持优势，国际话语权分配明显失衡⁹⁴。一位中国专家指出，“西方优势”在俄乌战争中也一览无遗，在网络空间，“西强东弱”的态势依然显著⁹⁵。

出于这种危机感，习近平在2021年5月进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要“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指示要将西方国家价值观视为对立面⁹⁶。近年来习近平政权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可以理解为：其目的是企图让分别针对欧美的安全观、经济发展观和价值观的反叙事渗透到国际社会中。而且耐人寻味的是，根据印度尼西亚智库——印尼外交政策协会等机构进行的民意调查，东盟（ASEAN）国家对全球发展倡议表示认可，但对全球安全倡议却表示警惕，可见中国掌握主导权的领域不同，全球南方接受的现状也不同⁹⁷。

中国努力在全球南方掌握“话语权”的一个标志性案例，就是中资媒体和企业进驻发展中国家。习近平指示，要利用重要国际会议论坛、外国主流媒体等平台 and 渠道发声，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加大财政投入等，力图增强媒体的国际传播力⁹⁸。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国政府通过中国官方媒体进驻、收购当地媒体，积极开展公共外交⁹⁹。据自由之家披露，对于其调查的65个国家当中的36个国家，中国举办了新闻媒体和信息管理相关的讲座和培训活动¹⁰⁰。

从中国掌握制度性话语权的动向中亦可看出，这是一种尝试，其目的在于掌控国际组织的人事权，主导国际规范的制定工作。全球南方由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组成，针对这些国家开展外交工作的“影子议程”，往往牵涉到在联合国拉票。从2000年代前半期开始，中国政

府一直在为选出中国人担任国际组织高官进行疏通，在联合国专门机构最高职务的选举中，利用77国集团等组织，对于打算拥立候选人参选的发展中国家，以经济援助为杠杆让其退选等，使选战对自己有利¹⁰¹。如表1-2所示，习近平第2个任期的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中国人在4个联合国专门机构担任最高职务。但是，中国围绕联合国人事开展的外交工作，越来越引起欧美国家警惕，中国籍总干事候选人的当选难度越来越大，截至2024年3月，只有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总干事是中国人。

表1-2 在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内由中国人担任最高职务的4个联合国专门机构

机构名称	姓名	任期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屈冬玉 (Qu Dongyu)	2019.7~至今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ICAO)	柳芳 (Liu Fang)	2015.8~2021.7
国际电信联盟 (ITU)	赵厚麟 (Zhao Houlin)	2015.1~2022.12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 ¹⁰²	李勇 (Li Yong)	2015.1~2022.12

(出所) 由撰稿人根据各机构官网编写。

(3) 全球南方在大国竞争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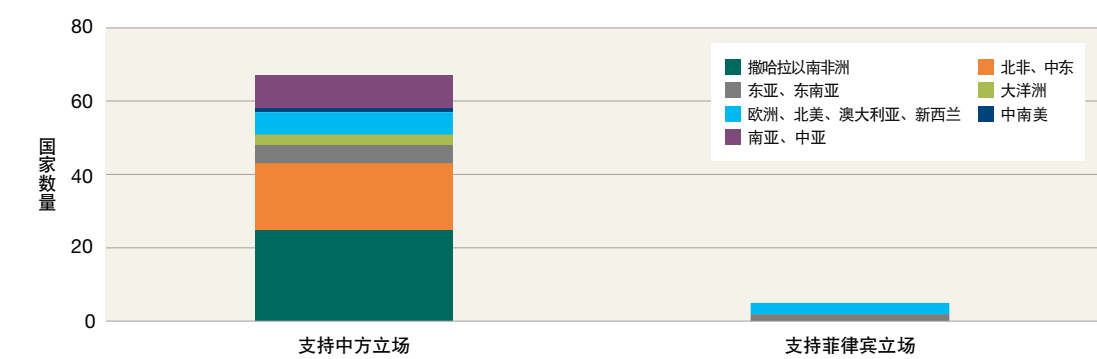
美中战略竞争也影响到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关系。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全球南方的期待，可能主要是加入自己的国际统一战线，至少不要加入美国主导的脱钩断链、批评人权问题等反共反华政策圈¹⁰³。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际，欧美主导的经济制裁并未获得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赞同，这件事起到的作用可能是提高了中国的这种期待，使其更加注重与美国围绕叙事展开斗争。近年来，由于美国围绕中国自身的核心利益采取积极的行动，所以中国注重围绕国际叙事展开斗争，并寻求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中国的核心利益是指涉及到主权和发展的重

要利益，具体而言就是涉及到台湾、香港、西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海洋权益的重要议题。在2016年7月仲裁法院对南海维权相关的中菲对峙作出最终裁决之际，也观察到了中国的这种尝试。仲裁法院的裁决，不承认中国主张的基于九段线的管辖权和“历史性权利”等，基本上满足了菲律宾的主张。对此，中国政府认为仲裁庭裁决无效，而且动员其他国家也作出仲裁庭裁决无效的表态。如图1-2 (a)所示，仲裁庭作出裁决的次日，《中国日报》发表了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70多个国家都支持中国的立场（仲裁庭裁决无效）¹⁰⁴。另外，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根据各国政府表态进行了更详细的统计，调查结果显示，包括约20个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国内，有31个发展中国家支持中国的立场（仲裁庭裁决无效）（参见图1-2

(b))¹⁰⁵。在仲裁法院即将作出裁决之前的2016年5月，中国外长王毅出席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的外长级会议，请求阿拉伯国家联盟和各国支持中国立场¹⁰⁶。中国的这种外交工作也有可能产生了影响。这起南海仲裁案，虽然属于中国经常与核心利益挂钩的海洋问题，但是同时并非中国的内政问题，而是两国之间的国际争端。因此，意味着支持中国立场的国家，根据自身与中国和菲律宾双方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决定了仲裁法院裁决无效这一自身的政治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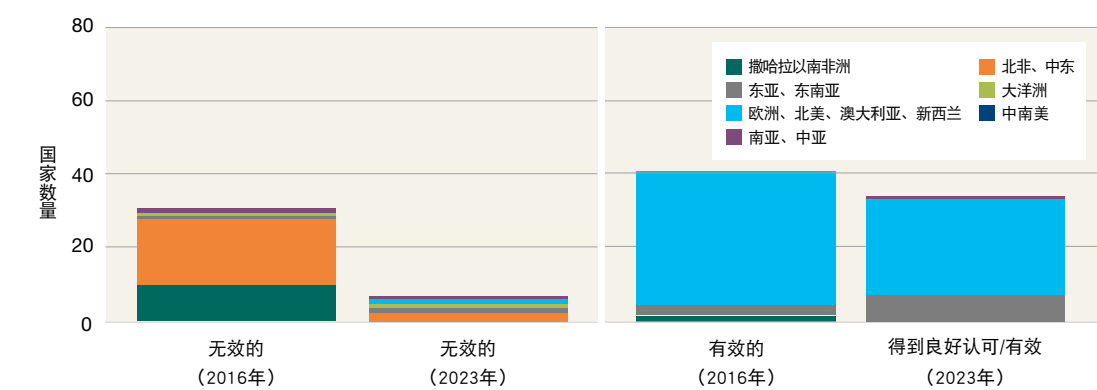
在联合国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权问题进行投票表决时，也能看到同样案例。如图1-3所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最近几年重复进行有关维吾尔族人权问题的投票表决，在在支持中国或对中国表示担忧的声明上签字时，有45~69个全球南方国家在支持中国的声明上签字，远超在对中国表示担忧的声明上签字的国家¹⁰⁷。在反对中国的声明上签字的是欧美国家、日本等一部分亚洲国家，而中国如果得到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组成的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就有可能形成多数派。

图1-2 (a) 《中国日报》各国对仲裁法院裁决的态度



(出处) 由撰稿人根据China Daily, 13 July, 2016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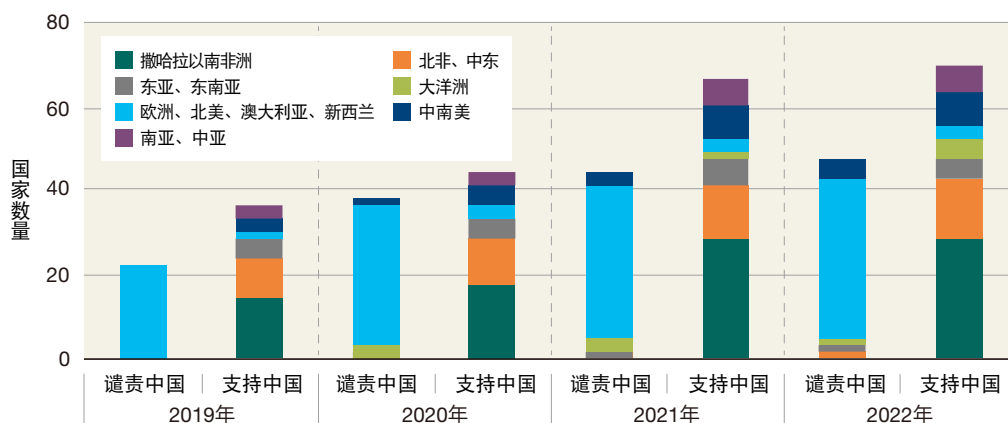
图1-2 (b) 对2016年仲裁法院裁决作出无效和有效表态的国家分布图



(出处) 由撰稿人根据CSIS 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的数据绘制。

近年来，中国对全球南方国家展开外交攻势，在压缩台湾外交空间的同时，力图巩固“一个中国原则”。2016年民进党在台湾总统选举中获胜之后，中国政府与和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全球南方国家建交，同时请求各国严格运用台湾人和台湾代表处享受的待遇¹⁰⁸。最近中国也请求全球南方国家表态支持中国在台湾周边采取的军事行动等。例如，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在同年9月召开的第158届阿拉伯国家联盟外长理事会会议上通过了“阿拉伯—中国关系”决议，中国外交部在该决议中宣称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支持“一个中国原则”¹⁰⁹。而且中国政府也在加强鼓动个别国家，同年9月中埃两国外长举行会谈之际，埃及外长表示，“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一切违反一中原则、升级紧张局势的行径，支持中国采取正当措施维护自身主权（下划线由笔者标注）。埃及反对搞反华阵营，制造对立对抗”¹¹⁰。这种表述亦可解释为，埃及也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佩洛西访台后不久进行的伴随着暂时海空封锁台湾的军事演习和武力威慑。此外，在2024年1月的台湾总统选举中确定民进党政权连任之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列举了“公开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统一大业”的49个国家和3个地区组织的名称，主要是全球南方¹¹¹。对于中国政府要求外国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各国并非囫圇吞枣地接受该要求，而是基于各自的立场对“一个中国政策”进行判断和行事。在国际社会存在各国不同的“一个中国政策”的状态下，中国政府针对围绕“一个中国原则”的各种言论加强对外宣传，以明确反映自己的主张¹¹²。中国政府通过宣传这样的他国声明，有可能将自身在台湾周边进行的军事胁迫活动正当化，并升级该行动。由于东亚以外的地区距离东亚太远，对于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东亚形势的理解不够充分，因此中国通过对外宣传工作形成舆论的余地可谓很大。

图1-3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就维吾尔族人权问题联署支持或谴责中国的变迁



（出处）由撰稿人根据多种资料绘制。

(4) 变化的全球南方与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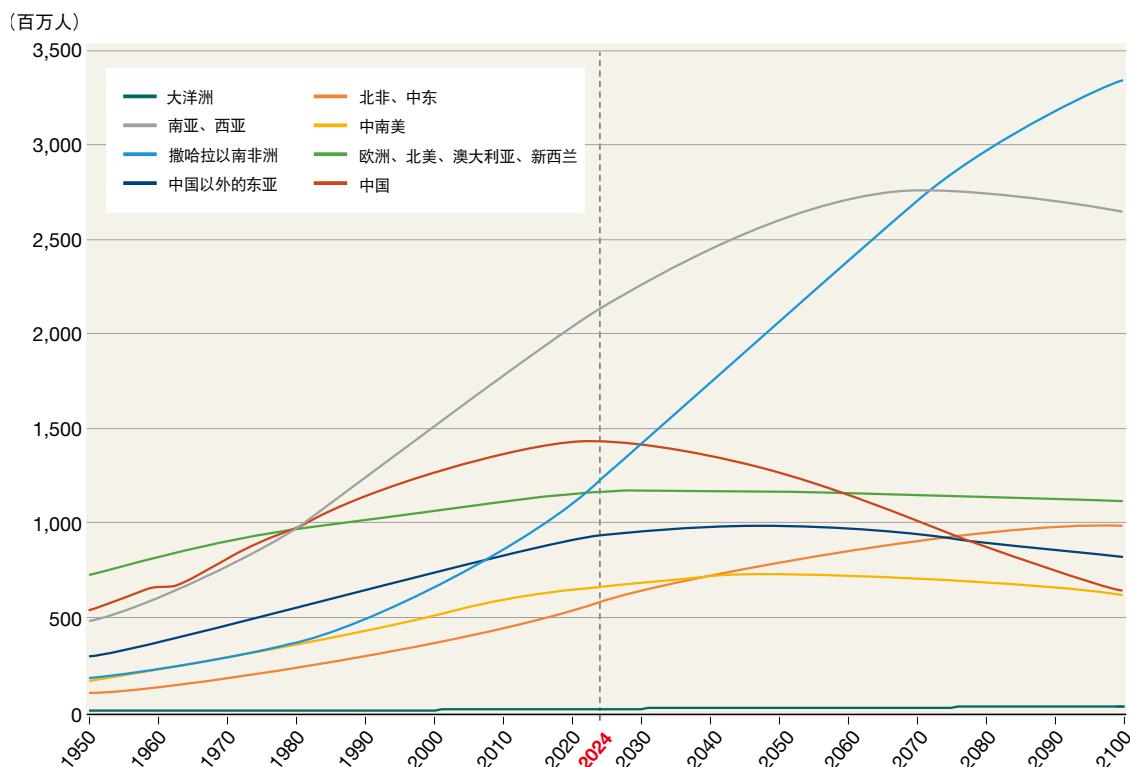
但是,中国联合全球南方国家并非易事。其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是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到全球南方的国际政治作用,不断加强合作。2023年2月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设置了“南北合作:重新调整方针”专场讨论,探讨了西方发达国家如何协助不断崛起的全球南方¹¹³。在同年5月举行的七国集团广岛峰会上,除澳大利亚和韩国外,还邀请了巴西、科摩罗(非盟轮值主席国)、库克群岛(太平洋岛国论坛轮值主席国)、印度(G20峰会主办国)、印度尼西亚(东盟轮值主席国)、越南等主要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多边框架的轮值主席国,发达国家与全球南方加强合作伙伴关系受到关注¹¹⁴。

发达国家不断加强吸纳全球南方,显然引起中方高度警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任琳发出警告称,发达国家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制造排他性,进而分化“全球南方”的凝聚力且增强其掌控力¹¹⁵。任琳将西方国家诱拉全球南方的行为分为以下5种类型:①要求全球南方在国际重大事务上与其保持一致;②减少全球南方对既成的于己有利的治理体系形成冲击;③分化瓦解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与合作;④制造“债务危机中国责任论”;⑤把印度塑造为全球南方的领导者¹¹⁶。

第二是印度等其他新兴国家也在全球南方发挥领导力,中国的领导地位并非理所当然。在全球南方的力量平衡大幅变化的背景下,中国未能应对全球南方的多极化¹¹⁷。有人指出,2023年1月印度主办“全球南方之声峰会”,召集了120多个发展中国家参会,却并未邀请中国参加,使中国方面产生了焦虑¹¹⁸。印度既与中国在国界等问题上对峙,也是日美澳印“四方安全对话”(QUAD)的成员国,与西方国家保持合作关系。因此,印度在全球南方发挥领导力,从中方的角度来看,不仅威胁自己的领导地位,而且很可能被利用来加强西方国家的参与。除印度外,各地区也有地区大国,将来有可能与中国竞争领导地位。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24年发布的推算数据,预计中国面临在本世纪内人口急剧减少的危机,人口规模将低于包括发达国家地区在内的其他地区,而包括印度在内的中南亚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将拥有人口红利(图1-4)¹¹⁹。全球南方力量平衡的相对变化,也会影响其领导地位的重心。

第三是全球南方本身具有多样性和独立性。在国际政治环境下,在全球南方备受关注的状况中,对全球南方的警惕性及其引起的机会主义动向同时加剧。全球南方内部也在分化,既有已在政治经济上崛起的新兴国家,也有贫困和内战依然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其差距不断扩大。如果因为使用全球南方这一说法,导致新兴大国对小国行使其影响力进行剥削,或者因为带有明显反“西方”色彩的政策,导致全球南方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恶化,那么在发展中国家中,全球南方这一说法的吸引力就会下降。换言之,全球南方会成为向心力还是离心力,取决于其含意。此外,发展中国家也有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利用全球南方的一面。据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IDE)分析,全球南方国家在世界经济脱钩断链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保持中立

图1-4 各地区人口变动情况预测



(出处) 由撰稿人根据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4*的数据绘制。

性，与两大阵营进行贸易往来，获得经济利益，可谓“渔翁得利”¹²⁰。在中美战略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如果不能获得相当大的国家利益，全球南方国家也会避免被视为明确“站在中国一边”。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一直认为自己既是发展中国家也是大国，在与全球南方国家深化合作的同时，根据情况有时也会在应对大国关系时利用这一立场。此外，中国在自身作为经济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增强对全球南方国家外交行为的影响力，同时为了保护在各地区不断扩大的本国海外利益，逐步强化军事承诺。但是中国过去一直强调不干涉内政原则，扩大这种参与和利益，也会加深与这项外交原则的分歧。中国在深化与全球南方关系的过程中，也面临着维护各项原则与追求大国利益之间的矛盾。

此外，习近平政权考虑到全球南方将来会崛起，于是不断加强挑战姿态，要求对在欧美主导下形成的国际秩序进行部分改革。而且在美中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中国从战略角度出发，发挥已经建立起来的对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同时力图维护核心利益并掌握国际话语权。但是，在背景复杂多样的全球南方，如果中国没有足够的向心力，发展中国家也会在追求独立性和本国利益的同时，公正地应对中国的联合。

本报告的序章中提到，发展中国家和威权政体与对中国的认可度之间呈现正相关性，但是我们难以验证其因果关系。根据本章可以提出以下因果机制假说：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中国对外援助和经济发展所需的全球治理改革；对威权政体，提出中国针对欧美国家批评政治体制和人权问题的反叙事（承认多种发展模式等）、统治能力相关的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援；两种做法都对“对华认可度”起到正向作用。中国事实上对全球南方究竟有多大的向心力？在后续章节中，我们将从中东和非洲的角度详细探讨这一论点。



中国安全战略报告 2025

崛起的全球南方与中国



路透社/Aflo

第 2 章

中东国家与中国

中国作为与美国有别的大国在中东扩大影响力

西野 正巳、吉田 智聪

前言

近年来，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在2022年12月举行的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的领导人举行会谈，主张双方要扩大合作。2023年3月中国担当斡旋者，促使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在同年10月之后以色列与哈马斯等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时，中国也通过表明支持巴勒斯坦的姿态，提高在外交上的存在感。也门武装组织“胡塞武装”以援助巴勒斯坦为大义名分，在红海等水域发动军事作战，但是该武装组织可能已向中俄承诺将允许两国船舶安全通行。

在中东地区研究中，虽然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本身算是一个较为新颖的论点，但因上述政策动向，近年来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热点。这种研究只是因为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大幅提升，可以说是一种基于政策需求的行为，鲜有涵盖了历史性变迁及其背景的论述。但是就分析中国在习近平政权下加快入局中东的原因而言，重要的论点是中东对中国的战略价值是否已改变？反之中东国家是否已开始重新评价中国的战略价值并寻求扩大合作？关于这一点，梳理中国历届政权的中东政策、中东方面的反应，与习近平政权进行对比，对分析近年来中国的政策动向也不无意义。

虽然关于国家间的“官方”关系，政策动向性论述不断深入，但是关于中东国家存在的有实力的非国家行为体与中国的关系，或者那些非国家行为体是如何认识中国的，甚至在政策动向层面也未得到充分论述。思考本报告的中心主题“中国与全球南方”之际，不能忽视非国家行为体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内政或者由那些国家构成的地区秩序的影响，以及中国对那些非国家行为体的介入。如果仅限于本章，如前所述，胡塞武装对国际政治和经济造成严重影响，而且在20世纪中叶，打着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旗号，旨在颠覆体制的非国家行为体非常活跃。

综上所述，本章将论述①从毛泽东时期到习近平政权的历届中国领导班子对中东国家推行了哪些政策，②中东国家对中国所推行的这些中东政策有何反应。而且其分析对象不仅限于中东和中国的政府间或国家间，也包括中东国家的非国家行为体。第1节以毛泽东时期至胡锦涛时期为对象进行动态分析，毛泽东时期中东政策的重心是在基于反殖民主义的支援民族解放斗争上，而在之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变成了石油净进口国，结果中东政策的重心逐渐转向了经济。第2节从经济、外交、军事和安全方面，对中国在习近平政权下深化与中东国家的关系进行分析。此外，鉴于2023年11月之后胡塞武装在红海等水域实施军事行动的严重性，将分析中国对胡塞武装的反应与胡塞武装的回应。

1 中国在介入中东事务上的变迁

(1) 毛泽东时期：支援民族解放运动以及与中东国家之间的倾轧

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随着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更迭和政策变更而不断改变。1949年建国之初，中国与中东的关系很淡薄。在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中，中国为支援北朝鲜而派遣志愿军，而土耳其军队却作为联合国军的一员从韩国方面参战，因此中国事实上已与中东的一国交战¹。

后来，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亚非会议，中国与埃及、伊朗、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利比亚、叙利亚、沙特阿拉伯、苏丹、土耳其、北也门等国共同参加。于是，中国与中东国家之间发生政治接触，之后二者之间的关系得到发展。当时中国在各地支援与帝国主义战斗的民族解放运动，因此也以那种形式介入中东。会议期间，中国的周恩来总理见到埃及的革命指导委员会主席纳赛尔（后来当选总统）等要人，不仅建立了人际关系，中国还获得了关于中东尚未独立的阿尔及利亚等地区的反殖民地斗争信息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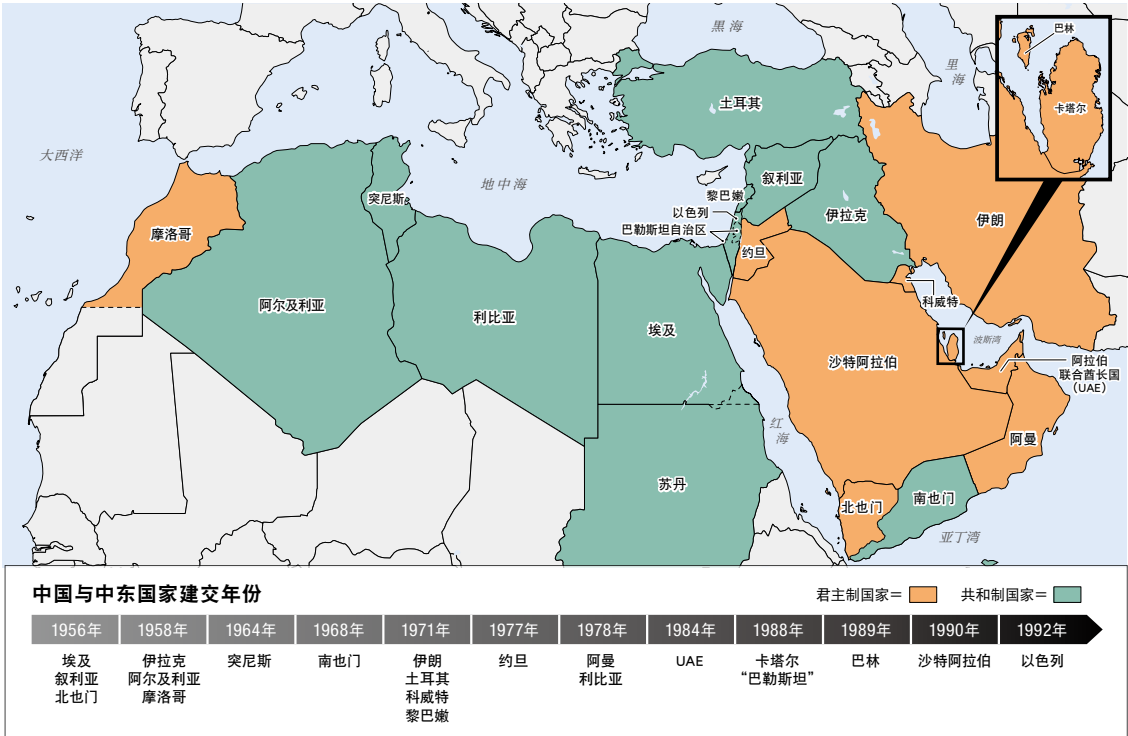
该会议期间，中国向埃及建议，由中国充当埃及从苏联圈购买武器的斡旋者。埃及接受该建议，1955年9月签订了从捷克斯洛伐克向埃及出售武器的合同。中国由此改善了与埃及的关系。1956年4月，苏联表态有条件地赞成联合国对中东实施武器禁运。当时中国尚未获得联合国代表权，不受联合国决议约束。因此，埃及设想在联合国实施禁运时从中国进口武器，同年5月在中东国家中率先与中国建交（参见图2-1）³。

中国以此为契机，1956年7月与叙利亚建交，8月与北也门⁴建交。在与这三国建交时，中国利用了本国的伊斯兰教信徒。1956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包尔汉·沙希迪，以文化交流、麦加朝圣的名义访问中东，分别与北也门和叙利亚的要人、约旦国王侯赛因·伊本·塔拉勒、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进行会谈，但是这些会谈也涉及到政治层面⁵。

1958年1月，北也门皇太子穆罕默德·巴德尔作为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首次访问中国，与中国签署了友好条约。中国向北也门提供贷款，承接高速公路等建设项目，同年中国技术人员在北也门开始活动。此案例说明，中国在阿拉伯半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始于1950年代⁶。

这一时期，中国开始支援中东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所认为的民族解放运动）。位于阿拉伯半岛南部的阿曼，当时分裂为两个国家，一个是位于内陆地区，由伊斯兰教伊巴德派的伊玛目（最高领导人）统治的阿曼伊斯兰教长国；另一个是位于沿海地区，由本·赛义德王朝君主苏尔坦统治的阿曼苏丹国⁷。在形式上，根据1920年双方签订的《锡卜条约》，阿曼苏丹国承认内陆地区的阿曼伊斯兰教长国自治。1954年，加利卜·希奈成为阿曼伊斯兰教长国新任伊玛目。当时，阿曼苏丹国在英军支援下进攻阿曼伊斯兰教长国。可能是因为在内陆地区发现了油田，阿曼苏丹国想要谋取其权益。关于这场交战，按照中国的解释，阿曼伊斯兰教长国是在

图2-1 中国与中东国家建交年份地图



(注1) 阿尔及利亚虽于1962年独立，但此前中国已与临时政府建交。
(注2) 南北也门已于1990年统一。
(注3) 伊朗与中国建交时为君主制国家，因此图示为君主制国家。
(注4) 1988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单方面发布巴勒斯坦国独立宣言，同年中国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
(出处) 由撰稿人绘制。

抵抗与英国勾结的阿曼苏丹国，也就是说属于民族解放运动。于是1957年中国建议向阿曼伊斯兰教长国提供武器。但是，阿曼伊斯兰教长国反对接受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援助，因此谢绝了该建议。最后，1959年阿曼苏丹国胜利，阿曼伊斯兰教长国灭亡，但是后来抵抗力量仍在该国继续活动⁸。

中国也参与支援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当时，宗主国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镇压独立运动。1954年独立运动组织成立民族解放阵线（FLN，以下简称“民阵”），1958年之后，法国军队与民阵的战斗日益激烈。而1958年，中国正式开始支援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1958年至1962年，中国以提供资金和武器、协助训练的形式支援了民阵。1958年9月，民阵让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作为流亡政府在埃及首都开罗成立，中国立即承认了该临时政府。并且同月，中国开始接待民阵的各种代表团访华。同年12月，中国作为首个阿拉伯国家以外的国家与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1959年，该临时政府的军队代表团多次访问中国。可能是因为当时中国经济实力薄弱，所以中国的军援规模有限，实际支援以政治表态为主。但是，与赢得国共内战的中国建立关系，对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民阵很有吸引力⁹。

1958年2月，埃及与叙利亚合并，成立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当时，埃及总统（也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纳赛尔，试图在埃及主导下合并阿拉伯国家，建立一个庞大的国家。对此，中国担心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独立性会因合并而受损。1958年7月，伊拉克爆发革命，王朝被推翻，共和国诞生，中国于是与该国建交。之后在伊拉克，寻求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合并的集团与寻求维护伊拉克独立性的集团（伊拉克一国主义派）互相对立。因为伊拉克共产党配合了伊拉克一国主义派，所以中国支持伊拉克一国主义派，批评寻求合并的集团背后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59年9月，中国邀请当时属于非法组织的叙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哈立德·巴格达什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建国十周年庆典，巴格达什发表了谴责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演讲。中国邀请一个因合并而消灭的国家的非法组织领导人发表演讲，这一行为包含了中国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否定性姿势。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将此举视为干涉内政，谴责了中国。后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1961年解体，埃及和叙利亚重新变成各自独立的国家¹⁰。

1962年9月，在北也门，访问过中国的皇太子穆罕默德·巴德尔继任国王之后不久发生军事政变，王朝被推翻，建立了共和国。之后，前国王为恢复王朝而发动内战，但是中国并未与之联合，而是迅速承认共和国并保持邦交¹¹。

后来到了1960年代中期，中国对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日益冒进。其原因有两点：①随着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其冒进式国内政策也反映到外交政策中；②中苏对立表面化。这一时期，中国的主要支援对象是后来成为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基础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以下简称“巴解组织”）和阿曼反政府武装组织。当时中东的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共和制阿拉伯国家，大都接受苏联提供的大规模军援，与苏联关系密切，但是这两个组织并未接受苏联提供的支援。中国旨在通过支援与苏联关系淡薄的势力，在苏联尚未涉足的地区和领域建立影响力，取得比苏联优越的地位¹²。

1964年，巴解组织作为一个代表巴勒斯坦人的组织，由阿拉伯国家的地区性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倡导创立。1965年3月，巴解组织主席艾哈迈德·舒凯里率领代表团访问中国，与毛泽东会谈，就巴解组织在北京设立享有外交机构待遇的办事处达成一致。于是，1966年中国开始向巴解组织提供中国制造的轻型武器，让巴解组织的战斗人员在中国进行军事训练。但是，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当时表面上支援巴解组织，实际上希望控制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人，不予其行动的自由。因此，中国事先未与阿拉伯国家协商，就向巴解组织直接提供支援，招来阿拉伯国家的反感¹³。

另一方面，1964年阿曼南部的佐法尔地区为了分离独立，成立了反政府武装组织佐法尔解放阵线（DLF，以下简称“佐解阵”），该组织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佐法尔地区与南也门接壤。当时属于英国保护领地的南也门正在进行独立运动。1967年南也门独立，成为一个共和国，一直在英国保护领地存续的多个小型酋长国（即君主制国家群）灭亡，并且该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南也门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势力发展壮大的这一时期，在相邻的佐

法尔地区，佐解阵在阿曼苏丹国发动了叛乱，中国向其提供援助。

中国提供的援助，对增强佐解阵及其后继组织的军事力量起到重要作用。1967年，佐解阵代表团受邀访华，同年佐解阵收到中国首批援助物资，包括轻型武器和毛泽东思想文献等。1968年1月中国与南也门建交。1968年9月，佐解阵召开会议，改组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政府武装组织“被占领的阿拉伯湾人民解放阵线（PFLOAG，以下简称“阿湾人阵”）”，在理念上，新组织的目标不仅限于佐法尔地区，而是在整个阿拉伯湾地区推翻君主制并建立共和制，中共党员也出席了这次会议。1968年后半期，中国承诺扩大对阿湾人阵的军援，包括地空导弹和机关枪。1969年7月，中国在亚丁设立驻南也门大使馆，通过该大使馆加强支援阿湾人阵。中国直接或通过南也门军援阿湾人阵，据说位于与阿曼接壤的南也门领地内的阿湾人阵基地里有中国教官。自1969年起，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从亚丁向现场派遣特派员报道战况。当时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阿湾人阵发动的叛乱，在中国是被作为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来报道的。而且，阿湾人阵为使毛泽东思想渗透到组织中，特地派成员到中国接受政治和军事教育¹⁴。

中国的此类行为，也就是支援旨在推翻现政权、建立新政权的民族解放运动，与今天中国外交奉行的不干涉内政原则迥异。中国一则不仅未确认阿拉伯国家的意愿就直接支援巴解组织，二则军援旨在推翻君主制的阿拉伯半岛反政府武装组织。当时的阿拉伯半岛，在南北也门都诞生了共和国，君主制国家面临着共和制蔓延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却以违背这些国家意愿的形式支援阿曼的叛乱势力。因此，阿拉伯半岛的君主制国家大都负面评价中国，结果这些国家很晚才与中国建交。

然而，1971年中国终止支援阿湾人阵之类的中东反政府武装组织，将其外交政策路线从支援冒进的民族解放运动转向谋求与国家政权合作。之所以转变方针，是因为中国外部的国际环境发生了以下变化：首先，①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爆发后，中苏对立升级，苏联成为中国的主要敌人；②阿拉伯半岛的大多数国家都在英国的保护和影响下，但是英国宣布到1971年底为止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军，包括阿拉伯半岛，因此随着英国的撤军，以前属于英国势力范围的场所有可能出现力量真空；③由于当时美国将资源分给越南战争，不清楚其能否马上接管英国势力范围；因此，④中国担心会出现苏联进入英国势力范围扩大其影响力的事态¹⁵。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认为，不稳定的阿拉伯半岛环境有利于苏联扩大其影响力¹⁶。因此，中国作出了对本国更有利的判断：与其在阿拉伯半岛支援反政府武装组织，助长不稳定，不如与国家政权合作，稳定地区局势。1971年3月中国与科威特建交，同年8月与伊朗建交。两国均为君主制国家，对于将苏联视为主要敌人的中国而言，在安全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伊朗和中国都与苏联接壤，都将苏联视为威胁。而且，与苏联关系密切的伊拉克，被视为苏联进驻阿拉伯半岛方面的桥头堡，而科威特却在地理上位于阻止伊拉克（与苏联）进驻半岛的位置。

再者，伊朗和科威特支援与阿湾人阵作战的阿曼苏丹国。因此，两国与中国建交后向其施压，要求终止支援阿湾人阵。中国认为与两国的关系比与阿湾人阵的关系更为重要，于是终止了支援¹⁷。

不仅如此，1971年10月中国获得联合国代表权，成为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于是，中国深入参与国际组织，进而促进了中国谋求与国家政权合作的外交政策路线。这一时期，中国采取了将1974年巴解组织在北京设立的办事处升级为大使馆等措施，表面上继续支援巴解组织，但实际上厌恶巴解组织部分成员的过激行为，减少了实质性支援。这也是中国转变外交政策路线的一种体现¹⁸。

(2) 邓小平时期：中苏继续对立与积极出口武器

1976年毛泽东死后，到1980年代前半期为止，中国确立了邓小平体制。邓小平时期的中国，一面开启和推动改革开放，一面继续处理中苏对立。而且在邓小平时期的1980年代，两伊战争爆发，当时中国向交战国双方积极出口武器。

1978年5月，中国与阿曼（阿曼苏丹国）建交。中国终止支援阿曼的阿湾人阵之后，阿曼到1976年已经镇压了阿湾人阵及其后继组织发动的叛乱，因此中国与阿曼之间围绕这一问题产生的对立已经成为过去。而且当时，苏联在阿曼的邻国南也门增强影响力，因此阿曼将苏联视为主要威胁，认为中国会有效抗衡苏联。这些都是促成两国建交的因素。两国都担心苏联在阿拉伯半岛扩大其影响力，因此两国关系迅速带有战略重要性。当时，半岛的其他君主制国家依然不信任中国，后来阿曼起到帮助这些国家与中国建交的作用，结果中国在1980年代相继与阿联酋、卡塔尔、巴林建交。

1979年，对于阿拉伯半岛的君主制国家而言，安全环境发生激变。同年，苏联侵略阿富汗，被视为苏联怀有进驻中东野心的证据。在伊朗，亲美王朝被推翻，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共和国诞生，使半岛的君主制国家担心本国内的什叶派居民与伊朗勾结。这种动荡的安全环境，对于外交政策路线已经转向谋求与国家政权合作的中国而言，成为改善与半岛的君主制国家之间关系的良机¹⁹。

同样是在1979年，埃及在阿拉伯国家里率先与以色列签订了和平条约，摆脱了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中东战争格局。当时，其他阿拉伯国家都谴责埃及，中国却不反对埃及的方针，而是采取了在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巴解组织之间保持平衡的立场²⁰。

而且在1979年，中国与以色列开始进行秘密军事合作。这就是中国与以色列关系的起源。同年，中越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必须升级苏制武器，但因中苏对立，陷入了得不到苏联配合的困境。以色列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和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不仅从叙利亚军队和埃及军队缴获了大量苏制武器，而且后来将这些武器改造后，在本国军队中使用，所以精通苏制武器的使用，因此以色列得以成为向中国供应苏制武器的国家。而且，1967年第三次

中东战争爆发之际，由于军援阿拉伯国家的苏联与以色列断交，因此以色列在配合中国升级苏制武器时，无需顾忌苏联。也就是说，以色列与苏联没有邦交关系，中国与苏联对立，两国处于容易合作的状况。1979年，以色列代表团秘密访华，同意向中国出售武器，于是两国之间开始进行秘密交易。以此为契机，以中关系暗中取得进展。此举使得中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降低了与以色列对抗的姿态²¹。

1980年，伊拉克趁着伊朗革命混乱之际进攻伊朗，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爆发。围绕这场战争的国际关系略为复杂。伊拉克属于亲苏联的东方。而前一年诞生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却在形式上采取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的立场，并且开战时正逢美国大使馆人质事件进入高潮。而且当时的伊朗有意向周边阿拉伯国家输出什叶派革命。其结果，担心本国体制被颠覆的沙特阿拉伯等阿拉伯国家支援伊拉克，面临大使馆人质事件的美国和一直与伊拉克关系密切的苏联也基本上支援伊拉克。对此，中国不是袒护哪一方，而是向伊朗和伊拉克双方积极出口武器。中国也向伊朗出售武器的理由，除了经济利益之外，可能还有担心当伊拉克胜利时，苏联在中东的影响范围扩大，对中国不利。结果，与拥有多个武器供应国的伊拉克相比，对于伊朗而言，中国变得更加重要。1981年中国首次向伊朗出口武器，出口的是107毫米火箭炮。此外还向伊朗出口了战斗机、坦克、地空导弹、岸舰导弹等武器。两伊战争中，伊朗从中国进口了价值约20亿美元的武器，而伊拉克从中国进口武器的价值则是其两倍多。中国致力于武器出口，成功获得经济利益。中国对中东的武器出口额在两伊战争时期达到顶峰，时至今日仍未恢复到当时的水平。伊拉克和伊朗在这场战争中，发动“油轮战争”，互相攻击驶离对方国家的石油运输船，两国军队都使用了从中国进口的“蚕式”反舰导弹。因此，海湾地区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石油运输受阻²²。

1981年，沙特阿拉伯解除了以前的对华贸易禁令，之后双边贸易额不断增加。两国的企业家频繁访问对方国家，两国的人员交流不断扩大。于是在1985年，沙特阿拉伯为从中国购买弹道导弹，开始进行秘密谈判。沙特阿拉伯起初为了遏制伊朗和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中使用的苏制飞毛腿弹道导弹，打算从美国购买潘兴弹道导弹。但是美国拒绝了沙特阿拉伯的要求。并且美国还拒绝了沙特阿拉伯购买F-15战斗机等要求。沙特阿拉伯无法从美国这个主要供应国购买武器，因此选择了从中国购买。经过有实力的沙特阿拉伯王室成员也参与的两国间秘密谈判，1988年沙特阿拉伯从中国购买了东风-3A弹道导弹。据说销售额为10~15亿美元。通过贸易与安全挂钩的这笔交易，双方建立了信赖关系。对于沙特阿拉伯而言，该交易的好处是武器供应国的多样化²³。

1988年11月，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亚萨尔·阿拉法特宣布巴勒斯坦国成立，当时中国迅速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此举说明，中国虽然与以色列进行秘密军事合作，但在外交上却一如既往地坚持支援巴勒斯坦的方针²⁴。

(3) 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扩大经济关系

中国通过1988年出售弹道导弹等，与沙特阿拉伯建立了信赖关系，于是1990年两国建交。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与台湾断交，台湾在中东地区的邦交国因此消亡。1991年，李鹏总理成为首个访问沙特阿拉伯的中国高官²⁵。

1992年中国与以色列建交。由此，中国终于与所有中东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中国与巴勒斯坦问题的双方当事人都保持关系，因此可以参加巴勒斯坦问题相关的多边磋商²⁶。

1993年，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的石油消费量不断增加，结果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后，中东作为能源供应源、市场和投资目的地，对中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²⁷。

同样在1993年7月至8月，美国海军根据中国的全集装箱货轮“银河号”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材料的情报，对“银河号”进行了强制性登船检查，却未发现原材料。美国拒绝了中国提出的道歉要求，这起事件成为中美关系恶化的一个原因。1992年伊朗总统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访华之际，伊朗与中国签订了《核技术合作协定》，因此当时中国协助了伊朗的民用核开发计划。此外，1993年1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穆赫辛·雷扎伊访华，就从中国购买舰艇等武器装备进行了谈判。就在中国合作取得进展的这一时期，发生了银河号事件。但是，中国到1997年终止了协助伊朗核研制计划²⁸。

中国与以色列建交的结果是可以更加公开地接触以色列的先进技术了。可是，中国与以色列推进军事合作，也就是以色列进一步向中国出口武器，可能会使东亚的军事平衡对中国有利，因此遭到美国反对。在1979年之后的20年里，在以色列的支援下，中国的坦克、夜视系统、电子战系统、空空导弹、无人机技术等得到升级。1994年，以色列向中国出口了哈比无人机，这是一款著名的自杀式无人机。可是，2000年以色列迫于美国的压力，撕毁了向中国出售“费尔康”空中预警控制系统的协议。此外，2005年以色列计划对1990年代向中国出口的哈比无人机进行技术升级，但因遭到美国施压而撕毁了与中国签订的技术升级协议。这些事件导致后来以色列与中国开始力求在不属于敏感安全领域的范围内加强合作。中以两国合作取得进展之后，中国在联合国依然坚持从支援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的立场出发的投票行为，以色列默认此举。中国一面与以色列加强实质性关系，一面以表明政治立场的形式继续对巴勒斯坦提供象征性支援²⁹。

中国与沙特阿拉伯也在双边关系上取得了进展，包括安全领域。1998年，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后来成为国王）访华，与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谈；1999年，国家主席江泽民成为首位出访沙特阿拉伯的中国国家主席，访沙期间与国王法赫德·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会谈。2002年底至2003年，美国提出“大中东民主计划”，并在这种情况下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因此当时中国和沙特阿拉伯都不相信美国的政治普世主义，这一点巩固了两国关系。2006年至2009年，包括阿卜杜拉国王

即位后将中国作为出访的首个国家，两国元首进行了三次国事访问，这一点说明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得到提升。2007年，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签订了出售54门PLZ-45型自行榴弹炮的协议。同年，中国还向沙特阿拉伯秘密出售了东风-21弹道导弹。而且根据同年两国之间达成的协议，中国企业可以直接参加沙特阿拉伯项目的投标³⁰。

在此期间，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与中东国家的贸易进一步扩大。2004年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埃及之际，成立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框架——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CASCf）。之后，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原则上每两年在中国或阿拉伯国家轮流举办一次部长级例会³¹。

2008年，中国与阿联酋签署了防务合作协定。在此之前的1990年5月，阿联酋总统扎耶德·本·苏尔坦·阿勒纳哈扬作为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CC）国家的元首率先访华，与江泽民总书记会谈，1990年代之后，阿联酋作为产油大国，与中国迅速扩大贸易额，不断加强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签署防务合作协定之后，两国安全领域的高官频繁接触，2009年中国在迪拜国际航空展上展示了L-15高级教练机³²。

2008年底，中国海军开始执行护航任务，维护索马里海域和亚丁湾的海上通道安全。该地区的也门和索马里都是不稳定的国家，因此政局稳定的阿曼与中国之间的安全合作，随之得到了进一步加强。2009年之后，阿曼的萨拉拉港因为地理上的便利性，成为中国海军的定期补给休整港口³³。

2009年7月，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生骚乱导致许多居民死亡之际，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谴责了中国。但是，土耳其顾忌中国，曾在2006年和2007年拒绝给海外维吾尔人领袖热比娅·卡德尔发放土耳其入境签证，因此这种谴责对土中两国关系的影响不大³⁴。

2011年，随着中东发生“阿拉伯之春”，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政权与反政府武装组织之间爆发内战。当时，很多中国人在利比亚工作，中国派遣正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导弹护卫舰等，撤离了3万多名本国侨民³⁵。

2 习近平政权下的中国不断扩大对中东事务的介入

（1）深化经济和外交纽带

2013年上台的习近平政权，加强江泽民时期之后的与中东的经济合作，同时以2014年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为开端，进一步深化了中东政策。习近平政权为将阿拉伯国家拉到一带一路上来，在该届会议上提出了要构建“1+2+3”合作格局，“1”是以能源合作为主轴，“2”是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3”是以核能、航天卫星、

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³⁶。这一格局被指带有中国未曾对阿拉伯国家表示过的战略性³⁷。习近平政权在外交方面，也与中东各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体现在第1章中提到的“新型国际关系”，同时通过为化解中东地区冲突提供对话平台等，加深了关系。在经济和外交方面深化纽带，就像2023年3月中国促成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同意恢复邦交的斡旋一样，赋予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独特地位³⁸。而且可以说，中国一直寻求通过相互确认尊重不干涉内政原则，在涉及台湾、香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南海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³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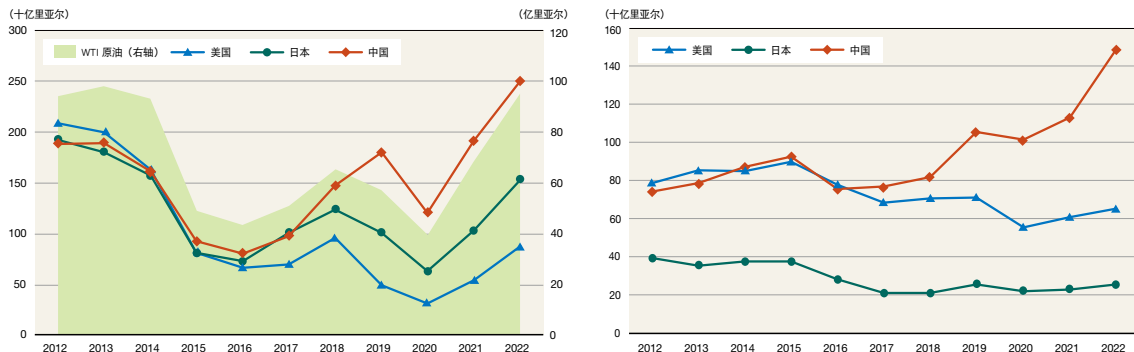


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2022年12月）（新华社／Kyodo News Images）

虽然“1+2+3”合作格局以所有阿拉伯国家为对象，但是阿拉伯国家不仅在地理上分布广泛，而且政治稳定性和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因此有望促进该格局的合作伙伴，必然以石油等天然资源得天独厚、富裕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为主。而且2021年，伊朗这个反美的中东地区大国也与中国签署了为期25年的中伊全面合作计划等，近年来进一步加深了与中国的关系，本章在分析中东国家（并非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时，不能忽视其动向。加之中方一直以国家利益为基准来划分与中东国家外交关系的亲疏等级，所以本节前半部分在关注整个中东地区动向的同时，以地区大国伊朗、沙特阿拉伯和正在变成准大国的阿联酋与中国的关系为主要分析案例⁴⁰。

中国不断扩大经济合作并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因此中东国家超越地区内对立格局，深化了与中国的关系。中东国家与中国走近，主要有三个原因：①经济方面的现实利益；②威权政体的亲和性；③西方阵营（欧美）没落与东方阵营（中俄）崛起的认知。原因①对于在“2030愿景”推动下进行经济改革和开发的沙特阿拉伯等所有中东国家至关重要⁴¹。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的贸易额逐年增加，对于沙特阿拉伯而言，中国既是第一大进口国也是第一大出口国（而与美国的贸易额却逐年减少）（参见图2-2、表2-1及表2-2）。而对于濒临印度洋的阿曼，中国通过“中国-阿曼产业园”等一带一路倡议相关项目，向港口城市杜古姆进行投资⁴²。阿曼成立杜古姆经济特区，旨在发展非石油产业（经济多元化），因此中国是重要的开发合作伙伴⁴³。此类案例不胜枚举，2017年至2022年的5年里，中国与中东的贸易额从2,625亿美元急剧扩大至5,072亿美元⁴⁴。换言之，沙特阿拉伯等产油国渴望摆脱过去的石油依赖型经济，而习近平政权提出的“1+2+3”合作格局和一带一路之类的全面经济合作设想，可以说起到了这些国家与中国深化经济纽带的有效框架的作用。而且对于2018年8月之后重新受到美国经济制裁的伊朗而言，中国几乎是能够大量买进其石油的唯一进口国⁴⁵。据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分析，截至（制裁重启前的）2018年上半年，伊朗石油出口的对华出口占比为26%，而到2023年上半年已升至91%⁴⁶。

图2-2 沙特阿拉伯对日美中出口额（左）与自日美中进口额（右）的变迁



(注) 石油占沙特阿拉伯出口额的比重往年在75%至85%附近波动, 就连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原油价格暴跌的2020年也为68.7%。由于该国的出口额容易受到原油价格的影响, 因此附上代表性原油价格指标WTI原油价格以供参考。

(出处) 由撰稿人根据沙特阿拉伯统计局数据绘制。

关于原因②, 相互确认不干涉内政, 可谓是一项有利于中国和中东国家的外交方针, 因为双方都被指侵犯人权。以阿联酋为例, 2019年谴责中国在新疆等地侵犯人权的联署声明发表后, 阿联酋在支持中国的对抗声明上签字⁴⁷, 2022年甚至有报道称阿联酋设有拘留维吾尔人的秘密监禁设施⁴⁸。2021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也发表了关于新疆等地人权状况的声明, 但是在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关切的声明上签字的只有以色列, 而沙特阿拉伯、伊朗、阿联酋等大多数中东国家却在支持中国的声明上签了字⁴⁹。而且2011年爆发反政府运动之后, 阿联酋为了管控国内局势, 不断加强电子监控⁵⁰, 被指效仿中国的数字威权政体⁵¹。此外, 对于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也有研究人员从巩固威权政体的一面加以分析。其分析结果表明, 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带来的物质利益虽然很少, 但是该组织不仅成为一个促进威权主义成员国的合法性并对抗外部批评人权问题的平台, 而且起到维护体制网络的作用⁵²。综上所述, 由于西方国家有时会对人权问题发难, 因此相互确认不干涉内政, 对于中国和中东国家双方而言, 可能起到了回避西方国家的压力、深化威权主义国家间合作的作用⁵³。

与原因①和原因②相比, 关于原因③中的以中俄等国为代表的东方阵营崛起, 中东国家提及这一点可能是其与中国走近的更深层次原因。伊朗最大声强调国际秩序的变化, 该国的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⁵⁴、总统易卜拉欣·莱希等人, 多次指出美国衰退和中俄等国崛起⁵⁵。莱希政权以这种认知为基础, 并以前任总统哈桑·鲁哈尼执政时期唐纳德·特朗普政权退出伊朗核问题协议为教训, 转向“东方外交⁵⁶ (look east)”——重视与中俄和周边各国家之间关系的外交⁵⁷。

伊朗反美, 因此发表这种言论不足为奇, 但是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中东地区的美国盟友, 也在表达一种认知——国际秩序正从美国主导的单极转向多极⁵⁸。2023年6月, 沙特阿拉伯投资部部长哈利德·法利赫表示, 沙特将中国视为已到来的多极世界的重要合作伙伴, 他不认为沙特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相互排斥的⁵⁹。这种世界观已被后述的美国退出中东论

表2-1 沙特阿拉伯前五大出口贸易伙伴国

	第1		第2		第3		第4		第5	
2012年	美国	208,339	日本	192,201	中国	188,229	韩国	133,585	印度	120,841
2013年	美国	199,060	中国	188,936	日本	179,825	韩国	131,750	印度	129,444
2014年	美国	162,460	中国	160,685	日本	156,821	韩国	123,557	印度	113,829
2015年	中国	92,069	日本	80,683	美国	80,525	印度	72,052	韩国	66,099
2016年	中国	79,916	日本	72,342	美国	66,128	印度	63,880	韩国	57,432
2017年	日本	100,382	中国	97,354	韩国	74,027	印度	73,801	美国	68,867
2018年	中国	146,703	日本	123,646	印度	98,689	韩国	97,592	美国	95,622
2019年	中国	179,669	印度	100,703	日本	100,365	韩国	78,155	UAE	50,609
2020年	中国	120,016	日本	62,307	印度	60,208	韩国	54,379	UAE	44,349
2021年	中国	190,911	日本	102,598	印度	99,966	韩国	87,342	UAE	56,481
2022年	中国	249,926	印度	157,187	日本	152,890	韩国	142,159	美国	87,117

(注) 单位是100万里亚尔。

(出处) 由撰稿人根据沙特阿拉伯统计局数据编写。

表2-2 沙特阿拉伯前五大进口贸易伙伴国

	第1		第2		第3		第4		第5	
2012年	美国	78,770	中国	74,195	德国	41,367	日本	38,989	韩国	35,467
2013年	美国	85,376	中国	78,488	德国	44,812	韩国	36,018	日本	35,153
2014年	中国	87,122	美国	84,730	德国	47,093	日本	37,306	韩国	32,336
2015年	中国	92,398	美国	89,678	德国	46,116	日本	37,286	韩国	37,251
2016年	美国	77,728	中国	75,309	德国	34,331	UAE	28,616	日本	27,821
2017年	中国	76,971	美国	68,086	UAE	32,831	德国	29,497	法国	21,853
2018年	中国	81,821	美国	70,642	UAE	43,441	德国	28,306	印度	21,973
2019年	中国	105,571	美国	71,024	UAE	39,806	德国	27,649	日本	25,367
2020年	中国	101,562	美国	55,145	UAE	34,287	德国	26,869	印度	24,530
2021年	中国	113,381	美国	60,549	UAE	46,770	印度	30,277	德国	28,093
2022年	中国	149,252	美国	65,002	UAE	45,103	印度	39,509	德国	30,000

(注) 单位是100万里亚尔。

(出处) 由撰稿人根据沙特阿拉伯统计局数据编写。

印证，再加上巩固与中国的关系所带来的经济和外交利益，因此一直被认为亲美的中东国家会制定出不排斥与美国倾轧的外交政策。

(2) 介入军事和安全领域

就像在经济领域扩大影响力一样，在军事和安全领域，中国也要取代美国成为影响中东地区安全的核心行为主体吗？关于这个问题，以往研究的答案大多是否定的⁶⁰。其原因包括美国依旧通过在驻中东美军基地部署部队来保留影响力，以及中国自身缺乏投射战力的能

力和意思。还有人指出，中国在能源安全上存在“搭便车 (free riding)”或“占便宜 (cheap riding)”的一面⁶¹。

然而，认为中国不会成为在安全领域取代美国的行为主体，并不意味着中国未在中东地区扩大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势力。实际上习近平政权的中国，在合作程度不如经济领域的军事和安全领域，不断深化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关于中国军队介入中东国家事务，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的孙德刚称之为“柔性军事存在”，强调其目的并非地缘政治竞争，而是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保护本国侨民⁶²。但是（孙德刚表述为刚性的）军事基地的建设目前有可能正在加快，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军事和安全关系在进一步加强。美国认为中国军队很可能要在阿联酋建设军事后勤设施⁶³，2021年有报道指出，中国疑似历时一年在阿布扎比的哈里发港建设军事设施⁶⁴。虽然当时中国迫于美国的压力终止建设，但是据《华盛顿邮报》2023年4月报道，中国可能已重启在阿联酋内的军事设施建设项目⁶⁵。而且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的一份泄密文件显示，中国正在实施一项名为“141项目”的军事基地和后勤保障基地建设计划，阿联酋是被该项目列为候选地的唯一一个中东国家⁶⁶。此外2023年11月有报道指出，中国可能计划在阿曼建设军事基地，阿曼也愿意接受相关协议⁶⁷。这些设施和基地建成之后，依赖吉布提的中国军队向中东和非洲方面的战力投射能力将会提高。

关于基地建设，虽然并非确凿信息，但准确性更高且已被曝光的现象是，中国与中东各国在国防工业和武器装备领域不断巩固关系。正如本章第1节所指出的，虽然中国对中东出口武器的总额并未增加，但是中国加快出口无人机和导弹相关的产品，并在中东地区加快建设生产基地⁶⁸。2023年3月，就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的问题，美国指控中国企业供应关键零部件，因此对相关企业实施制裁⁶⁹，实际上同年6月有报道指出，被乌克兰击落的伊朗无人机上有中国制造的零部件⁷⁰。2023年6月6日，伊朗还公开展示了首型国产高超音速导弹“征服者”，但在同一天，美国财政部以参与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为由，宣布制裁⁷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企业。伊朗寻求与以色列和美国在国外作战的“前沿防御战略”，因此无人机和导弹成为重要武器，中国可能是制造这些武器的零部件和设备的供应源之一。

在安全上（包括武器装备）依赖美国的国家，也出现中国入局无人机等领域的迹象。沙特阿拉伯不仅疑似在中国支持下研制弹道导弹，而且已经采购中国制造的翼龙2和彩虹4无人机⁷²。沙特阿拉伯和同样不断采购中国无人机的阿联酋，很可能已在实战中使用了中国无人机。2015年3月之后，沙特阿拉伯为了清剿胡塞武装，牵头组建多国联军，与阿联酋等国家共同介入也门内战，实施了多达2万5,054次空袭（2015年3月26日～2022年3月31日）⁷³。另一方面，胡塞武装吸收了一部分也门政府军，拥有防空部队，可能不仅击落了沙特阿拉伯军队的“狂风”多用途战斗机、摩洛哥军队的F-16战斗机等，而且击落了翼龙2和彩虹4⁷⁴。此外，2018年胡塞武装当时的总统⁷⁵萨利赫·阿里·萨马德死于空袭，据说就是阿联酋空军的一架中国无人机所为⁷⁶。鉴于上述情况，即使中国对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的军事和安全造成的影响不如美

国，也可谓在挤进导弹、无人机等现代战争的关键武器领域。

综上所述，就连历来在军事和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都与中国走近，有两个重要原因可以解释这一现状。其一，在这些中东国家的眼中，在沙特阿拉伯国内制造中式无人机之类的案例，在经济领域（振兴国防工业）的意义反倒大于军事领域⁷⁷。本节开头提



在迪拜国际航空展上展出的中国翼龙2无人机(2017年11月)
(图源：法新社=时事通信社)

到的沙特阿拉伯经济发展目标“2030愿景”，旨在到2030年将军工行业本地化水平提高至50%，因此沙特不断推行成立国营军工企业等政策。阿联酋也在“阿布扎比经济2030愿景”推动下，提倡振兴航空、航天、国防工业，在阿布扎比举办了国际防务展。沙特阿拉伯⁷⁸和阿联酋⁷⁹都强调，经济上与中国合作和安全上与美国合作，二者可以并行不悖，而美国却认为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经济与军事和安全密不可分，双方的看法不一致⁸⁰。也就是说，武器装备的本地化看似在军事上与中国走近，而且即便它其实属于涵盖经济与军事和安全的领域，中东国家可能侧重于在经济领域合作的一面。安瓦尔·加尔加什曾任外交事务国务部长（现任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对阿联酋的外交政策影响深远，他表示“阿联酋无意在大国间选边站”，这种观点对于前述持多极世界观的国家而言，可谓是一项合理方针⁸¹。换言之，中东国家可能对美国寻求的脱钩断链不感兴趣，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划分与美中双方的分工关系，采取使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方针。

关于经济与军事和安全密不可分，本章也要谈及美国一直将武器出口作为一种手段，用来对中东国家施压的情况⁸²，比如土耳其的防空系统升级案例。约瑟夫·拜登总统就任后不久，即展示出重视终结也门内战的姿态，2021年2月暂停向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出口武器。另外，阿联酋就购买（作为同意与以色列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回报的）F-35战斗机与美国谈判时，围绕本国引进华为技术建立5G移动通信网络，与美国对立，据说结果阿联酋通知美国中断军售谈判。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进口的武器装备大部分依赖美国，而且由美军帮助培养人才，因此不大可能快速改用中国制造的武器，但是针对美国为达到政治目的而将武器出口“武器化”的做法，不可否认这两个国家有可能为减少损失而求助于中国⁸³。换言之，对于中东国家，美国将武器出口作为一种政治杠杆的做法，也可谓在前述的无人机和导弹等领域为中国入局留下了余地。

其二，美国为对抗中国而重返亚洲，在台湾和东南亚进行竞争等，此举令人对美国产生怀疑，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早就知道，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对贝拉克·奥巴马政权之后美国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感到不安，而在2011年爆发的反政府运动中，美国抛弃埃及胡斯尼·穆巴拉克政权的做法，更招致这些国家的强烈怀疑

和不满。此外，即使在立场偏向沙特阿拉伯的特朗普政权时期，美国也坚持从中东退出的方针。特别是在2019年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遭袭、伊朗或其支持的组织被视为元凶时，美国的反应比较低调，并未采取具体报复措施，这种做法加剧了沙特阿拉伯对美国的怀疑和不满⁸⁴。也就是说，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战时美国是否愿意进行必要的军事介入存疑。拜登政权反复向中东国家说明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意图，试图打消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疑虑⁸⁵。另一方面，拜登政权以重启伊朗核问题协议为目标进行协商，而且如前所述，将限制武器出口用作政治施压的一种手段，对于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而言，这些做法并不可取。基于美国是独一无二的安全保障提供者这一现状，这些中东国家在军事和安全领域表现出可谓刻意与中国走近的行为，可能有要求美国介入，也就是作为“对美牌”的一面。

(3) 胡塞武装的对华认知和对中东局势的影响

正如本节开头所述，非国家行为体对中东各国的局势和地区安全的影响不容小觑。从2023年10月之后哈马斯等组织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的武装冲突来看，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这次武装冲突正在弱化美国在中东地区和全球南方的立场。正如联合国大会就该冲突进行投票表决以及南非向联合国国际法院起诉以色列所示，全球南方国家并不支持以色列过度使用武力、美国保护以色列。也有人愿意更加直截了当地表达意见，比如土耳其前总统阿卜杜拉·居尔批评美国在乌克兰和加沙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⁸⁶。

美国在应对加沙局势上左右为难，而中国却明确支持巴勒斯坦，得到全球南方的支持。2023年10月14日，外交部长王毅通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本·法尔汉·阿勒沙特通电话，表示“以色列的行为已超越自卫范围”等，从加沙局势紧张的初期就表现出偏向巴勒斯坦的姿态⁸⁷。有人指出，中国表现出偏向巴勒斯坦的姿态，会弱化美国在全球南方的立场，有试图拉拢全球南方的一面⁸⁸。2023年11月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外长联合代表团访华，2024年1月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发布要求加沙地带立即全面停火的联合声明等等，中国与中东和伊斯兰国家不断进行合作。

与加沙地带正面局势一样重要的动向，就是同年11月之后胡塞武装在红海等水域发动海洋军事作战。该组织属于伊朗主导的反西方网络“抵抗轴心”的一员，关于红海通行，事实上表明了特殊对待中俄的态度。关于其背景，即中国过去与胡塞武装的接洽情况如何，以及这种反复接洽在目前的红海局势下给中国带来了哪些利益？下面将梳理胡塞武装与中国的关系，然后分析2023年10月之后，该组织因以巴局势紧张而在红海等水域实施军事行动，中国对此有何反应，以及胡塞武装对中国的反应做出的回应。

2015年2月胡塞武装成立了自己的政权，宣布接管了也门的国家政权，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关于胡塞武装与中国间关系的信息。自同年3月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开始军事介入之后，中国重视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也对《联合国安理会第2216号决议》投了赞成票（俄

罗斯投了弃权票)，该决议的内容包括要求胡塞武装撤出首都萨那等地、对该组织实施武器禁运等。也就是说，中国对也门的外交政策主要取决于中沙关系，中国原则上支持以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和继任的拉沙德·阿里米为总统、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但因也门局势陷入胶着状态，2016年左右中国很早就开始与胡塞武装建立关系⁸⁹，同时也积极接触其他势力⁹⁰。同年1月，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萨拉姆赞扬中国的立场更加友好了⁹¹。也有媒体透露当时该发言人正接到访华邀请，而同年12月胡塞武装代表团访问了北京⁹²。在这次访问后接受的采访中，前总统萨马德表示中俄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⁹³。综上所述，可能胡塞武装认为，除了伊朗和叙利亚以外，罕有中国这种既有对话机会又在国际政治上举足轻重的国家。

胡塞武装一方面谴责中国伊斯兰教信徒的遭遇⁹⁴、中国渔船在也门领海的非法捕捞⁹⁵，另一方面则在其控制的主要新闻媒体之一“马西拉电视台”，宣扬美国霸权终结、向多极世界转变等伊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也认同的言论⁹⁶。关于这种世界观，该组织控制的萨巴通讯社下属智库“调查信息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耐人寻味⁹⁷。该报告不仅以独特的定义来描述伊朗主导的反西方网络，即所谓的“抵抗轴心 (Miḥwar al-Muqāwama)”，而且另外进行了所谓“抗辩轴心 (Miḥwar al-Mumāna‘a)”的分类⁹⁸。前者是“在东阿拉伯地区阻止美帝国主义影响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谋略的势力”，而后者则是支援“抵抗轴心”的国家，其中不仅包括伊朗和叙利亚，也包括中国和俄罗斯⁹⁹。这两国与这些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对西方采取对抗性政治立场。此外胡塞武装的政治局委员阿里·卡胡姆表示，该组织与中俄发展关系，目的在于终结西方霸权¹⁰⁰。也就是说，可能胡塞武装即使不认为中国与自己完全一样，也认为中国在广义上同属于反美反西方阵营，因而试图宣扬与中国保持合作关系的言论。

2023年10月加沙地带爆发武装冲突之后，更严格地说，在2023年11月之后，胡塞武装从此前的本地行为主体变成了左右中东局势的行为主体。因为该组织以支援巴勒斯坦为大义，从10月中旬开始空袭以色列港口城市埃拉特，并从11月中旬开始在红海等水域发动海洋军事作战。特别是在红海发动的作战，对地区 and 世界经济产生严重影响，因此美国组建多国部队发起了“繁荣守护者行动”，该行动一旦受阻，美国就联合英国对胡塞武装军事据点进行空袭，试图迫使该组织改变行动¹⁰¹。可是截至笔者开始撰写本报告时（2024年5月底），胡塞武装仍在继续攻击美英舰艇和民用船舶，导致船舶受损。

国际海运混乱，当然也对中国这个贸易大国造成影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中东和北非地区经济预测”（2024年1月



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首都萨那举行中也合作活动（2020年2月）（Mohammed Hamoud/Getty Images）

版)，受胡塞武装发动海洋军事作战的影响，2023年11月中旬之后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运费涨幅超过400%¹⁰²。但是中国对于红海局势，其实最初抱着观望的态度¹⁰³。因为中国不仅没有加入前述的“繁荣守护者行动”，而且长时间避免点名谴责胡塞武装。在胡塞武装发动海洋军事作战2个多月之后的2024年1月下旬，美国要求中国行使对（支援胡塞武装的）伊朗的影响力。在美国提出这项要求之前，有报道指出，中国已向伊朗施压，但是并未取得胡塞武装停止海洋军事作战之类的具体成果¹⁰⁴。关于此事，该组织最高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认为这是美国的失败，而且表示中国自知本国的利益，不会做有利于美国权益的事情¹⁰⁵。也有分析指出，从更广的角度来看，中国希望中东地区局势动荡进一步削弱美国的实力，有把美国的注意力从威慑中国上引开的意义¹⁰⁶。此外，也有人认为美国对胡塞武装采取的军事行动，给中国提供了谴责美国的材料¹⁰⁷。也就是说，关于中国对红海局势的反应，被视为重要观点的不是国际海运混乱之类各国共同面临的威胁，而是美中竞争，可以说中国得到了政治利益。

胡塞武装的海洋军事作战对象，起初只是与以色列有关联的船舶，后来扩大到了驶往以色列的所有国籍的船舶和美英船舶¹⁰⁸。该组织主张自己只是攻击符合上述情况的船舶，并未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但是实际上不属于攻击对象的船舶也蒙受了损失。同时据彭博社报道，2024年3月胡塞武装承诺放行中俄船舶¹⁰⁹。实际上后来虽然由中国拥有和运营的“黄埔”号油轮¹¹⁰受到攻击，但是通过红海的中国船舶比例急剧增加，中国企业在国际海运中的存在感不断上升¹¹¹。而且有报道指出，为了替代海运航线，连接中国和欧洲的铁路运输需求也急剧扩大¹¹²。综上所述，可以说中国从胡塞武装的海洋军事作战中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即使有前述运费涨价等因素）。中国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些利益，可能是因为在准确评估也门局势的基础上提前与胡塞武装建立了关系，以及胡塞武装将其视为广义的反美阵营国家。

结语

中国的中东政策，每个政权各具特色，中东的反应也随之而不断变化。另一方面，根据以上论述，关于中国的中东政策和中东国家的接受方式，可以梳理出以下共同点。首先，邓小平时期之后，包括国防工业在内，可以说中国一直谋求以经济为起点扩大关系。特别是1990年代中国转变为石油进口国，成为其与石油供应国——中东国家巩固关系的原动力。加之习近平政权通过“1+2+3”合作格局和一带一路倡议，也加强入局非能源领域，对于摸索如何摆脱石油依赖的中东国家而言，这是一条很有魅力的途径。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等盟友，一直将限制武器出口用作政治施压的一种手段。结果中国不仅作为武器的替代供应国发挥作用，而且在该政权下出现入局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迹象。

其次，中东地区的安全环境日益动荡，以及对中东地区安全影响深远的美国所采取の方

针，成为中国入局中东的可乘之机。1980年代中国之所以与中东国家成功建交，是因为发生了苏联侵略阿富汗和伊朗革命等事件。而且进入习近平政权时期之后，中国在军事和安全领域进一步扩张，对此产生根本性影响的是中东国家抱持的世界观——美国在国际政治中衰退，即世界政治朝着多极化方向演进。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之类的亲美国国家，基于这种认知，通过巩固与美中双方的关系来进一步追求利益，造成了与美国的倾轧。此外，拜登政权一方面试图消除奥巴马政权和特朗普政权时期造成的疑美情绪，另一方面却通过重启伊朗核问题协议谈判、限制武器出口来加剧政治施压等，实施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认为不可取的政策。也就是说，当美国变成一种既会带来好处也会带来坏处的存在时，这些国家为从美国那里获取更多利益而与中国走近，中国作为一张“对美牌”的价值日益凸显。

总而言之，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安全领域不断加强入局中东国家。特别是习近平政权可能正在中东地区加快基地建设这一点，不仅标志着美国在该地区的威信下降，而且说明中东国家现在可以接受中国入局军事领域。就其作用而言，可能与阿曼曾经为抵制苏联扩大影响力而与中国建交的冷战时期有类似之处。如今的中东国家，正在为谋取利益而与习近平政权下的中国进行综合合作，包括军事和安全领域。然而与冷战时期有所不同的是，中东国家通过向美国展示其深化与中国的纽带，试图从对中东的承诺产生动摇的美国那里也获取利益。也就是说，（虽然随着中国不断强大，其国家价值得到飞跃式提升，但是）像冷战期一样，在很多方面取决于美苏等域外大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且不说中东国家的这种逻辑，只要中国成功地在中东国家建成首个军事据点，不仅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会迈上新台阶，而且中东地区的美中战略竞争会进一步加剧。

此外，本章根据非国家行为体在中东国家的影响力大小、当前红海局势的严重性，也对毛泽东时期对非国家行为体的支援、中国与胡塞武装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从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的角度支援反政府势力，结果与中东各国政府产生倾轧。而习近平政权下的中国却既重视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支持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也根据也门局势提前与胡塞武装建立关系，也就是说表现出重视平衡的姿态。再则胡塞武装将中国视为广义的反美阵营，保持平衡的政策可能让中国获利——避免与沙特阿拉伯发生倾轧、使中国船舶在红海等水域免遭攻击。



中国安全战略报告 2025

崛起的全球南方与中国



新华社/ABACA/Kyodo News Images

第 3 章

不断扩大的中非关系及其问题

神宫司 觉

前言

非洲与中国的关系在过去20年里取得长足发展。2009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非洲国家的全球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样，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余额在20年里增至80多倍。安全领域也不例外，2017年中国开始在吉布提建立首个海外军事基地；2004年之后，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最大的联合国维和行动部队派遣国，向非洲派遣了大量人民解放军官兵。并且2000年之后，中非合作论坛正式启动，作为中非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广泛领域合作的平台发挥作用，2021年在达喀尔举行的部长级会议，除了短期行动计划之外，还通过了首个长期目标《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等成果文件，目前仍在继续发展¹。

关于非洲与中国的关系，人们主要是以中国在全球层面快速实现经济和军事上的崛起为背景认识其重要性的。因此，人们一直详细分析中国是基于怎样的战略、认知、国家利益介入非洲事务的，但是对于深化与中国的关系对非洲国家有何意义、非洲国家的政治领袖和民众如何认识、打算如何利用与中国的关系等问题，却未必充分了解²。因此本章将分别阐明中非关系在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深化的实际情况，并从非方角度考察其意义和问题。

毫无疑问，非洲国家与中国之间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性，与中国进行谈判磋商时，由非洲国家掌握主导权并非易事。特别是政府机构和官僚机构脆弱的国家，很难以一贯的立场和战略与中国进行谈判，由非方发挥主体性会更加困难³。然而，非洲国家对中国并非采取完全被动的立场。虽然每个国家或每个领域都有差异，但是各国都在根据本国面临的问题和国家利益调整与中国的关系⁴。要想了解中非关系的实际情况，仅有中国的角度是不够的，还需要承认两国间和地区间存在的不对称性，并关注由非洲国家主动作出的选择和决定。

中非关系在广泛领域不断发展，本章第1节将聚焦于贸易和投融资等经济领域，第2节将聚焦于政治和安全领域。展开论述时，首先将根据2013年非洲国家制定的旨在到2063年实现的政治和经济目标《2063年议程》及其执行情况评估报告等文件，确认该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方面的主要问题。其次将确认中非关系在各个领域的进展情况，同时考察其对非洲国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造成哪些影响。第3节将考察中国可能对非洲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发挥的作用及其限度。同时将考察在美中之间于全球层面的战略竞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非洲国家采取哪种立场的可能性更大。

1 扩大经济关系

(1) 非洲面临的经济问题

《2063年议程》由非洲地区旨在到2063年实现的七大愿景和基于愿景的20个目标构成，该议程中提出的愿景1是“一个以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繁荣非洲”，并提出了“全体公民拥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身体健康、营养良好的公民”“生产力和产量都得到提高的现代农业”“蓝色/海洋经济促进经济加速增长”等7个目标（参见表3-1）⁵。关于各项目标的执行情况，非盟根据具体指标进行监督，在2022年发布的第二次执行情况评估报告中，报告了截至2021年的执行情况。根据该报告，从整个非洲来看，虽然在享有住宅、电力、互联网、医疗和其他服务方面取得可喜进展，但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微弱增长（2,584美元→2,618美元），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也只有微弱减少（33.3%→30.2%）。并且失业率比2013年（基准年）恶化（11%→15.5%）。此外，2013年以后制造业和旅游业占GDP的比重也几乎没有增长，转变依赖农业和自然资源等的经济结构这项目标也未取得进展⁶。虽然每项目标以及每个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但是总体来看，宏观经济停滞所造成的贫困和失业等问题，依然严重威胁非洲经济。

该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导致全球经济停滞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但在大流行趋于结束的2022年2月发生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导致小麦等粮食和肥料等物资涨价，直接影响了非洲人民的生活⁷。2022年3月，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创该指数1990年以来的历史新高⁸。非洲国家每年支付750亿美元进口1亿多吨粮食，截至2020年，13个

表3-1 《2063年议程》的愿景1及其7个目标和进展情况

愿景和目标		进展情况
愿景1	一个以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繁荣非洲	37%
1	全体公民拥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31%
2	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知识公民和技能革命	44%
3	身体健康、营养良好的公民	77%
4	转型经济与创造就业	17%
5	生产力和产量都得到提高的现代农业	59%
6	蓝色/海洋经济促进经济加速增长	39%
7	环境可持续和气候适应性强的经济和社会	64%

（出处）由撰稿人根据African Union Commission and African Union Development Agency (NEPAD), Second Continental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genda 2063, February 2022编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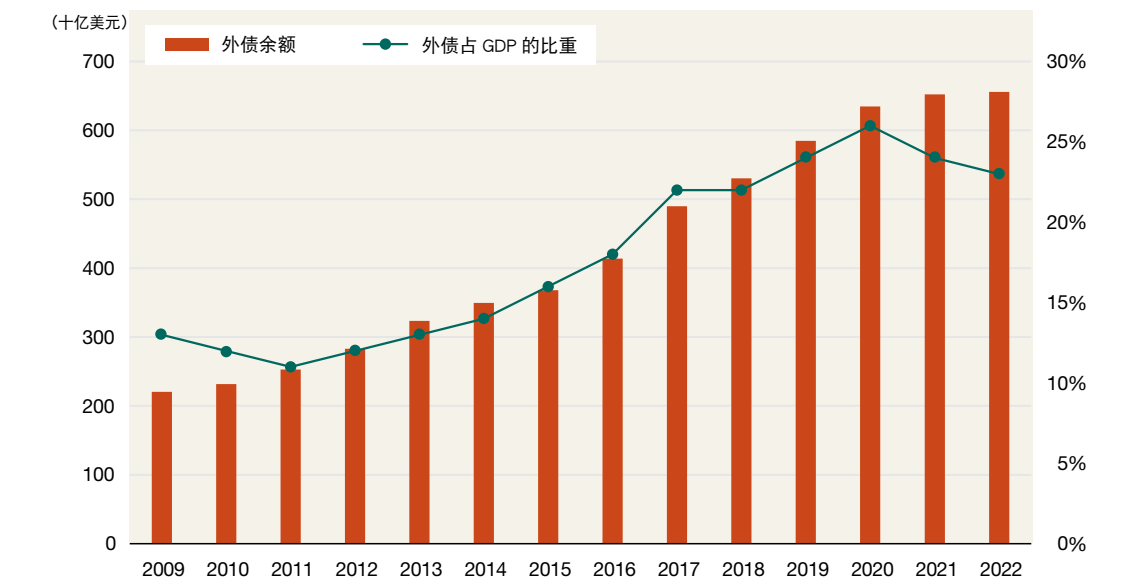
非洲国家，50%以上的小麦依赖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其中厄立特里亚、贝宁、苏丹、吉布提、坦桑尼亚5个国家，这一比例超过70%⁹。虽然国际食品价格在2022年4月达到顶峰之后，出现下降趋势，但是南苏丹和津巴布韦等15个非洲国家，截至2024年初，食品价格的通胀率依然继续超过10%，特别是伙食费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较高的低收入阶层，生活直接受到影响¹⁰。综上所述，近年来连续发生的外部冲击，使非洲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此外，外债增加也是非洲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非洲国家举借的外债总额从2009年的约2,200亿美元增至2022年的6,550亿美元，增至约3倍。而且因为未能实现足够的经济增长，导致同时期外债占GDP的比重从13%大幅增至23%（参见图3-1）。特别是刚果共和国、津巴布韦等20个国家，陷入债务积压或债务积压风险较高的困局，2020年之后，实际上赞比亚、加纳、埃塞俄比亚3个国家已经陷入了债务违约¹¹。面临债务积压问题的国家，因为需要偿还债务，财政压力增大，难以分配足够的资金用于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保健和教育、减贫等目的。

(2) 扩大中非经济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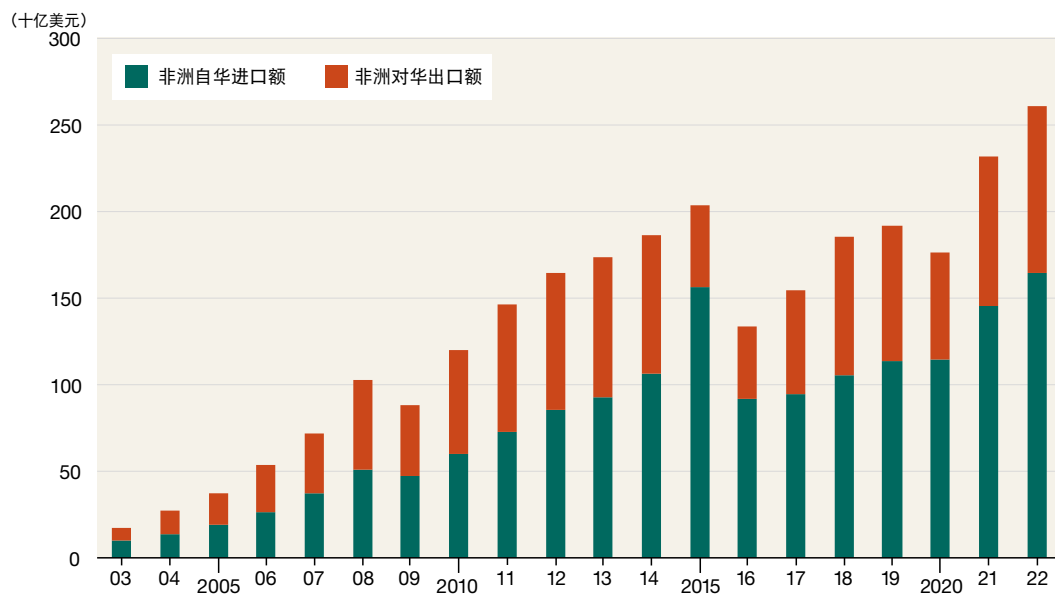
进入2000年代，非洲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突飞猛进。这一点在双方之间贸易额和投融资额的增加上尤为凸显。首先，贸易额从2003年的175亿美元暴增至2022年的2,608亿美元（参见图3-2）。其间，对于安哥拉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15个非洲国家，中国超过美国和欧洲国家，成为其第一大贸易伙伴¹²。与此同时，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余额也从2003年的4亿9,000万美元

图3-1 非洲国家外债持续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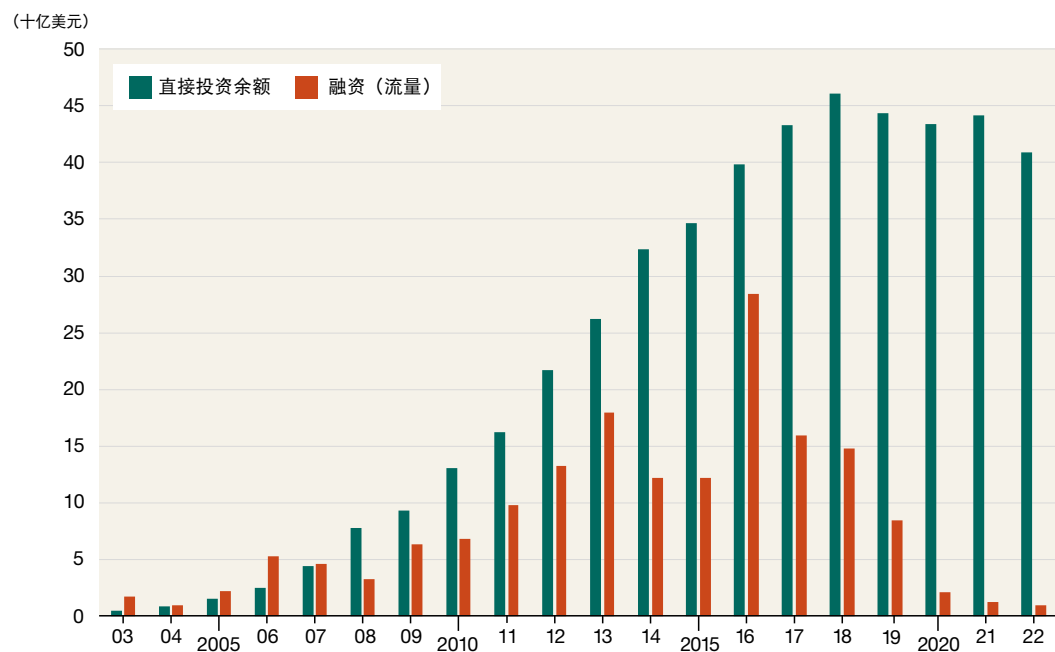
（出处）由撰稿人根据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23绘制。

图3-2 非洲与中国的贸易额变迁



(出处) 由撰稿人根据China-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 <https://www.sais-cari.org/data-china-africa-trade>, last accessed April 30, 2024绘制。

图3-3 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余额和融资额



(出处) 由撰稿人根据China-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 <https://www.sais-cari.org/chinese-investment-in-africa>, last accessed April 30, 2024; Boston University Global Development Policy Center, "Chinese Loans to Africa Database," <https://www.bu.edu/gdp/chinese-loans-to-africadatabase/>绘制。

增至2022年的409亿美元，在20年里增加了80多倍。并且中国对非洲国家的融资额也从2003年的18亿美元暴增至2016年的285亿美元峰值（参见图3—2）。

非洲与中国之间进行的这些贸易和投融资，除了单纯的规模扩大之外，还可以看出几个特点。首先就贸易而言，2000年至2022年，非洲国家向中国出口的产品，89%都是石油、铁矿石、铜、铝等自然资源，而中国向非洲出口的产品，90%以上都是通信设备和服装等工业产品。而且对非洲国家来说，虽然与中国的贸易进出口总值均有增加，但是自华进口额一直大于对华出口额，大多数非洲国家持续陷入贸易逆差状态¹³。其次就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而言，可以看出对特定的领域和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很大比例。占比最大的是基础设施建设等建筑领域，矿业、制造业次之。而且这些投资主要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南非、刚果民主共和国、赞比亚、安哥拉等国家重点进行，排行前列的6个国家约占中国对整个非洲直接投资余额的约一半¹⁴。并且2000年代之后中国提供的融资也不例外，72%面向电力等能源领域、铁路等运输领域以及信息通信领域，同样，约60%的融资是向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赞比亚、肯尼亚等10个国家提供的¹⁵。

毋庸置疑，扩大中非经济关系，在非洲创造就业机会¹⁶、改善电力等基础设施的使用便捷度¹⁷、提供廉价手机等，给非洲人民带来了各种经济和社会利益，有助于实现非洲国家提出的《2063年议程》¹⁸。但是，中国并不是在整个非洲地区一视同仁地进行经济介入，而是将投融资等集中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而且对于《2063年议程》提出的经济结构转型，也就是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投资等做出了多大贡献，也有很多地方未必清楚¹⁹。

（3）中非经济关系的问题

扩大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可能对消除非洲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起到重要作用。如上所述，近年来非洲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和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影响，实现《2063年议程》中提出的经济目标的行程并不顺利。此外从中长期来看，在全球层面发生的气候变化，也很有可能成为阻碍非洲经济增长的一大因素²⁰。打破这种外部冲击导致的经济停滞僵局，需要一定的财政支出，但是外债增加，会加大机动性财政政策的实施难度。因此，对于非洲国家而言，域外国家的对非投资和对非贸易更加活跃，对地区经济依然至关重要。尤其是，对大多数非洲国家来说，在过去20年里持续扩大的中非经济关系，今后依然重要，这一点不容置疑。

但是，要将中国的经济介入与非洲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应对非洲国家的债务积压。经济发展所需的发电站、道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非洲国家，必须从国际组织和域外国家获得融资。但是，根据草率的计划、财政纪律过度贷款，结果会使一部分非洲国家沦为债务积压国家或债务积压高风险国家。例如在肯尼亚修建连接港口城市蒙巴萨与首都内罗毕的标准轨距铁路时，53亿美元总费

用中,约有90%是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融资。但因货运量低于预期,结果该铁路连年亏损。即便如此肯尼亚也必须开始向中国还款,对财政造成压力。债务积压国家可能需要与债权国进行谈判,包括债务调整、还款条件调整等,但是围绕对非洲国家的融资,中国政府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往往难以作出包括减免贷款本金等在内的大胆决断²¹。“债务陷阱外交”是指债权国通过过度融资,刻意使



在利用中国贷款修建的铁路工作的肯尼亚司机与中国师傅
(2023年6月)(新华社/Kyodo News Images)

债务国陷入债务积压困境,从而获得作为抵押的债务国港口和自然资源等权益。主张中国实行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并无证据,当非洲国家陷入债务违约的风险升高时,中国很有可能缩小投融资规模,而此举可能会导致非洲的经济停滞进一步恶化²²。如图3-3所示,实际上中国对非洲的融资在2016年达到顶峰之后趋向减少,2018年之后直接投资的增幅也不大。中国在非洲国家外债中的存在感日益增强,在此背景下,要将中国的经济介入与非洲的发展联系起来,如何应对面临债务积压或债务违约风险的非洲国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中非经济关系的多样化。2009年之后,对于非洲来说,中国成为第一大贸易伙伴,而对于中国来说,与非洲的进出口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比重均仅为约4%,处于不对称关系之中²³。在投融资方面也不例外,虽然中国在非洲的存在感逐年递增,但非洲占中国对外投融资总额的比重却并没有那么大。因此,中非经济关系变化造成的影响,对于中国来说并不算很大,但是对于非洲国家,特别是对于投融资集中的一部分国家、依赖出口石油等初级产品的国家来说,有可能对经济景气产生决定性影响。在不清楚中国对非洲的经济介入是否会继续扩大的情况下,非洲国家要通过培育本国产业来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实现与中国的贸易品目和投资对象多样化,这一点至关重要。对于将中国的经济介入与非洲的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通过吸引、培育制造业,由此负责中国企业供应链的部分环节等,与中国建立更加对称的关系。实际上《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中提出了“中国与非洲合作,完善制造业体系,培育‘非洲制造’品牌,融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²⁴。但是,实际负责培育这种产业的是中国的中小型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往往受到短期利益预期的驱动,不同于由国有金融机构主导的以大规模融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因此,重点培育产业的这一趋势能否取得经济效益,足以抵消近年来对大型项目融资的减少额,也不得而知²⁵。

2 政治和安全领域的中非关系

(1) 非洲在政治和安全上的问题

《2063年议程》不仅提出了经济相关的愿景和目标，也提出了政治和安全相关的愿景和目标。首先是有关政治和治理的愿景3，其中第11个目标是“根深蒂固的民主价值观、实践、人权普世原则、正义和法治原则”。执行情况评估报告表示，虽然每个国家存在差异，但是该目标总体上取得了进展。具体而言，与2013年相比，有更多民众觉得，监督并问责政治领袖的有效制度、新闻自由以及自由、公平和透明性得到保障的选举制度已经建立起来²⁶。该报告还指出，截至2021年，非盟成员国中，有85%签署了《非洲民主、选举和治理宪章》，更有60%批准了该宪章²⁷。而第12个目标“有力的制度和有变革精神的领导层”，以在过去一年里向公职人员行贿的民众的比例为具体指标，却从2013年的9.5%升至2021年的31.4%，反而恶化了²⁸。其次是关于非洲的和平与稳定及其保障制度的愿景4，根据执行情况评估报告，虽然武装冲突的起数及其造成的死亡人数均少于2013年，但是并未达到2021年的目标值²⁹。关于各国设立国家和平委员会，作为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一部分，旨在预防冲突、仲裁解决对立的目标，据说76%的国家已经实现（参见表3-2）³⁰。

综上所述，执行情况评估报告汇总了截至2021年的执行情况，认为除了政府机构的腐败之外，各项目标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但是，后来地区局势更加紧张。其原因之一是政变增加，2010年代处于暂时平稳状态的军队等组织企图非法夺取政权，在2021年~2023年的3年里，主要在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等西非地区发动政变，包括以失败告终的政变在内，共有13起之多³¹。虽然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实施由多名候选人参选的选举，在利比里亚等国实现了政权更迭，但在过去10年里，在很多非洲国家，选举作为一种选择本国代表的手

表3-2 《2063年议程》愿景3、4及其5个目标和进展情况

愿景和目标		进展情况
愿景3	一个善政、民主、尊重人权、正义和法治的非洲	42%
11	根深蒂固的民主价值观、实践、人权普世原则、正义和法治原则	42%
12	有力的制度和有变革精神的领导层	33%
愿景4	一个和平与安全的非洲	63%
13	维护和平、安全和稳定	72%
14	一个稳定与和平的非洲	57%
15	一个功能健全、可操作的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APSA）	60%

（出处）由撰稿人根据AU Commission and NEPAD, Second Continental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genda 2063. 编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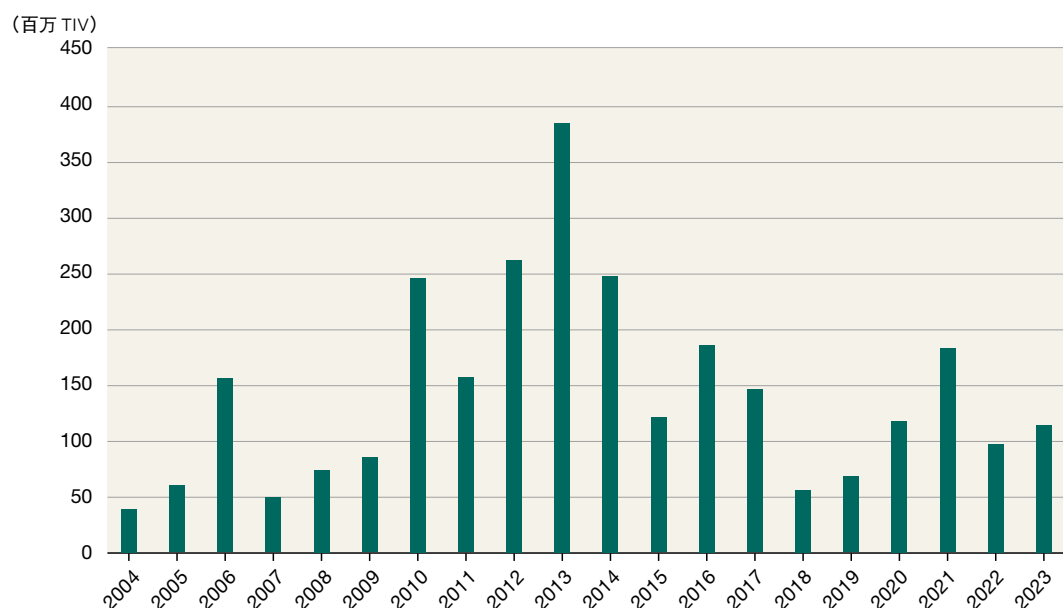
段，越来越失去民众的信任³²。治安局势也不乐观，索马里和萨赫勒地区的伊斯兰武装组织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2023年高达2万3,322人，增至2021年的近2倍³³。而联合国维和行动却在非洲持续缩编。2023年年底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撤出马里，联合国刚果（金）稳定特派团也计划将于2024年年底全面撤出。另外，非盟驻索马里过渡特派团到2024年年底也将撤出索马里。联合国维和行动陆续撤出，并不是这些国家的安全状况得到改善的结果，因此人们担心撤出后局势恶化³⁴。

（2）政治和安全领域的中非关系

中非关系虽然一直以经济为中心不断扩大，但是2000年代之后，这种关系也在政治和安全领域逐渐深化。中国向非洲地区派遣维和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就是标志之一，截至2024年1月，中国向联合国在非洲部署的5个特派团共派遣了1,425名维和人员，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规模最大。此外，2012年向南苏丹派遣工兵分队，2013年首次向马里派遣工兵分队，表示中国为了维护非洲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做好了承担一定程度风险的准备³⁵。中国还于2017年8月在吉布提建设首个海外保障基地，其目的不仅是在索马里海域护航等，而且是保障在非洲发生冲突等时撤侨的基地³⁶。

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武器出口也在2000年代之后日益活跃（参见图3-4）。不同年份的出口额虽然波动较大，但是2019年至2023年，由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导致其武器出口大幅减少，因此中国超过俄罗斯，成为非洲地区的全球最大武器供应国³⁷。特别是坦桑尼亚、尼日利亚、

图3-4 中国对非洲的武器出口



（注）TIV（趋势指标值）是SIPRI独自规定的一个指标值，表示武器出口的规模。

（出处）由撰稿人根据SIPRI Arms Transfers Database绘制。

苏丹、喀麦隆、赞比亚这5个国家占中国对非武器出口的60%³⁸。

在武器出口日益增长的同时，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军事交流也日渐频繁。以中国实施的军官培训计划为例，来自几乎所有非洲国家的几千名军官曾经接受培训³⁹。除此之外，中国与非洲国家还定期举行交流活动，例如始于2019年的“中非和平安全论坛”等高级别会议，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军队和国防部首脑汇聚一堂，研讨非洲安全等议题，还有军事设施互访等。

除军队外，中国与非洲国家还积极开展警察的合作交流。2018年至2021年，2,000多名非洲国家的警察和执法人员在中国接受了培训⁴⁰。中国还向非洲各国提供武器装备、支援其建设警察学校等设施⁴¹。特别是近年来，中国还提供自己的监控技术，至少有12个非洲国家引进了华为的数字监控技术，用于警察执法等活动⁴²。此外中国也向非洲国家派遣私营安保公司，2018年至2020年，在14个非洲国家，负责中国参与的港口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的安保工作⁴³。

由此可见，中国对非洲安全领域的介入日益多样化，特别是在武器出口方面的存在感不断增强。但是在武器出口以外的军事合作等方面，中国的介入规模依然不如美国等国家，而且介入形态也与美国等国家迥异⁴⁴。以交流形态为例，美国以举行会议和进行培训为主，而中国却以军事设施互访等礼节性活动为主⁴⁵。中国虽然在吉布提建设了海外基地，但是与美国、从殖民统治时代就与非洲保持联系的法国等国家相比，中国在非洲的军事影响力还不算大。而且在不远的将来，除吉布提外，中国在非洲建立新军事基地的可能性很小，加快建设港口等军民共用设施的可能性反而更大⁴⁶。

中国不仅在军事和安全领域介入非洲事务，而且积极加强与非洲的政治关系。三十多年来中国外交部长每年首次出访都到非洲国家，体现了中国多年来在外交上重视非洲的姿态。除了这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之外，中国共产党与非洲主要政党的关系，可以追溯到非洲的殖民地独立时期，据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35个非洲国家议会建有双边友好小组，共产党与51个非洲国家的110个政党保持着党际交往关系⁴⁷。并且近年来出现了中国试图加强这种关系，在非洲推广中国的政治和治理理念的动向。其典型案例就是2022年2月在坦桑尼亚开办的“尼雷尔领导力学院”。这所政治培训学校是由中国共产党援建的，来自非洲南部6个国家的中青年党政干部，在这里学习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实际情况、如何建立强大的执政党等⁴⁸。综上所述，中国与非洲的政治和安全关系，正在从物质或技术层面扩大到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等层面。



中国共产党在坦桑尼亚援建的尼雷尔领导力学院（2022年8月）（朝日新闻社）

(3) 政治和安全领域的中非关系存在的问题

中非关系虽然是以经济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但是2010年代之后，中国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也逐渐密切而广泛地介入非洲事务。不过也可以看出，中非加强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关系，在帮助实现非洲提出的《2063年议程》方面，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与“中国‘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关系。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过去一直避免积极介入他国的政治局势、地区内冲突。非洲国家经历过被欧洲国家殖民统治的负面历史，因此中国的这种姿态受到非洲国家欢迎，无疑为中国的立场得到非洲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创造了条件。但是，如果中国的经济介入不断深入，应当在非洲维护的权益和在当地居住的中国人不断增加，中国可能比过去更难以对政治和安全局势保持中立姿态。

以近年来主要在西非频发的军事政变为例，中国原则上大都采取中立的立场，但是军事政变有可能威胁中国企业拥有的各种权益和安全时，中国能否坚持这种姿态值得怀疑。实际上2021年9月在几内亚发生军事政变时，中国一反常态，发布声明反对政变，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在前政权下获得的铝土矿权益⁴⁹。如果中国不再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根据本国权益改变对非洲地区政治和安全局势的姿态和介入程度，中国可能难以显示自己过去一直保持的与欧美国家的不同之处。而且非洲地区国家之间的对立也屡见不鲜，在中国成为主要武器出口国的过程中，分别向对立的国家和势力提供武器和训练的事态也已发生⁵⁰。中国介入非洲安全事务的问题在于，针对非洲地区内的冲突和对立，中国到底是要与非盟和非洲地区国家合作，起到调解作用，必要时采取控制武器出口等手段，还是要继续坚持中立、不干涉内政的立场，只做旁观者。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介入政治和安全领域对非洲地区民主化造成的影响。在非洲地区，人们虽然对民主主义的重要性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但现实却是武装冲突和政变等行为阻碍民主主义的实现，或者使其倒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通过向非洲的军队和警察提供武器装备、专业培训等进行合作交流，或者进行政党间交流、在政治培训学校输出中国的政治思想，对非洲各国的民主化进程会造成哪些影响，目前不得而知。除了中国制造的武器在苏丹武装冲突等事件中被使用的事实、中国的监控技术正在被引进到非洲国家的事实以外，目前尚未看到中国扩大政治和军事介入阻碍了非洲民主化的更直接案例。非洲国家的政治领袖和军队等组织，其实并非完全接受中国提供的各种技术、教育培训等服务，而是根据本国情况选择取舍⁵¹。因此，中国扩大支援直接导致非洲国家“中国化”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中国提供的各种武器装备、技术、经验，也确实让一部分政治领袖、军队和警察更容易维护其威权政体。中国介入非洲的政治和安全领域，现在仅限于人才培养、相互理解等不干涉他国内政的范畴，需要从中长期角度评估这种做法对非洲的政治和安全局势造成的影响。

3 中非关系的问题与展望

(1) 中国在非洲问题中的作用与限度

综上所述，对于解决非洲面临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各种问题，中国介入的深化可谓贡献不小。中国对非洲的做法与欧美国家不同，因此会给非洲国家带来更多选项。中国、欧美国家及其他国家，都从各不相同的角度介入非洲事务，有时会互相竞争，使得非洲国家可以选择更佳选项、享受更大利益的可能性提高。不过，中国能够发挥的作用也有限。以非洲的债务积压问题为例，虽然向前景渺茫的项目提供融资的中国、域外国家和机构也有责任，但是也有很多问题，包括制定本来就缺乏盈利能力的项目、挪用贷款等，其始作俑者是域外国家和机构难以控制的非洲政府。围绕“债务陷阱”的言论中遗漏的就是本来的项目主体——非洲各国政府的责任，其实非洲各国政府只要立足于项目的盈利能力、财政约束，就不会掉入“债务陷阱”。

政治和安全领域也不例外，尽管中国近年来不断扩大其介入，但是表面上仍然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非洲国家在政治和安全上面临的各种问题的介入也有限。然而，中国在非洲要维护的权益不断增加，中国今后能否继续坚持不干涉内政的立场不得而知，其实中国违背该原则的姿态也已初现端倪。对于这种原则与实际行动之间的背离，中国到底是提出明确的方针，还是今后继续保持模糊的立场，今后需要高度关注。

即使中国坚持不干涉非洲国家内政的立场，随着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被卷入非洲各国内部政治对立的可能性会升高。2019至2021年，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对34个非洲国家的民众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0%以上的人对中国在非洲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持正面看法，但在赞比亚、津巴布韦、加纳等国家，也可以看到当地政治领袖出于自己的政治活动需要，利用部分民众根深蒂固的反共反华情绪的案例⁵²。中国虽然可以通过外交手段、新闻媒体等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反中情绪，但是既然中国无法完全控制当地人的情绪以及当地政治家利用这种情绪开展的活动，中国深化对非洲事务的介入，无论是否有不干涉内政原则，都会升高中国被卷入非洲国家政治的风险。

(2) 美中竞争时代的非洲

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成为反恐战争后最重要的问题，两国都在试图加强介入非洲事务。2022年12月，美国的约瑟夫·拜登政权时隔8年召集非洲各国领导人举行美非峰会，展示了美国积极介入非洲事务的姿态。在该政权的非洲战略及驻非美军的“年报”中，也意识到美国与中国在非洲的竞争⁵³。那么，美中战略竞争对非洲有何影响、中非关系将走向何方？

如果美中竞争今后进一步加剧，非洲国家将面临各种机遇和风险。可能获得的机遇，诸如非洲在国际组织等的影响力提高、更多的投资和经济援助等。美国、中国在不断形成各自

标榜的国际秩序时，无法忽视拥有50多个国家的非洲的意见。在美中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非洲国家更有可能获得机遇，向国际社会倾诉、反映自己的观点和理想。美中竞争同样也有助于非洲国家以更有利的条件从美中两国获取投融资、援助等利益。非洲国家以更有利的条件获得融资和援助，不仅可以减少陷入债务积压困境的风险，还能将资金用于减贫、解决教育和保健等问题，有可能给非洲国家带来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的机遇。

然而，对非洲而言，美中竞争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其中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在两国竞争的过程中，非洲国家分裂为两大阵营，沦为美中的棋子。这种情况确实出现在冷战时期的美苏对峙中，防止历史重演成为非洲国家的一项重要课题。在联合国就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决议进行投票表决时，非洲国家中投下赞成票的与弃权、不投票、投下反对票的几乎对半，可见非洲虽然通过非盟等联盟不断提高该地区的一体化程度，但在一部分政治议程中，域内国家并非总是铁板一块。非洲国家之间存在的分歧也在美中竞争中凸显，非洲今后可能会受迫于防止该地区在政治上分裂的需要。而且在坚持非洲地区的一体化、向美国和中国等大国展示对等立场方面，非盟作为地区组织的重要性很可能会更加提高。

结语

本章对中非关系的现状及其特点和问题等进行了考察。从中可以看出最明显的一点，就是2000年代之后非洲与中国在广泛领域保持紧密关系。特别是经济方面，在新冠肺炎疫情、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等外部冲击导致非洲和全球经济低迷的时期，中国的存在感更加强大。非洲今后要实现更大的经济增长，就必须保持和发展中非关系。而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中国不仅向非洲的联合国维和特派团派遣部队、在吉布提建立海外基地，而且出口武器、进行军队和警察层面的交流、开办政治培训学校、提供监控技术等，因此中非关系显然是多方面的。不过，扩大和加强这种关系如何能够帮助解决非洲的政治和安全领域面临的诸多问题，我们未必清楚。中国在这一领域的介入几乎都是间接的，我们必须对这种做法造成的影响进行中长期评估。

本章还指出，中非关系也孕育着各种问题和风险。首先在经济方面，过于乐观的融资导致非洲国家的债务积压风险不断攀升。而且非洲与中国的关系不对称，对非洲来说，中国保持和加强经济介入对非洲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和债务偿还不可或缺，而对中国来说，非洲是多个地区的选项之一，非洲的经济停滞和债务积压可能会导致中国缩小介入。实际上近年来中国的投融资规模日趋缩小，中国比以前更加重视在非洲培育产业，而非以往的大规模建设工程。

其次在政治和安全方面，对于在非洲发生的各种事态，中国很难继续坚持不干涉内政原

则，可能会根据自己拥有的权益等改变姿态。随着中国在非洲各国的存在感不断增强，即使中国试图贯彻不干涉内政原则，也会被迫卷入当地政治。今后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中国如何应对在深化对非洲事务的介入中出现的这种新情况。再者，关于中国深化政治和安全方面的介入对非洲民主化造成的影响，目前我们也难以直接评估，需要作为一个中长期问题来认识。

中国能够对非洲的经济发展与和平稳定发挥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但也存在一定的限度。特别是在希望维持现状的政治领袖当道、贪污贿赂和任人唯亲等弊端泛滥成灾的一部分非洲国家，中国的影响力也很有限。如何利用中国的各种介入和援助，归根到底应由非洲人民决定，观察中非关系时，必须了解非方的政策和认知。关于美中战略竞争造成的影响，非洲国家可能会在美中夹缝中提高国际影响力、以更有利的条件获取投融资，但是也有在地区内导致分裂和对立的风险。总之，对于预判今后的国际秩序，非洲与中国的关系无疑越发重要。届时，必须尽量全面把握在经济、政治和安全等广泛领域多方面发展的二者关系，同时不仅要关注中国的认知和政策，也必须关注非洲国家的主体性。



中国安全战略报告 2025
崛起的全球南方与中国

末章

本报告的结论

八塚 正晃

本报告以中东和非洲为例，从多种角度论述了崛起的全球南方与中国的关系。关于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关系，我们根据本论，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崛起后，从各个方面加强对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中国通过发展经贸关系、扩大经济合作，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华认知和外交行为施加其影响力。而且1990年代之后，中国利用各地区构建的多边主义框架，在各个地区和国家灵活地深化合作事项，同时还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进具体项目。此外，正如第2章所示的中国与胡塞武装的关系、第3章所示的中非政党和议会的关系，中国根据地区和国家的情况与广泛的行为体接触，也包括非国家行为体。但是正如第3章所示，这种经济关系的深化，受到对方国家是否拥有资源等因素的影响，而且未必能解决该地区面临的诸多问题。

中国已经渡过了经济高速增长顶峰，很难再像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一样以对外援助和经济合作为杠杆提高影响力了。但是，中国雄厚的人才资源和技术实力，依然作为一种向心力影响着发展中国家。中国通过提供技术和培训等服务，继续推动软联通，使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符合中国标准。中国与全球南方的技术实力不对称，基于这一点的此类技术合作，也有可能通过提供基础设施和平台，形成长期的支配从属关系。

第二，因为中国的海外利益遍布全球，国内要求政府提高安保能力，所以中国在全球南方加强军事介入。21世纪之后，中国派遣维和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轮流派遣海军舰船护航、在吉布提建立保障基地等，逐渐扩大中国军队的海外影响力。除此之外，中国还积极采取多种方式军事介入全球南方国家，包括高层军官交流、联合军演、武器出口、提供军事专业培训以及派遣私营军事公司等。然而，中国从维护本国海外利益的角度强化对海外的军事承诺，不仅使不干涉内政原则等自我限制的宣言性政策逐渐形同虚设，而且变化不定的地区局势和国家间对立，使中国难以坚持中立性。换言之，中国越扩大对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实质性关系从不干涉内政向“建设性介入”转变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如果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关系。

但是，如果中国只是为了维护本国海外利益而加强对海外的军事介入，即使会带来扩大军事影响力、活跃军事外交等结果，包括为保证本国海外利益的安全而建立军事基地，也不大可能使得中国对遥远的全球南方国家承担维护政权稳定和防卫的义务，或者将部队部署到其他地区，直接军事介入国际冲突。换言之，中国可能无意取代美国，发挥其遍布全球的同盟网络的作用。对此，中东国家认为可以同时与美中双方进行安全合作，接受中国扩大军事承诺。但是，中国如果根据习近平政权提出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寻求主动介入国际热点问题，那么即使形式与美国不同，也会加强介入全球南方的冲突。

第三，对于未来的国际秩序应从美国（或发达国家）主导的单极霸权向全球南方崛起所推动的多极化世界演变的趋势，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大多数国家基本上达成松散共识。其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这些国家对欧美主导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本身感到不满、因为殖民统治等

历史原因而不信任欧美国家的道德伦理。针对这种不满、不信任，中国提出有关发展、安全和价值观的倡议，将批评西方国家的言论纳入其中，不断加强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姿态。因此中国试图纠集全球南方，谋求建立“‘西方发达国家’对抗‘多数派全球南方’”格局的国际统一战线。在习近平政权初期，中国侧重于机会主义的一面，即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平台，与全球南方在广泛领域扩大经济合作、建立关系。但是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习近平政权倾向于从战略角度出发，在全球南方行使本国的影响力。当然，全球南方对反欧美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态度不尽相同，但注重经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只要有利于本国的发展、纠正不公平的全球治理，也大都倾向于迎合。而且如第2章所述，中国的反美姿态受到反美势力欢迎，包括伊朗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中国似乎考虑到对美关系、国际社会的立场，正在摸索适合包括反美势力在内的合作对象的合作方法。

另外一个相关的论点是：中国在全球南方的领导地位并非理所当然。中国提出 to 增加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试图将全球南方的主导权集中到自己手里。但是，在全球南方内部，以印度为首的发展潜力巨大的国家在群体性崛起，内部的力量平衡也在大幅改变。而且全球南方国家当然也是多种多样，利害关系错综复杂。如果中国超越在经济上共同发展的语境与全球南方合作，谋求建立支配从属关系和反美（或反西方）色彩浓厚的国际统一战线，那么全球南方也会在寻求战略自律性和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重新思考与中国的合作。

上述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的发展趋势，将对国际秩序产生何等影响？我们根据本论，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中国不断深化的各种介入，即使不阻碍全球南方的民主化，也会促使威权主义国家集群延续其现行体制。中国政府一方面否认向他国输出“中国模式”，另一方面却批评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普世性，同时强调本国的发展和统治“经验”可以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政府通过正当化自己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时采取的动态清零等政策，强调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比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优越，并继续坚持这种对外宣传方针。

而且中国还在公安警务部门配合下，通过提供教育培训和监控技术等，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统治能力。全球南方的威权主义国家也倾向于接受中方提供的这种教培和技术。这些做法虽然可望促使苦于内战和恐怖袭击等问题的国家提高治安管理能力、维护社会稳定，但在威权主义国家容易发生压制民主参政的现象，也会导致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僵化。此外，在不干涉内政原则下，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在不公正的治理和腐败的环境中实施的，作为受援国避免依赖欧美国家的有效选项发挥作用，有降低“民主化压力”效果的一面。也就是说，中国深化介入，未必会促使发展中国家改善治理，包括杜绝腐败、提高政府透明度等，反而可能会增强现政权的统治能力，导致对社会的压制。中国还与威权政体国家合作，牵头制定网络安全治理相关的国际规范，其中强调国家权力的优势，可谓是要促成适合威权政体存续的国际环境。

第二，美中战略竞争，今后仍会裹挟着全球南方，在广泛领域继续进行下去。由于美中对立日益尖锐，中国试图吸纳全球南方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但从全球南方的角度来看，“中国牌”的价值在于，在对美关系上成为提高本国价值的谈判筹码。实际上，在中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全球南方地区，出现了美国重新强化其承诺的趋势。正如第3章所指出的，对于全球南方而言，中国的介入也会带来机遇，可以增加经济发展所需的选项、享受更多利益。

美中在全球南方的战略竞争，不仅限于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在认知领域和国际规范方面也会不断加剧。中国在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同时，对于在其他地区爆发的战争和冲突，提出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和平方案等，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手段。中国的这种做法，虽然不会立即促成停止战斗、解决冲突，但是会在对欧美国家应对方式持批评态度的全球南方国家中获得一定的支持。而且中国在谋求形成适合保护威权政体的国际规范的同时，不断加强要求改革全球治理的力度。由于全球南方属于多数派，国际社会无法忽视其意见，因此美中在形成国际规范方面的战略竞争也很可能会加剧。

但是附和中国的反美姿态，意味着与美国对立、面临制裁风险。除了明确敌视美国的伊朗和北朝鲜等国家之外，对于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最佳的外交选择可能是将中国作为对美谈判的一张牌来利用，同时保持适度的立场，不至于与美国陷入敌对关系。对于全球南方保持这种摇摆幅度较大的中立，美国（或西方国家）可能需要考虑各地区、各国的情况，采用灵活的外交手段。

第三，中国通过属于多数派的全球南方，在国际社会增强其国际话语权时，可能会严重影响东亚地区的安全。近年来中国对全球南方的吸纳，在叙事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近年来，中国强烈要求在其与全球南方的双边关系、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边框架中，采用支持“尊重核心利益”的表述和方法，谋求建立对自己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而且，即便是靠力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中国也要通过宣传支持其维护核心利益行动的“国际共识”，谋求该尝试的正当化。这种尝试不仅限于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也包括海洋权益和地区安全相关的问题。

非洲和中东等全球南方地区，因为地理距离遥远，未必充分了解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东亚局势。鉴于此，以维护和巩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为目标的国家，在与全球南方合作之际，也必须加强公共外交，以便共享以法治为基础的稳定的国际秩序观。与此同时，相关国家必须以解决全球南方各国的社会问题为目标，通过摸索扎根于个别需求的经济合作和能力建设支援，不断发展基于长期信任的合作伙伴关系。

序章

- 1 “深化团结合作 应对风险挑战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 2023 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3 年 8 月 22 日，https://www.gov.cn/gongbao/2023/issue_10686/202309/content_6902423.html。
- 2 松下洸・藤田憲（編著）『グローバル・サウスとは何か』ミネルヴァ書房、2016 年。
- 3 例如 Takashi Shirashi, “‘Global South’ Needs More Elaborate Definition,” *The Japan News*, May 12, 2023, <https://japannews.yomiuri.co.jp/editorial/insights-world/20230512-109352/> 和 Joseph S. Nye, “What is the Global South,” Project Syndicate, November 1, 2023,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global-south-is-a-misleading-term-by-joseph-s-nye-2023-11> 等。
- 4 John Hawksworth, Rob Clarry and Hannah Audino, “*The Long View: How will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 change by 2050?*,” PwC, February 2017, <https://www.pwc.com/gx/en/world-2050/assets/pwc-the-world-in-2050-full-report-feb-2017.pdf#:~:text=Looking%20ahead%2C%20we%20think%20they%20will%20see%20emerging,global%20GDP%20could%20have%20fallen%20to%20below%2010%25>。
- 5 Kevin Daly and Tadas Gedminas, “The Path to 2075: Slower Global Growth, But Convergence Remains Intact,” *Global Economics Paper*, Goldman Sachs, December 6, 2022, p. 5, <https://www.goldmansachs.com/pdfs/insights/pages/gs-research/the-path-to-2075-slower-global-growth-but-convergence-remains-intact/report.pdf>。
- 6 “Voice of Global South Summit 2023,”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January 12-13, 2023, <https://www.mea.gov.in/voice-of-global-summit.htm>。
- 7 2023 年 8 月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邀请包括阿根廷和沙特阿拉伯在内的 6 国成为新成员国，但这两国尚未应邀加入金砖国家。
- 8 “王毅就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提出四点主张”，中国外交部，2023 年 7 月 26 日，http://new.fmprc.gov.cn/web/wjbzhd/202307/t20230726_11117824.shtml。
- 9 例如，大庭三枝对全球南方的定义包括三个要点：①经济发展水平；②曾经被欧美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蹂躏过；③并非自成一极的大国。她认为中国不符合③，因此不属于全球南方。大庭三枝「グローバルサウスの実体（下）高成長国と低開発国が共存」『日本経済新聞』2023 年 6 月 8 日。
- 10 本报告虽未将俄罗斯作为重点，但因其属于金砖国家的成员国，所以也将其纳入到全球南方中进行论述。
- 11 “Views of the U.S. and China in 24 Countries,” Pew Research Center, November 6, 2023,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3/11/06/comparing-views-of-the-us-and-china-in-24-countries/>。
- 12 “World Bank Open Data,”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
- 13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Democracy Index 2023, *EIU Report*, <https://www.eiu.com/n/campaigns/democracy-index-2023/>。
- 14 与相关性有关的 t 检验和 p 值，分别为经济指数（t 检验：4.70136556，p 值：0.000108835）、政体指数（t 检验：9.13500252，p 值：0.000000000609768），故可断定差异显著。同时皮尤研究中心还调查了对美好感度，结果无论是经济指数（-0.04443）还是政体指数（0.20453），均未显示出与对美好感度之间有强相关性。
- 15 例如，自由之家认为，世界上很多地区近年来否定多元化，民粹主义的领导人和集团寻求不受监督的权力，导致民主主义衰退。
- 16 例如 Andrew Scobell and others, *At the Dawn of Belt and Road: China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RAND, Oct 16, 2018,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2273.html; Dawn C. Murphy, *China's Rise in the Global South: The Middle East, Africa, and Beijing's Alternative World Ord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Raphael S. Cohen et al, *Great-Power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outside the Indo-Pacific and Europe*, RAND, 2023, http://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969-1.html 等人，也带着与本报告同样的问题意识研究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关系。
- 17 防卫研究所编：《中国安全战略报告 2019——围绕亚洲秩序的战略及其影响》，防卫研究所，2019 年；防卫研究所编：《中国安全战略报告 2020——走向欧亚大陆的中国》，防卫研究所，2019 年。
- 18 饭田将史、新垣拓、长谷川雄之：《中国安全战略报告 2024——中俄美战略竞争与未来国际秩序》，防卫研究所，2023 年。

【第 1 章】

- 1 The World Bank, July 1, 2023, <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906519>。
- 2 例如，“习近平出席‘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18 年 7 月 27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8-07/27/content_5309910.htm。
- 3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13 页。
- 4 “习近平提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2 年 10 月 16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16/content_5718834.htm。
- 5 “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4 年 6 月 29 日，https://www.mfa.gov.cn/ziliao_674904/zl_674979/ywzt_675099/2014zt_675101/hpgc_675103/201406/t20140629_7953842.shtml。
- 6 岡部達味『中国の対外戦略』東京大学出版会、2002 年、39 頁。
- 7 Lillian Craig Harris and Robert L. Worden eds., *China and the Third World: Champion or Challenger?*, Auburn House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pp. 126-127; 八塚正晃「中国における革命外交と近代化の相克」『中国研究月報』2022 年 9 月号、1-14 頁。
- 8 高志平：“三十年来中国对不结盟运动的研究”，《世界历史》2012 年第 1 期，第 128 页。
- 9 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产生的背景，参见八塚正晃「文革後期の中国における対外開放政策の胎動」『アジア研究』2014 年 60 卷 1 号、37-55 頁。
- 10 Robert G. Sutter, “Strategic and Economic Imperatives and China's Third World Policy,” In *China and the Third World: Champion or Challenger?* ed. Lillian Craig Harris and Robert L. Worden, Auburn House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pp. 14-33。

- 11 “深化团结合作 应对风险挑战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 2023 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3 年 8 月 22 日，https://www.gov.cn/gongbao/2023/issue_10686/202309/content_6902423.html。
- 12 “South Africa files ICJ case accusing Israel of ‘genocidal acts’,” *BBC*, December 30, 2023,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frica-67844551>。此外，巴西总统等政要也在非盟谴责该行为，暗示全球南方已经形成这一共识。“Brazil’s President Angers Israel After Comparing War in Gaza to the Holocaust,”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8, 2024, <https://www.nytimes.com/2024/02/18/world/middleeast/brazil-lula-israel-gaza-holocaust.html>。
- 13 Kishore Mahbubani, *Measuring the power of the Global South*, Chatham House, February 2, 2024, <https://www.chathamhouse.org/publications/the-world-today/2024-02/measuring-power-global-south>。
- 14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发展美好未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6 年 1 月 22 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122/c64094-28075098.html>。
- 15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15 年 10 月 13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5-10/13/content_2946293.htm。
- 16 “习近平在南海合作圆桌会上发表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15 年 9 月 27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5-09/27/content_2939428.htm。
- 17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世界貿易投資報告 2023 年版』日本貿易振興機構，2023 年，10-11 頁，https://www.jetro.go.jp/ext_images/world/gtir/2023/no1-2.pdf。
- 18 經濟産業省『平成 30 年版 通商白書』勝美印刷株式会社，2018 年，227 頁。
-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2022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商务出版社，2023 年，第 4 页，<http://images.mofcom.gov.cn/hzs/202310/20231007152406593.pdf>。
- 20 钟新、金圣钧、宋思怡、萨达凯提·玉赛音：“贡献全球治理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10 周年核心话语的内涵变迁与国际传播”，《传媒观察》2023 年第 9 期，第 6 页。另外根据中国政府发表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2013 年至 2018 年，中国共向 122 个发展中国家和 20 个国际组织提供援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新华社，2021 年 1 月 10 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1/10/content_5578617.htm。
- 21 稲田十一『「一带一路」を検証する』明石書店，2024 年，151 頁。
- 22 AidData, *Belt and Road Reboot: Beijing’s Bid to De-Risk Its Global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 November 2023, p. 5, https://docs.aiddata.org/reports/belt-and-road-reboot/Belt_and_Road_Reboot_Full_Report.pdf。
- 23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中国人的国际安全观”民意调查报告（2023）》，2023 年 5 月 24 日，第 21 页。
- 24 AidData, *Belt and Road Reboot: Beijing’s Bid to De-Risk Its Global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 Executive Summary*, November 2023, p. 2.
- 25 2023 年 10 月举办的该倡议相关论坛，与会国际中国外，还包括阿根廷、柬埔寨、科摩罗、古巴、埃塞俄比亚、冈比亚、肯尼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巴勒斯坦、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泰国。“《‘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北京倡议》在京发布”，中国一带一路网，2023 年 10 月 19 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p/0BDNJ2BM.html>。
-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18 年 1 月 11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8-01/11/content_5255443.htm。
- 27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2020 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的通知”，2020 年 3 月 1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1 年 10 月 10 日，http://www.gov.cn/zhengce/2021-10/10/content_5641727.htm。在 2021 年 11 月召开的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强调要把规则标准“软联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习近平出席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1 年 11 月 19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1-11/19/content_5652067.htm。而且被纳入到 2023 年 11 月“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报告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坚定不移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的愿景与行动——共建“一带一路”未来十年发展展望》，中国政府网，2023 年 11 月 24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1/content_6916832.htm?mc_cid=8d8547b4a1。
- 28 习近平：“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求是》（2020 年 10 月 31 日）。
- 29 根据《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对中国企业或组织采取歧视性措施的外国实体，可能被限制或禁止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中国商务部：《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第 2 条、第 7 条、第 10 条。
- 30 Caleb Harding, “China’s coercion is most effective against poorer countries,” *The Diplomat*, September 2, 2023, <https://thediplomat.com/2023/09/chinas-coercion-is-most-effective-against-poorer-countries/>。
- 31 William Piekos, *Investigating China’s Economic Coercion: The Reach and Role of Chinese Corporate Entities*, Atlantic Council, November 2023, pp. 8-10,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wp-content/uploads/2023/11/Role-and-Reach-of-Chinese-Econ-Statecraft-1.pdf>。
- 32 车翼、贺晓宇、张燕：“对外援助与国际影响力：来自中国经济复兴的证据”，《财经研究》，2023 年 7 月，第 122-136 页。
- 33 AidData, *Belt and Road Reboot: Beijing’s Bid to De-Risk Its Global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 Executive Summary*, November 2023, p. 29; Dreher, A., Fuchs, A., Parks, B. C., Strange, A., & Tierney, M.J., *Banking on Beijing: The Aims and Impacts of China’s Overseas Development Progra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 34 稲田『「一带一路」を検証する』，22 頁。
- 35 同上書，245 頁。
- 36 “The Group of 77 at the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https://www.g77.org/doc/>。
- 37 “七十七国集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4 年 1 月更新，https://www.mfa.gov.cn/web/wjfb_673085/zjjg_673183/gjjs_674249/gjzzyhygk_674253/qsqg_674549/gk_674551/。
- 38 “李希出席‘77 国集团和中国’哈瓦那峰会并致辞”，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3 年 9 月 16 日，https://www.mfa.gov.cn/zyxw/202309/t20230916_11144037.shtml。
- 39 “刘国中出席第三届南方首脑会议并致辞”，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4 年 1 月 22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1/content_6927482.htm。

- 40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 “G77 & China Plenary members reached a consensus to support Dr Qu Dongyu, China’s candidate for the post of Director-General of FAO 2019-2023,” <https://www.fao.org/g77/archive/news-details/en/c/1198632/>.
- 41 Dawn C. Murphy, *China’s Rise in the Global South: The Middle East, Africa, and Beijing’s Alternative World Ord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59.
- 42 阿尔及利亚、吉布提、埃及、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索马里、苏丹、突尼斯，作为中非合作论坛和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双方的成员国参加。第二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除库克群岛外，有 9 个与中国保持外交关系的太平洋岛国（斐济、基里巴斯、萨摩亚、纽埃、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所罗门群岛、汤加）的外交官员参加。与中国复交的瑙鲁今后也可能加入，该组织成员将增至 11 个国家。“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召开第二次外长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2 年 5 月 30 日，http://new.fmprc.gov.cn/wjzbhd/202205/t20220530_10694549.shtml。
- 43 「中国—阿羅伯国家合作論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4 年 1 月更新，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zalt_682806/jbqk_682808/。
- 44 八塚正晃「習近平のサウジアラビア訪問に見る中国・中東関係の現段階」『国際問題研究所 研究レポート』2022 年 12 月 23 日，<https://www.jiia.or.jp/research-report/middle-east-africa-fy2022-03.html>。
- 45 青山瑠妙「『グローバル・サウス』と中国の BRICS 戦略」『東亜』2023 年 9 月、6 頁。
- 46 吴洪英：“金砖国家促推‘全球南方’合作”，《西亚非洲》2023 年第 6 期，第 19 页。
- 47 Masaaki Yatsuzuka, China’s Efforts to Seize Control of Discourse Power in Cyberspace, *Asia-Pacific Review*, Vol. 29, No. 1, January 2022, pp. 13-31.
- 48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https://eng.sectso.org/>.
- 49 青山「『グローバル・サウス』と中国の BRICS 戦略」、8 頁。
- 50 有 8 个成员国，分别是中国、孟加拉国、伊朗、蒙古、巴基斯坦、秘鲁、泰国、土耳其。
- 51 福島康仁：“中国军事利用太空”，《中国安全战略报告 2021——新时代的中国军事战略》，防卫研究所，2020 年，第 45-46 页。
- 52 青木節子「『南南協力』で進む途上国支配」nippon.com、2019 年 8 月 29 日，<https://www.nippon.com/ja/japan-topics/c06504/>。
- 53 详见山口信治「中国はアフガニスタンにおけるタリバンの勝利をどう見たか」『NIDS コメンタリー』第 187 号、2021 年 8 月 26 日，<https://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commentary/pdf/commentary187.pdf>。
- 54 例如，在胡锦涛政权时期，2009 年 3 月 4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表示，“除安理会批准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外，中国从不向海外派驻一兵一卒”。
- 55 庄国土：“21 世纪前期世界华侨华人数量、分布和籍贯的新变化”，《侨务工作研究》2020 年 no.6、<http://qwgzyj.gqb.gov.cn/yjytt/215/3341.shtml>。
- 56 据说在利比亚内战中撤离的华侨华人超过 3 万 5 千人。「リビアから中国人救出、国力増強の表れ」CRI online、2011 年 3 月 3 日，<http://japanese.cri.cn/881/2011/03/03/163s171515.htm>。
- 57 例如，刘中民：“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政治和安全风险及应对”；刘中民、孙德刚主编：《中东地区发展报告（2017-2018）》，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 年，第 15 页。
- 58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中国人的国际安全观”民意调查报告（2023）》，第 21 页。
- 59 罗永光：“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推进海外军民融合的思考”，《“一带一路”安全年保障研讨会辑要》，国防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66 页。
- 60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3 Report on th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ctober 19, 2023, p. 154, <https://media.defense.gov/2023/Oct/19/2003323409/-1/-1/1/2023-MILITARY-AND-SECURITY-DEVELOPMENTS-INVOLVING-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PDF>.
- 61 Ibid., p. 153.
- 62 Paul Nantulya, “Chinese 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for Africa: Key Influence and Strategy,” *Special Report*, July 2023, pp. 9-10, <https://www.usip.org/sites/default/files/2023-07/sr-521-chinese-professional-military-education-africa-key-influence-strategy.pdf>.
- 63 益尾知佐子「中国の国内統治と安全保障戦略」『国際問題』2023 年 10 月、40-49 頁。
- 64 石佳鑫、蔡威：“海外利益保护视野下我国国际警务合作保障机制研究”，《社会科学论坛》，2023 年 5 月，第 177-184 页。
- 65 Safeguard Defenders, *110 overseas: Chinese Transnational Policing Gone Wild*, September 12, 2022, <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sites/default/files/pdf/110%20Overseas%20%28v5%29.pdf>; 安田峰俊『戦狼中国の対日工作』文春新書、2023 年。
- 66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3 年 2 月 21 日，https://www.mfa.gov.cn/wjbxw_new/202302/t20230221_11028322.shtml。
- 67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所罗门群岛关于建立新时代相互尊重、全面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3 年 7 月 10 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dyz_681240/1206_681766/xgxw_681772/202307/t20230710_11110974.shtml; Kate Lyons and Dorothy Wickham, “The deal that shocked the world: inside the China-Solomons security pact,” *The Guardian*, April 20, 2022,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2/apr/20/the-deal-that-shocked-the-world-inside-the-china-solomons-security-pact>。
- 68 孙德刚：“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阿拉伯世界推广的前景”，《中东地区发展报告（2015—2016）》，时事出版社，2016 年，第 52-53 页。
- 69 第 2 章中也提到的发生于 1993 年的“银河号事件”，成为中国政府批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项目的契机。详见八塚正晃「中国による宇宙空間の軍事利用」『TARON』創刊号、2022 年、35 頁。
- 70 伊藤聖聖『デジタル化する新興国』中公新書、2020 年、194 頁。
- 71 金野純「第四次産業革命と社会統治」川島真＋21 世紀政策研究所編著『現代中国を読み解く三要素－経済・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勁草書房、2020 年。

- 72 1988年9月8日,中国政府提出了军品出口三项原则,即①有助于接受国的正当自卫能力;②不损害有关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③不干涉接受国的内政。王泰平:《新中国外交50年(下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413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于2007年重申了该原则。“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就中国军品出口问题答记者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07年7月26日, https://www.mfa.gov.cn/web/fyrbt_673021/dhdw_673027/200707/t20070726_5429902.shtml。
- 73 防卫研究所编:《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20——走向欧亚大陆的中国》,防卫研究所,2019年,第17页。
- 74 刘中民:“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政治和安全风险及应对”;刘中民、孙德刚主编:《中东地区发展报告(2017-2018)》,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第13页。
- 75 八塚正晃『中国の特色ある大国外交』と中東『米中関係を越えて:自由で開かれた地域秩序構築『基軸国家日本』のインド太平洋戦略 中東・アフリカ』国際問題研究所,2022年,103-111頁。
- 76 Fu Ying,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Chatham House, July 6, 2016, 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events/special/2016-07-08-China-International-Order_0.pdf。
- 77 川島真「習近平政権下の外交・世界秩序観と援助」川島真・遠藤貢・高原明生・松田康博(編)『中国の外交戦略と世界秩序』昭和堂、2021年、60頁。
- 78 小嶋華津子「習近平の目指す社会統治と国際秩序」『中国の対外政策と諸外国の対中政策』国際問題研究所、2019年、83-94頁、https://www2.jia.or.jp/pdf/research/R01_China/06-kojima.pdf。
- 7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19年9月27日, https://www.gov.cn/zhengce/2019-09/27/content_5433889.htm。
- 80 李君如:“中国经验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人民日报》2018年3月27日, https://www.gov.cn/xinwen/2018-03/27/content_5277625.htm。
- 81 川島真「中国から見た『グローバルサウス(全球南方)』」『安全保障研究』第5巻第4巻、2023年12月、38頁。
- 82 欧阳向英:“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中国力量”,《前沿理论》,2024年2月,第46-51页, http://iwep.ccsn.cn/xscg/xscg_lwybg/202403/W020240321402485959678.pdf。
- 83 “人间正道开新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④)”,人民网,2021年7月22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1/0722/c1001-32165548.html>。
- 84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课题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展开”,《国际政治》2020年第6期, <http://rdbk1.ynlib.cn:6251/Qk/Paper/733003>;陈伟光:“‘一带一路’建设与提升中国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6页。
- 85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4年11月28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
- 8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2页。
- 87 “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新华网,2017年12月1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12/01/c_1122045499.htm。
- 88 刘中民、范鹏:《中国热点外交的理论与案例研究——以中东热点问题为例》,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第15页。
- 89 八塚正晃「サウジアラビア・イラン国交回復における中国の仲介的役割について」『NIDS コメンタリー』第269号 2023年8月1日、<https://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commentary/pdf/commentary269.pdf>。
- 90 八塚『中国の特色ある大国外交』と中東、103-111頁。
- 91 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开展的宣传战和认知战,参见山口信治、八塚正晃、门间理良:《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23——中国力求掌控认知领域和灰色地带事态》,防卫研究所,2022年,第24-38页。
- 92 关于话语权,参见江藤名保子「習近平政権の『話語体系建設』が目指すもの—普遍的価値への挑戦となるか」東京財団研究所、2017年7月25日、<https://www.tkfd.or.jp/research/detail.php?id=258>等。华东师范大学的叶淑兰认为,可在议题设置力、传播辐射力、理念引领力、形象影响力、方案贡献力以及制度创设力六大方面体现话语权。叶淑兰:“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成就、挑战与深化路径”,《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4期,第28页。
- 93 加茂具樹「制度性話語権と新しい五カ年規劃」一般財団法人 霞山会、2020年8月6日、https://www.kazankai.org/politics_list.php?no=0。
- 94 檀有志:《国际话语权视角下中国公共外交建设方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6-7页;“习近平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18年8月22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8-08/22/content_5315723.htm。
- 95 郎平:“从俄乌冲突看网络空间武器化倾向及其影响”,《网络空间战略论坛》,2022年6月,第66页。
- 96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并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1年6月1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1-06/01/content_5614684.htm。
- 97 Foreign Policy Community of Indonesia (FPCI) and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 (ERIA), *Survey of ASEAN Peoples' Perceptions on China, India, Japan and the USA: 2023 Survey Report*, p. 22, <https://www.aseanperceptionssurvey.com/>。
- 98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并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1年6月1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1-06/01/content_5614684.htm。
- 99 关于非洲的案例,参见Joshua Eisenman, “China’s Media Propaganda in Africa: A Strategic Assessment,”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Special Report*, No. 516, March 2023。
- 100 Adrian Shahbaz and Allie Funk, “The Pandemic’s Digital Shadow,” *Freedom on the Net 2020*, Freedom House,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net/2020/pandemics-digital-shadow..>
- 101 山本彩佳「国際機関に対する中国の影響力—国連専門機関のトップ獲得の動きを中心に—」『調査と情報』No.1144、2021年3月26日、1-11頁。
- 102 邹刺勇就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副总干事。

- 103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向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发表致辞时，也表明了这一认知。“习近平向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发表致辞”，人民网 2023 年 8 月 23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3/0823/c1024-40061822.html>。
- 104 “Wider support for China’s South China Sea stance,” *China Daily*, July 13, 2016, https://www.chinadaily.com.cn/world/2016-07/13/content_26070440.htm.
- 105 “Arbitration Support Tracker,”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August 2, 2021, <https://amti.csis.org/arbitration-support-tracker/>.
- 106 “中国不孤立：阿拉伯国家联盟 22 国支持我南海立场”，新浪军事，2016 年 5 月 13 日，<https://mil.sina.cn/zgjq/2016-05-13/detail-ifsenvn7112256.d.html?vt=4&pos=24>。
- 107 Jacob Wallis and Albert Zha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nformation operation to shape international perception regime in Xinjiang,” *EU vs DiSiNFO*, September 2, 2022, <https://euvsdisinfo.eu/the-chinese-communist-partys-information-operations-to-shape-international-perception-of-its-regime-in-xinjiang/>.
- 108 福田円「中国『一つの中国』原則をめぐる新戦略」笹川平和財団、2023 年 1 月 18 日，https://www.spf.org/japan-us-taiwan-research/article/fukuda_01.html。
- 109 “例行记者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2 年 9 月 9 日，https://www.fmprc.gov.cn/f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2209/t20220909_10764638.shtml。
- 110 “王毅会见埃及外长舒克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2 年 9 月 25 日，https://www.fmprc.gov.cn/wjbzhd/202209/t20220925_10771192.shtml。
- 11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 2024 年 1 月 15 日和 16 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列举的国家和组织如下所示：俄罗斯、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老挝、孟加拉国、菲律宾、斯里兰卡、尼泊尔、南非、埃及、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白俄罗斯、塞尔维亚、匈牙利、巴布亚新几内亚、古巴、委内瑞拉、巴基斯坦、马尔代夫、缅甸、伊朗、叙利亚、突尼斯、巴勒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中非共和国、尼日尔、赤道几内亚、科摩罗、莱索托、索马里、吉布提、马里、布隆迪、冈比亚、瓦努阿图、汤加、基里巴斯、多米尼克国、尼加拉瓜、玻利维亚、上海合作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非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4 年 1 月 15 日，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202401/t20240115_11224225.shtml，1 月 16 日，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202401/t20240116_11225099.shtml。
- 112 Chong Ja Ian, “The Many ‘One Chinas’: Multiple Approaches to Taiwan and China,”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February 9, 2023,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3/02/the-many-one-chinas-multiple-approaches-to-taiwan-and-china?lang=en¢er=global>.
- 113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2023, Main Program,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assets/user_upload/MS2023_Agenda_WS.pdf.
- 114 「G7 広島サミット（概要）」外務省、2023 年 5 月 26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cm/ec/page4_005920.html。
- 115 任琳：“大国博弈与全球治理中的‘全球南方’”，《西亚非洲》2023 年第 6 期，第 9 页。
- 116 同上。
- 117 Michael Schuman, “Why China won’t win the Global South,” Atlantic Council, October 16, 2023,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report/why-china-wont-win-the-global-south/>.
- 118 川島「中国から見た『グローバルサウス（全球南方）』」、27-40 頁。
- 119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https://population.un.org/wpp/>.
- 120 熊谷聡・早川和伸・磯野生茂・ケオラ・スックニラン・坪田建明・久保裕也「『デカップリング』が世界経済に与える影響－IDE-GSM 分析」アジア経済研究所、2023 年 2 月，https://www.ide.go.jp/Japanese/IDEsquare/Eyes/2023/ISQ202320_004.html。

【第 2 章】

- 1 Altay Atli, “Turkey’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onathan Fulton ed., *Routledge Handbook on China-Middle East Relations*, Routledge, 2022, p. 156; Yitzhak Shichor, *The Middle East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1949–197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9.
- 2 Mohamed Bin Huwaidin, *China’s Relations with Arabia and the Gulf 1949–1999*, Routledge, 2011, p. 98; Shichor, *The Middle East*, p. 20.
- 3 Duan Jiuzhou, “China-Egypt Relations during the BRI Era and beyond,” Fulton ed., *Routledge Handbook*, p. 127.
- 4 君主制的也门穆塔瓦基利亚王国。
- 5 Shichor, *The Middle East*, pp. 44–45, 58.
- 6 Huwaidin, *China’s Relations*, pp. 173–174; Shichor, *The Middle East*, p. 82.
- 7 严格说来，国名从马斯喀特苏丹国变为马斯喀特阿曼苏丹国，进而变成阿曼苏丹国，为了避免混乱，本报告中统一写为阿曼苏丹国。
- 8 Jonathan Fulton,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Gulf Monarchies*, Routledge, 2019, p. 121; Guy Burton, *China and Middle East Conflicts: Responding to War and Rivalry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Present*, Routledge, 2020, p. 69; Mohammed Al-Sudairi, “Sino-Omani Relations,” Fulton ed., *Routledge Handbook*, p. 207.
- 9 Lina Benabdallah, “Frozen in Time: China-Algeria Relations from Socialist Friendship to Pandemic Opportunism,” Fulton ed., *Routledge Handbook*, p. 192; Burton, *China and Middle East*, pp. 31–32.
- 10 Shichor, *The Middle East*, pp. 78, 82–84.
- 11 Ibid., pp. 104–105.
- 12 Fulton, *China’s Relations*, p. 123; Shichor, *The Middle East*, p. 119.
- 13 Burton, *China and Middle East*, p. 47; Shichor, *The Middle East*, pp. 115, 117, 123–124, 141.

- 14 Fulton, *China's Relations*, pp. 122-123; Shichor, *The Middle East*, pp. 152-154; Al-Sudairi, "Sino-Omani Relations," p. 207; Burton, *China and Middle East*, p. 70; Huwaidin, *China's Relations*, p. 202.
- 15 Fulton, *China's Relations*, p. 87.
- 16 Ibid.
- 17 Ibid., pp. 86-87, 124; Shichor, *The Middle East*, pp. 172, 182; Burton, *China and Middle East*, p. 71.
- 18 Guy Burton, "China and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Fulton ed., *Routledge Handbook*, p. 374.
- 19 Fulton, *China's Relations*, pp. 89, 125; Burton, *China and Middle East*, p. 71; Al-Sudairi, "Sino-Omani Relations," p. 207.
- 20 Burton, "China and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p. 374; Jiuzhou, "China-Egypt Relations," p. 127.
- 21 Burton, *China and Middle East*, p. 52; Burton, "China and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p. 374; Jiuzhou, "China-Egypt Relations," p. 128; Mohamed Bin Huwaidin, "China and the Gulf Region: From Strangers to Partners," Fulton ed., *Routledge Handbook*, p. 82.
- 22 Burton, *China and Middle East*, pp. 80-84; Fulton, *China's Relations*, pp. 89-90; Huwaidin, *China's Relations*, pp. 144-145, 166.
- 23 Fulton, *China's Relations*, pp. 92-93; Naser Al-Tamimi, "China and Saudi Arabia: From Enmity to Strategic Hedging," Fulton ed., *Routledge Handbook*, pp. 139-140.
- 24 Alex Colville, "The China-Palestine relationship explained," The China Project, October 17, 2023, <https://thechinaproject.com/2023/10/17/the-china-palestine-relationship-explained/>.
- 25 Fulton, *China's Relations*, pp. 94-95.
- 26 Burton, "China and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p. 375.
- 27 Burton, *China and Middle East*, p. 5.
- 28 Huwaidin, *China's Relations*, p. 170; *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6, 1993, <https://www.latimes.com/archives/la-xpm-1993-09-06-mn-32214-story.html>.
- 29 Roie Yellinek, "Israel and China Past Distance, Present Cooperation, Uncertain Future," Fulton ed., *Routledge Handbook*, pp. 182-183; Anoushiravan Ehteshami, "China in Middle Eastern Strategic Thinking," Fulton ed., *Routledge Handbook*, p. 56.
- 30 Fulton, *China's Relations*, pp. 95-97, 102.
- 31 Jonathan Fulton, "China's Emergence as a Middle East Power," Fulton ed., *Routledge Handbook*, p. 5.
- 32 Fulton, *China's Relations*, pp. 153-154.
- 33 Al-Sudairi, "Sino-Omani Relations," p. 208.
- 34 *Reuters*, July 11, 200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idUSTRE56957D/>; *Hurriyet Daily News*, April 8, 2012, <https://www.hurriyetdailynews.com/turkish-pm-erdogan-starts-china-visit-in-urumqi-17952>.
- 35 *Reuters*, February 25, 2011,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idUSTOE71O004/>; *BBC*, August 7, 2014,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frica-28684555>; *China Signpost*, February 24, 2011, <https://www.chinasignpost.com/2011/02/24/china-dispatches-warship-to-protect-libya-evacuation-mission-marks-the-prcs-first-use-of-frontline-military-assets-to-protect-an-evacuation-mission/>.
- 36 "al-Naṣṣ al-Kāmil: Wathīqa Siyāsa al-Šin tujāh al-Duwal al-ʿArabiya," *Ṣahīfā al-Shaʿb al-Yawmiya Ūnlāyin*, January 14, 2016.
- 37 Anis al-Naṣṣār, *al-Istirātījiyā al-Šiniya tujāh al-Duwal al-ʿArabiya: al-Aḥdāf wa al-Māʾālāt*, al-Markaz al-ʿArabī li al-Abḥāth wa Dirāsa al-Siyāsāt, 2020, p. 129.
- 38 关于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之间达成恢复邦交协议，详见下文：八塚正晃「サウジアラビア・イラン国交回復における中国の仲介的役割について」『NIDS コメンタリー』第269号、防衛研究所、2023年8月1日。
- 39 八塚正晃「強化される『緩い相互支持』——中東地域における中国の大国外交の射程と限界」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編『移行期にある国際秩序と中東・アフリカ』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2023年、32頁。
- 40 同上、32頁。
- 41 Jonathan Fulton, "China-Saudi Relations through '1+2+3' Cooperation Pattern," *Asian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Vol. 14, No. 4, 2020, pp. 516-527.
- 42 关于中国与阿曼加深关系，不仅有人从美中竞争语境分析，还有人从中印间竞争的语境分析。Matteo Legrenzi and Fred Lawson, "China-Oman Relations and the Indian Ocean Security Dilemma," *Global Change, Peace & Security*, Vol. 31, No. 3, 2019, pp. 361-366.
- 43 "Al Jabri, Expressing His Joy of H.M the Sultan's Speech: We Are Moving ahead to Make Duqm the Main Bases for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Duqm E-Newsletter*, No. 12, 2024, https://www.duqm.gov.om/upload/publications/newsletter_12_2014_en.pdf.
- 44 Dale Aluf,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Its Limitations," *The Diplomat*, February 26, 2024, <https://thediplomat.com/2024/02/chinas-influence-in-the-middle-east-and-its-limitations/>.
- 45 Shirzad Azad, "Bargain and Barter: China's Oil Trade with Iran," *Middle East Policy*, Vol. 30, No. 1, 2023, pp. 23-35.
- 46 Henry Rome and Naom Raydan, "Infographic: A Visual Guide to Iran's Soaring Oil Exports,"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September 2023,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infographic-visual-guide-irans-soaring-oil-exports>.
- 47 Catherine Putz, "Which Countries Are for or against China's Xinjiang Policies?," *The Diplomat*, July 15, 2019,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7/which-countries-are-for-or-against-chinas-xinjiang-policies/>.
- 48 "Detainee Says China Has Secret Jail in Dubai, Holds Uyghurs," *Associated Press*, August 17, 2021; Tom Cheshire, "How China Is Using Black Sites in the UAE as They Target Uyghurs Abroad," *Sky News*, February 9, 2022.
- 49 熊倉潤「新疆、香港の人権をめぐる共同声明と中国」『研究レポート』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2021年。
- 50 Matthew Hedges, *Reinventing the Sheikhdom: Clan, Power and Patronage in Mohammed bin Zayed's UA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 51 Andreas Krieg, "The UAE's Tilt to China," *Middle East Eye*, October 1, 2020,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opinion/why-security-partnership-between-abu-dhabi-and-beijing-growing>.
- 52 Nicole Grajewski, "Iran and the SCO: The Quest for Legitimacy and Regime Preservation," *Middle East Policy*, Vol. 30, No. 2, 2023, pp. 38-61.

- 53 西方国家就中东国家的人权问题发难的典型案例，就是 2018 年发生的沙特阿拉伯记者遇害案（卡舒吉事件）。被怀疑涉案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时因为这起事件而遭到西方国家首脑的冷遇。
- 54 Ruholamin Saedi, “The Rise of the East: Claim or Fact?,” *Khamenei.IR*, November 2022, <https://english.khamenei.ir/news/9279/The-rise-of-the-East-claim-or-fact>.
- 55 “al-Ra’īs al-Īrānī: al-Nizām al-‘Ālamī al-Jadīd sa-Yaẓhar ma‘ Zawāl Quwā al-Haymana,” *Qanāt al-Ālam*, August 31, 2023.; “Ra’īsī: Nizām al-Haymana Bāt al-Yawm Aq’af min Ayy Waqt Maḏā,” *Wikāla al-Jumhūriya al-Islāmiya li al-Anbā*, February 3, 2024; Ali Bagheri, “Iran’s Foreign Policy Outlook in Light of New World Order,” Institute for Political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y 28, 2023, <https://www.ipis.ir/en/subjectview/720552/iran%E2%80%99s-foreign-policy-outlook-in-light-of-new-world-order>.
- 56 东方外交本身是在因涉嫌研制核武器而深陷国际孤立的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政权时期开始出现的。
- 57 关于莱希政权的外交，详见下文：青木健太「イランの外交政策におけるグローバル・サウス」『中東研究』第 549 号、2024 年 1 月、16-27 頁；Hamidreza Azizi, “Iran’s ‘Look East’ Strategy: Continuity and Change under Raisi,” Middle East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September 2023.
- 58 ‘Ādil ‘Abd al-Ghaffār wa Yahyā Zubayr, “Duwal al-Sharq al-Awsaṭ wa Shamāl Afriqiya Akthar Ḥazm fī ‘Ālam Muta‘addid al-Aqtāb,” Middle East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June 22, 2023, https://mecouncil.org/blog_posts/%d8%af%d9%88%d9%84-%d8%a7%d9%84%d8%b4%d8%b1%d9%82-%d8%a7%d9%84%d8%a3%d9%88%d8%b3%d8%b7-%d9%88%d8%b4%d9%85%d8%a7%d9%84-%d8%a3%d9%81%d8%b1%d9%8a%d9%82%d9%8a%d8%a7-%d8%a3%d9%83%d8%ab%d8%b1-%d8%ad%d8%b2/?lang=ar.
- 59 Natasha Turak, “Saudi Arabia and China Are Part of a Multipolar World Order, and Their Mutual Interests Are ‘Strong and Rising,’ Minister Says,” *CNBC*, June 13, 2023, <https://www.cnbc.com/2023/06/14/china-and-saudi-arabia-are-part-of-a-multipolar-world-order-minister.html>.
- 60 Rachel Moreland “Shifting Sands: US Gulf Policy Recalibrates as China’s Regional Ambitions Grow,” *Middle East Policy*, Vol. 31, No. 1, 2024, pp. 149-161; Adel Abdel Ghafar, “Sino-GCC Relatio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rajectories,” in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at Forty: Risk and Opportunity in a Changing World*, eds. Tarik Yousef and Adel Abdel Ghafar,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23, p. 45; Jonathan Fulton, “China’s Changing Role in the Middle East,” Atlantic Council, June 5, 2019,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report/china-s-changing-role-in-the-middle-east-2/>.
- 61 Andrew Kennedy, “China and the Free-Rider Problem: Exploring the Case of Energy Securit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30, No. 1, 2015, pp. 27-50; Euan Graham, “Should China Help Secure the Strait of Hormuz?,”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July 2, 2019,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should-china-help-secure-the-strait-of-hormuz/>.
- 62 Sun Degang, “China’s Soft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Middle East,” *Dinasat*, No. 30, 2018, <https://www.kfcris.com/pdf/07b46fba22562acf20bb92fb68f5ea5c5aaa11036d535.pdf>.
- 63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2,” November 29, 2022, <https://media.defense.gov/2022/Nov/29/2003122279/-1/-1/1/2022-MILITARY-AND-SECURITY-DEVELOPMENTS-INVOLVING-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PDF>, p. 144.
- 64 Katie Lillis, Natasha Bertrand and Kylie Atwood, “Construction Halted on Secret Project at Chinese Port in UAE after Pressure from US, Officials Say,” *CNN*, November 19, 2021.
- 65 John Hudson, Ellen Nakashima and Liz Sly, “Buildup Resumed at Suspected Chinese Military Site in UAE, Leak Says,”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26, 2023.
- 66 Ibid.; 「米が警戒 中国の軍事拠点計画 “プロジェクト 141” とは？（油井の VIEW）」『NHK』2023 年 6 月 22 日。
- 67 Michelle Jamrisko and Jennifer Jacobs, “Biden Briefed on Chinese Effort to Put Military Base in Oman,” *Bloomberg*, November 8, 2023.
- 68 八塚「強化される『緩い相互支持』」、33 頁。
- 69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Treasury Targets Iran’s International UAV Procurement Network,” March 9, 2023,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jy1331>.
- 70 Dion Nissenbaum, “Chinese Parts Help Iran Supply Drones to Russia Quickly, Investigators Sa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2, 2023.
- 71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Treasury Sanctions International Procurement Network Supporting Iran’s Missile and Military Programs,” June 6, 2023,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jy1524>.
- 72 吉田智聡「サウジアラビアにとっての中国の戦略的価値とその限界」増田雅之編『大国間競争の新常態』インターブックス、2023 年、40-42 頁。
- 73 Yemen Data Project, “Data: Airwar,” n.d., <https://yemendataport.org/data.html>.
- 74 “al-Yaman: al-Hūthiyūn Yu’linūn Isqāt Musayyara Imāratiya fī Shabwa wa al-Taḥāluf Yashunn Ghārāt fī Ma’rib,” *al-Jazīra*, January 11, 2022; “Isqāt Muqātala Mutaṭawwira dūn Ṭayyār min Ṭirāz (CH-4) bi Šārūkh Arḍ Jaww fī Ša‘da,” *al-Masīra*, December 24, 2018.
- 75 胡塞武装为使自己站在代表也门国家的立场上，使用了等同于国家的组织名称和官职名称。本报告为了方便起见，直译这些专有名词，但是并不表示将该组织视为政府。
- 76 Rawan Shaif and Jack Watling, “How the UAE’s Chinese-Made Drone Is Changing the War in Yemen,” *Foreign Policy*, April 27, 2018,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4/27/drone-wars-how-the-uaes-chinese-made-drone-is-changing-the-war-in-yemen/>.
- 77 Joe Saballa, “Chinese, Saudi Firms to Jointly Develop Military Drones,” *The Defense Post*, March 11, 2022; Christopher Diamond, “China to Open a Drone Factory in Saudi Arabia,” *Defense News*, March 29, 2017.
- 78 Christopher Chivvis, Aaron Miller and Beatrix Geaghan-Breiner, “Saudi Arabia in the Emerging World Order,”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November 6, 2023,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3/11/06/saudi-arabia-in-emerging-world-order-pub-90819>; Natasha Turak, “Saudi Arabia and China Are Part of a Multipolar World Order, and Their Mutual Interests Are ‘Strong and Rising,’ Minister Says,” *CNBC*.

- 79 Mohamed Bin Huwaidin, "UAE's Balancing Strateg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Middle East Policy*, Vol. 31, No. 1, 2024, pp. 88-101.
- 80 Jim Garamone, "General Says Middle East Is a Theater for Strategic Competition," *DOD News*, October 4, 2023,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3548607/general-says-middle-east-is-a-theater-for-strategic-competition/>.
- 81 "UAE Won't Take Sides in 'Great Power' Standoff: Senior Official," *Khaleej Times*, November 14, 2022.
- 82 关于美国向土耳其出口武器的案例, 详见下文: 今井宏平「トルコの防衛産業——発展の歴史と実戦での成果を中心に」『国際安全保障』第51卷第4号、2024年3月、67頁。
- 83 2019年至2023年, 美国武器占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进口武器的比重, 分别为75%和57%。Pieter Wezeman, Katarina Djokic, Mathew George, Zain Hussain and Siemon Wezeman,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s, 2023," *SIPRI Fact Sheet*, 2024,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p. 6.
- 84 Steven Cook and Martin Indyk, "The Case for a New U.S.-Saudi Strategic Compact," *Council Special Report*, No. 94, 2022,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p. 10-11; Jim Krane and Mark Finley, "The U.S. Response to Attacks on Persian Gulf Oil Infrastructure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for Petro-States," Baker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October 29, 2019, <https://www.bakerinstitute.org/research/us-response-attacks-persian-gulf-oil-infrastructure>.
- 85 Lauren Aratani, "Biden Tells Summit of Arab Leaders the US 'Will Not Walk away' from Middle East," *The Guardian*, July 16, 2022;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Lloyd J. Austin III on Middle East Security at the Manama Dialogue (As Delivered)," November 20, 2021, <https://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Article/2849921/remarks-by-secretary-of-defense-lloyd-j-austin-iii-on-middle-east-security-at-t/>.
- 86 Sinan Tavsan, "Turkey's Ex-President Slams U.S. 'Double Standards' on Israel, Ukraine," *Nikkei Asia*, March 3, 2024.
- 87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ng Yi Has a Phone Call with Foreign Minister of Saudi Arabia Faisal bin Farhan bin Abdullah bin Faisal bin Farhan Al Saud," October 15, 2023, 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wjdt_665385/wshd_665389/202310/t20231017_11162147.html.
- 88 Christina Lu, "How China Is Leveraging the Israel-Hamas War," *Foreign Policy*, January 31, 2024,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1/31/china-israel-hamas-global-south-us-foreign-policy/>; Michael Singh, "Why China Is Taking Sides Against Israel and Why It Will Likely Backfire,"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November 29, 2023,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why-china-taking-sides-against-israel-and-why-it-will-likely-backfire>.
- 89 Barbara Kelemen, "China's Shifting Role in Yemen: A Historical Framework for Engaging the Houthis," 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 January 31, 2024, <https://www.stimson.org/2024/chinas-shifting-role-in-yemen/>.
- 90 Emily Milliken, "What Is China Doing in Yemen," *Responsible Statecraft*, July 13, 2023, <https://responsiblestatecraft.org/2023/07/13/what-is-china-doing-in-yemen/>.
- 91 Nāṭiq Anṣār Allāh Muḥammad 'Abd al-Salām fi Muqābala Khāṣṣa: al-Amriki warā' al-'Udwān wa Lā Khiyār la-nā illā al-Muwājaha wa al-'Amaliyāt fi Mā warā' Jabhāt al-Hudūd li Rad' al-'Udwān wa al-Nizā' al-Hudūdī la-hu Masār-hu al-Khāṣṣ," *al-Masira*, January 11, 2016.
- 92 Zakaria al-Kamaali, "Houthi Delegation from Yemen Wraps up China Visit," *Anadolu Agency*, January 12, 2016.
- 93 "al-Naṣṣ al-Kāmil: Hiwār al-Ra'is al-Ṣammād ma' Qanāt al-Mayādīn," *al-Masira*, January 16, 2017.
- 94 "Qā'id al-Thawra: Hurriyat-nā Dīn wa 'Izzat-nā Imān wa Karāmāt-nā Qiyam wa Lā Yumkin al-Tafrīt bi Ayy min-hā Mahmā Kānat al-Taḍḥiyāt," *al-Masira*, September 11, 2019.
- 95 本报告虽然采纳本案例作为胡塞武装的主张, 但是对其真伪不作判断。不过, 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也批评中国渔船非法捕捞。"Hukūma al-Murtaziqa Tasmaḥ li Sufun Ṣiniya bi Nahb wa Tajrif al-Tharwa al-Samakiya," *al-Masira*, September 10, 2023; "Illegal Fishing in South Yemen Territorial Waters," South 24 Center for News and Studies, February 15, 2023, <https://south24.net/news/newse.php?nid=3182>.
- 96 "al-'Ālam Yataghayyar: Naḥw Nizām Muta'ddid al-Aqtāb bi Qalam Ibrāhīm al-Sarrāji," *al-Masira*, February 20, 2019; "Min al-Imbarātūriya al-Amrikiya ilā al-Khilāfa al-Amrikiya bi Qalam Ihāb Shawqi," *al-Masira*, February 9, 2019; "Zaman al-Haymana al-Amrikiya Intahā bi Qalam Fu'ād Zayd al-Kaylāni," *al-Masira*, February 6, 2019.
- 97 Zayd al-Maḥbashi, "Istirāṭijiyāt wa Khiyārāt al-Muwājaha ladā Miḥwar al-Muqāwama wa al-Mumāna'a," Markaz al-Buḥūth wa al-Ma'lumāt, November 2023, https://www.saba.ye/storage/files/blog/1700978527_t9Le-p.pdf.
- 98 阿拉伯语中意指“抵抗轴心”的词语不仅有“Miḥwar al-Muqāwama”, 还有在本报告中被译为“抗辩轴心”的“Miḥwar al-Mumāna'a”, 以及二者并排在一起的“Miḥwar al-Muqāwama wa al-Mumāna'a”等。“调查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中, 耐人寻味的一点是从概念上将“抵抗 (Muqāwama)”与“抗辩 (Mumāna'a)”分开, 分别组成行为主体。这一定义非同寻常, 可谓该报告的独到之处。
- 99 al-Maḥbashi, "Istirāṭijiyāt wa Khiyārāt al-Muwājaha ladā Miḥwar al-Muqāwama wa al-Mumāna'a," p. 5.
- 100 "al-Quḥūm: al-'Alāqāt al-Yamaniya ma' Rūsiyā wa al-Ṣīn fi Taṭawwur Mustamirr li Muwājaha al-Haymana al-Gharbiya," *al-Mayādīn*, March 17, 2024, <https://www.almayadeen.net/news/politics/%D8%A7%D9%84%D9%82%D8%AD%D9%88%D9%85--%D8%A7%D9%84%D8%B9%D9%84%D8%A7%D9%82%D8%A7%D8%AA-%D8%A7%D9%84%D9%8A%D9%85%D9%86%D9%8A%D8%A9-%D9%85%D8%B9-%D8%B1%D9%88%D8%B3%D9%8A%D8%A7-%D9%88%D8%A7%D9%84%D8%B5%D9%8A%D9%86-%D9%81%D8%AA%D8%B7%D9%88%D8%B1-%D9%85%D8%B3%D8%AA%D9%85%D8%B1-%D9%84%D9%85%D9%88%D8%A7%D8%AC>.

- 101 关于 2023 年 10 月之后的也门局势，详见下文：吉田智聡『『アクサーの氾濫』作戦発動から 1 カ月の中東情勢——ハマースが狙う長期戦とフーシー派の介入』『NIDS コメンタリー』第 284 号、防衛研究所、2023 年 11 月 10 日；同「米英のイエメン空爆が中東情勢に与える 3 つの影響——高まる連鎖的エスカレーションのリスク」『NIDS コメンタリー』第 291 号、防衛研究所、2024 年 1 月 16 日；同、清岡克吉「イエメン情勢クォーターリー（2023 年 10 月～12 月）——国際社会に拡大するフーシー派の海洋軍事活動の活発化」『NIDS コメンタリー』第 295 号、防衛研究所、2024 年 1 月 26 日；吉田智聡「イエメン情勢クォーターリー（2024 年 1 月～3 月）——10 年目を迎えたイエメン内戦とフーシー派の支持拡大」『NIDS コメンタリー』第 308 号、防衛研究所、2024 年 4 月 12 日。
- 102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Conflict Compounding Economic Challenges,”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January 2024, <https://www.imf.org/-/media/Files/Publications/REO/MCD-CCA/2024/Update/January/English/text.ashx>.
- 103 Jackie Northam, “China Is Mostly Quiet on Houthi Attacks in the Red Sea,” *Responsible Statecraft*, February 23, 2024, <https://www.npr.org/2024/02/23/1233255546/china-houthis-red-sea-ship-attacks-middle-east>.
- 104 Parisa Hafezi and Andrew Hayley, “Exclusive: China Presses Iran to Rein in Houthi Attacks in Red Sea, Sources Say,” *Reuters*, January 26, 2024.
- 105 “al-Sayyid ‘Abd al-Malik al-Hūthī fi Kḥiṭāb ḥawl Ākḥir al-Taṭawwūrāt fi al-Miṭṭaqa: Lā Yumkin-nā an Naskut aw Natafarraj ‘alā Iḥwat-nā fi Filasṭīn wa ‘alā al-‘Adūw Daf‘ al-Thaman al-Bāḥiṣ muqābil Ijram-hi,” *al-Masīra*, February 2, 2024.
- 106 Emil Avdaliani, “China Sees an Opportunity in the Red Sea Crisis with the Houthis,” 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 February 12, 2024, <https://www.stimson.org/2024/china-opportunity-red-sea-crisis-houthis/>.
- 107 Ahmed Aboudouh, “Houthi Attacks in the Red Sea Help China Criticize the US: But Threaten Long-Term Policy,”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January 9, 2024,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4/01/houthi-attacks-red-sea-help-china-criticize-us-threaten-long-term-policy>.
- 108 与以色列有关联的船舶是指：①悬挂以色列国旗的船舶；②由以色列企业运营的船舶；③由以色列人拥有的船舶。
- 109 Sam Dagher, and Mohammed Hatem, “Yemen’s Houthis Tell China, Russia Their Ships Won’t Be Targeted,” *Bloomberg*, March 21, 2024.
- 110 胡塞武装坚称“黄埔”号是英国船舶，不承认该船是中国船舶。al-Qūwāt al-Musallāḥa Tunaffidh Sitt ‘Amaliyāt ‘Askariya fi Khalij ‘Adan wa al-Baḥr al-Aḥmar wa Umm al-Raṣhrāsh,” *Wikāla al-Anbā’ al-Yamaniya*, March 26, 2024.
- 111 「中国海運企業が存在感＝紅海経由が強みに」『時事通信』2024 年 4 月 20 日。
- 112 Lucy Handley, “Demand for Shipments from China via Rail through Russia Has ‘Skyrocketed’ since the Red Sea Attacks,” *CNBC*, February 1, 2024.

【第 3 章】

- 1 北野尚宏『『中国・アフリカ協力フォーラム』をめぐる新たな動き』『国際問題』No. 707（2022 年 6 月）、27-38 頁。
- 2 关于中国的对非战略，详见例如 David H. Shinn and Joshua Eisenman, *China’s Relations with Africa: A New Era of Strategic Engagemen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3; Nadège Rolland, “A New Great Game? Situating Africa in China’s Strategic Thinking,”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NBR Special Report No. 91 (June 2021), https://www.nbr.org/wp-content/uploads/pdfs/publications/sr91_rolland_june2021.pdf.
- 3 Shinn and Eisenman, *China’s Relations with Africa*, pp. 44-47.
- 4 Cobus van Staden, Chris Alden and Yu-Shan Wu, “Outlining African Agenc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frican Studies Quarterly*, Vol. 19, No. 3-4, October 2020, pp. 115-134.
- 5 African Union, Agenda 2063: The Africa We Want in 2063,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African Union Agenda 2063, Assembly/AU/5(XXIV)A, January 30-31, 2015, [https://portal.africa-union.org/DVD/Documents/DOC-AU-WD/Assembly%20AU%205%20\(XXIV\)%20_E.pdf](https://portal.africa-union.org/DVD/Documents/DOC-AU-WD/Assembly%20AU%205%20(XXIV)%20_E.pdf).
- 6 African Union Commission and African Union Development Agency (NEPAD), Second Continental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genda 2063, February 2022, pp. 28-42, https://au.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41480-doc-2nd_Continental_Progress_Report_on_Agenda_2063_English.pdf.
- 7 Bitsat Yohannes-Kassahun, “One Year Later: The Impact of the Russian Conflict with Ukraine on Africa,” *Africa Renewal*, February 13, 2023.
- 8 “Ukraine War Drives International Food Prices to ‘New All-Time High,’” *UN News*, April 8, 2022,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2/04/1115852>.
- 9 David McNair, “How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Will Impact Africa?” *ONE*, <https://data.one.org/data-dives/russias-invasion-of-ukraine>.
- 10 “Food Inflation | Africa,” *Trading Economics*,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country-list/food-inflation?continent=africa>.
- 11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List of LIC DSAs for PRGT-Eligible Countries, April 30, 2024,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dsa/DSAlist.pdf>.
- 12 Oyintarelade Moses, Dianah Ngui, Lucas Engel and Abbi Kedir, “China-Africa Economic Bulletin, 2024 Edition,” Boston University Global Development Policy Center and African Economic Research Consortium, 2024, p. 7, https://www.bu.edu/gdp/files/2024/04/GCI_China-Africa-Bulletin-2024-FIN.pdf.
- 13 Ibid., pp. 7-8.

- 14 Wenjie Chen, Michele Fornino, Henry Rawlings, "Navigating the Evolving Landscape of China and Africa's Economic Engagements," IMF Working Papers, WP/24/37, February 2024, pp. 15-16, file:///C:/Users/%E5%BE%8C%E8%97%A4%E6%B4%8B%E5%B9%B3/Downloads/wpica2024037-print-pdf.pdf; Yike Fu, "The Quiet China-Africa Revolution: Chinese Investment," *The Diplomat*, November 22, 2021, <https://thediplomat.com/2021/11/the-quiet-china-africa-revolution-chinese-investment/>.
- 15 Moses et al., "China-Africa Economic Bulletin, 2024 Edition," p. 11.
- 16 Eric Olander, "China Remains Africa's Largest Source of FDI and Job Creation, Says EY's Annual Investment Report," *China Global South Project*, December 7, 2021, <https://chinaglobalsouth.com/2021/12/07/china-remains-africas-largest-source-of-fdi-and-job-creation-says-ey-annual-investment-report/>; Debongo Devincy Yanne Sylvaire et al., "The Impact of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Africa's Inclusive Development," *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 Open*, Vol. 6, 2022, p. 4.
- 17 Keyi Tang and Yingjiao Shen, "Do China-financed Dams in Sub-Saharan Africa Improve the Region's Social Welfare? A Case Study of the Impacts of Ghana's Bui Dam," *Energy Policy*, Vol. 136, January 2020.
- 18 Jenni Marsh, "The Chinses Phone Giant That Beat Apple to Africa," *CNN*, October 10, 2018.
- 19 Ebenezer Megbowon et al., "Impact of China's Outward FDI on Sub-Saharan Africa's Industrialization: Evidence from 26 Countries," *Cogent Economics & Finance*, Vol. 7, No.1, 2019; Andrew G Ross and Neil Fleming, "The Impact of 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Host Country Economic Growth," *Local Economy*, Vol. 37, No. 6, 2022 pp. 507-525.
- 20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Climate Change Impacts on Africa's Economic Growth, 2019, https://www.afdb.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afdb-economics_of_climate_change_in_africa.pdf.
- 21 Alex Vines, Creon Butler and Yu Jie, "The Response to Debt Distress in Africa and the Role of China," Chatham House, December 15, 2022,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2/12/response-debt-distress-africa-and-role-china>.
- 22 Lee Jones and Shahr Hameiri, "Debunking the Myth of 'Debt-trap Diplomacy': How Recipient Countries Shape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atham House, August 2020,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0/08/debunking-myth-debt-trap-diplomacy>; Michal Himmer, "Chinese Debt Trap Diplomacy: Reality or Myth?" *Journal of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Vol. 18, No. 3, pp. 250-272.
- 23 Wenjie Chen et al., "Navigating the Evolving Landscape of China and Africa's Economic Engagements," IMF Working Papers, WP/24/37 (February 2024), pp. 5-6.
- 24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Vision 2035,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China, December 10, 2021, http://www.focac.org.cn/focacdakar/eng/hyqk_1/202112/t020211210_10466585.htm.
- 25 Zainab Usman and Tang Xiaoyang, "How Is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Affecting Its Relations with Africa?"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y 2024, p. 4,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4/05/how-is-chinas-economic-transition-affecting-its-relations-with-africa?lang=en>.
- 26 AU Commission and NEPAD, Second Continental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genda 2063, p. 34.
- 27 Ibid., p. 35.
- 28 Ibid., p. 36.
- 29 Ibid., pp. 38-39.
- 30 Ibid., p. 39.
- 31 神宮司 寛「アフリカにおけるクーデタの再来と対テロ戦争」『安全保障戦略研究』第4巻第2号（2024年3月）、157-175頁。
- 32 Herve Akincho, "As Africans Enter Busy Political Year, Scepticism Marks Weakening Support for Elections," *Afrobarometer Dispatch*, no. 761 (February 2024), <https://www.afrobarometer.org/wp-content/uploads/2024/02/AD761-PAP7-In-busy-political-year-scepticism-marks-Africans-weakening-support-for-elections-Afrobarometer-31Jan24.pdf>.
- 33 Africa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Deaths Linked to Militant Islamist Violence in Africa Continue to Spiral," January 29, 2024, <https://africacenter.org/spotlight/mig2024-deaths-militant-islamist-violence-africa-rise/>.
- 34 Andrews Atta-Asamoah, "Africa Isn't Ready for a Withdrawal of Peacekeepers," *ISS Today*, October 10, 2023, <https://issafrica.org/iss-today/africa-isnt-ready-for-a-withdrawal-of-peacekeepers#:~:text=Africa%20isn%E2%80%99t%20ready%20for%20a%20withdrawal%20of%20peacekeepers,fragile%20situations%20across%20Africa%20for%20over%2060%20years>.
- 35 Jean-Pierre Cabestan, "China's Involvement in African Security: The Case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UN Mission to Stabilize Mali,"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35., September 2018, pp. 713-734.
- 36 Jean Pierre Cabestan, "China's Military Basse in Djibouti: A Microcosm of China's Growing Competi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New Bipolari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9, No. 125, 2020, pp. 731-747.
- 37 "Chinese Weapons Are Taking Over in Africa," *The Economist*, May 23, 2024, <https://www.economist.com/middle-east-and-africa/2024/05/23/chinese-weapons-are-taking-over-in-africa>.
- 38 Amin Mohseni-Cheraghloou and Naomi Aladekoba, "China in Sub-Saharan Africa: Reaching Far Beyond Natural Resources," Atlantic Council, March 2023, p. 13,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wp-content/uploads/2023/03/China-in-Sub-Saharan-Africa-Reaching-far-beyond-natural-resources.pdf>.
- 39 Mohseni-Cheraghloou and Aladekoba, "China in Sub-Saharan Africa," p. 14.
- 40 Paul Nantulya, "China's Policing Models Make Inroads in Africa," Africa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May 22, 2023, <https://africacenter.org/spotlight/chinas-policing-models-make-inroads-in-africa/>.
- 41 Joshua Meservey, "Government Buildings in Africa Are a Likely Vector for Chinese Spying," Heritage Foundation, May 20, 2020, <https://africacenter.org/spotlight/chinas-policing-models-make-inroads-in-africa/>.
- 42 Bulelani Jili, "Chinese Surveillance Tools in Africa," *China, Law and Development*, no. 18 (2019), <https://cld.web.ox.ac.uk/file/678231>.
- 43 Cortney Weinbaum et al., "Mapping Chinese and Russian Military and Security Exports to Africa," RAND Corporation, December 13, 2022,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tools/TLA2000/TLA2045-3/RAND_TLA2045-3.pdf.

- 44 Judd Devermont, Marielle Harris and Alison Albelda, "Personal Ties: Measuring Chinese and U.S. Engagement with African Security Chief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ugust 2021,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210804_Devermont_Personal_Ties.pdf?VersionId=.YCq8Uld.T5woHvt58xPvmugr_2NNfNj.
- 45 Sheena Chestnut Greitens and Isaac Kardon, "Playing Both Sides of the U.S.-Chinese Rivalry," *Foreign Affairs*, March 15, 2024.
- 46 Alex Vines, et al., "Is China Eyeing a Second Military Base in Africa as the US Struggles to Maintain One in Niger?" Chatham House, March 25, 2024,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4/03/china-eyeing-second-military-base-africa-us-struggles-maintain-one-niger>.
- 47 Alex Vines, Jon Wallace, "China-Africa Relations," Chatham House, January 18, 2023,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3/01/china-africa-relations>.
- 48 Paul Nantulya, "China's First Political School in Africa," Africa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November 7, 2023, <https://africacenter.org/spotlight/china-first-political-school-africa/>.
- 49 Charles Dunst, "China Is OK with Interfering in Guinea's Internal Affairs,"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8, 2021.
- 50 The Economist, "Chinese Weapons Are Taking Over in Africa."
- 51 Obert Hodzi, "African Political Elites and the Making(s) of the China Model in Africa," *Politics and Policy*, Vol. 48, No. 5 2020, pp. 887-907.
- 52 Josephine Appiah-Nyamekye Sanny and Edem Selormey, "Africans Welcome China's Influence But Maintain Democratic Aspirations," *Afrobarometer Dispatch* No. 489, November 15, 2021, <https://www.afrobarometer.org/wp-content/uploads/2021/11/AD489-PAP3-Africans-welcome-Chinas-influence%5EJ-maintain-democratic-aspirations-Afrobarometer-dispatch-16nov21.pdf>; Hagan Sibiri, "The Emerging Phenomenon of Anti-Chinese Populism in Africa: Evidence from Zambia, Zimbabwe and Ghana," *Insight on Africa*, Vol. 13, No. 1, 2021, pp. 7-27.
- 53 The White House, U.S. Strategy Toward Sub-Saharan Africa, August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8/U.S.-Strategy-Toward-Sub-Saharan-Africa-FINAL.pdf>; US AFRICOM, Statement of General Michael E. Langley before the US Senat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March 7, 2024, https://www.armed-services.senate.gov/imo/media/doc/langley_statement_3724.pdf.

筆者简介

八塚 正晃 地域研究部中国研究室主任研究官

负责撰写：序章、第1章、末章

主要出版物：「中東の秩序再編に参画する『大国』中国の意図と実践」『東亜』2023年11月号、2-9頁；『科学技術大国』中国はその力をどう使うのか—軍事・安全保障の側面を中心に」加茂具樹（編）『中国は『力』をどう使うのか』一藝社、2023年、198-208頁；「中国における革命外交と近代化の相克—1970年代の対外援助をめぐる政治過程」『中国研究月報』第96号、2022年9月、1-14頁。

西野 正巳 理论研究部政治法制研究室室長

负责撰写：第2章第1节

主要出版物：「過激派—テロに対峙する政権と軍・警察—」横田貴之編著『シリーズ・中東政治研究の最前線4 エジプト』ミネルヴァ書房、2023年、195-221頁；「アラブ諸国とイスラエルの国交正常化の進展」防衛研究所編『東アジア戦略概観2022』インターブックス、2022年、40-63頁；「サラフ主義と『イスラム国』」菊地達也編著『図説 イスラム教の歴史』河出書房新社、2017年、115-127頁。

吉田 智聡 理论研究部社会经济研究室研究员

负责撰写：第2章第2节

主要出版物：「イエメン・フーシー派の海上戦力とその発展—国家性の追求手段としての海上戦力」『海幹校戦略研究』第13巻第1号、2023年、39-56頁；「サウディアラビア・UAE 二国間関係の二面性—イエメン内戦と強国化政策を巡る競合主体化」『安全保障戦略研究』第4巻第2号、2024年、139-155頁；「12月2日革命の失敗とイエメン国民抵抗軍の伸張—柔軟な生存戦略下での西海岸地域支配」『中東研究』第548号、2023年、94-104頁。

神宮司 覚 理论研究部政治法制研究室主任研究官

负责撰写：第3章

主要出版物：「アフリカにおけるクーデタの再来と対テロ戦争」『安全保障戦略研究』第4巻第2号、2024年、157-175頁；「軍隊」落合雄彦（編）『アフリカ安全保障入門』晃洋書房、2019年、3-15頁；「アフリカにおける非対称的な安全保障課題と軍事力の役割」『法学研究』第92巻第1号、2019年、351-378頁。

编辑部：林 浩一、切通 亮、田中 亮佑、五十嵐 隆幸、清岡 克吉、后藤 洋平、竹内 俊雅、相田 守輝

中国安全战略报告 2025 崛起的全球南方与中国

防卫研究所

Copyright © 2024 by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Japan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written, prior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This publication is a translation of the Japanese vers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November 2024.

出版发行：防卫研究所

笔 者：八塚 正晃、西野 正巳、吉田 智聡、神宮司 覚

地 址：东京都新宿区市谷本村町5番1号

邮 编：162-8808

网 址：<https://www.nids.mod.go.jp>

翻 译：INTERBOOKS

版 次：2024年12月第1版

ISBN978-4-86482-137-7

Printed in Japan